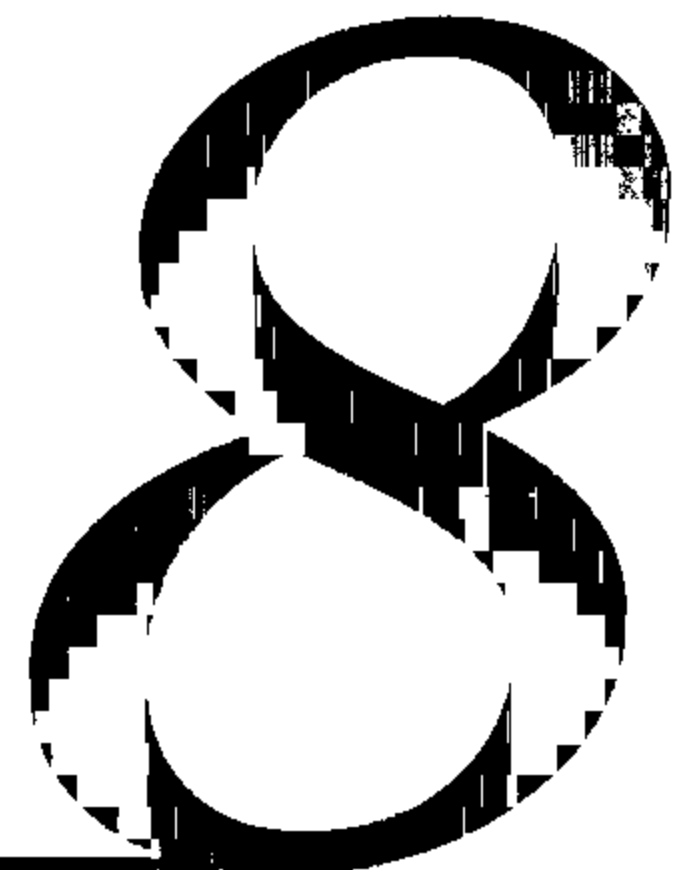


第八期 2004年6月號

批判與再造



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危機與反全球化運動

——阿任可莎多·布佳林(Aleksandr Buzgalin)
訪問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台灣的放鷹者

以史為鑑，美國能給台灣什麼保證？

怎樣才能出現進步的第三勢力？

知識界的分裂與整合

防止三農問題轉化成革命問題

《中國農民調查》書評

批判·進步·解放

若水堂
water-like

gaming@waterlike.com.tw
www.waterlike.com.tw
www.waterlike.com.tw

我們販賣知識

全台最大最專業大陸圖書專賣店

文學、藝術音樂、歷史地理、哲學宗教、社會科學
商業、醫學、理工、生活、影音產品..

最新消息

東海店：供應最新圖書及影音產品
中原店：2003年11月開始試賣
高雄店：2003年11月開始試賣
成人店：2003年11月開始試賣

若水堂書店，歡迎您的蒞臨
或經由若水堂網路書店訂購

bookstore

東海店
台中縣龍井鄉中港路100號1樓
TEL: (04) 263-2200 FAX: (04) 263-2201
高雄店
高雄市多雅區林敏街1號1樓
TEL: (07) 531-8888 FAX: (07) 531-8888

成人店
台南市東門路一段100號1樓
TEL: (06) 231-0000 FAX: (06) 231-0008
中原店
中壢市大正路100號1樓
TEL: (03) 262-8890 FAX: (03) 262-8893

>> 全球化批判

01 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危機 與反全球化運動

——阿任可莎多·布佳林(Aleksandr Buzgalin)
訪問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譯■李君宇 關展引

>> 時局評論

07 台灣的放鷹者

文■趙剛 / 關■陳乃慈

11 以史為鑑， 美國能給台灣什麼保證？

■羅德水

16 怎樣才能出現進步的第三勢力？

■陳培元

>> 大陸形勢

19 知識界的分裂與整合

■祝東力

22 防止三農問題轉化成革命問題

■李昌平

26 建立適當的道義高度 去排斥理智和邏輯

——評《中國農民調查》

■老田

>> 六四回顧與評析

30 有關一九八九年事件 的一些思考(下)

■賀東

44 將軍招熄的煙頭

■周良沛

>> 歷史檔案

48 《韓丁生平紀要》

著■約翰·梅志 / 譯■葛文1

50 霜降(完)

——顏世鴻的回憶錄

著■顏世鴻 / 編註■藍博洲

>> 文化廣場

58 【《弱勢群體之聲》第一集】

- * 深圳的手指
- * 廣州街頭相遇聾耳
- * 我不能再以詩歌扶貧

■浪淘沙

61 施善繼頌詩 四題

■施善繼

63 因為…廣場上

■鍾喬

歡迎贊助 19803670
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零售	90元 / 本	
訂閱	台灣地區 (一般訂戶)	一年 1,000元
	(榮譽訂戶)	5,000元
	歐美地區	一年 50美元
	大陸、港、澳地區	一年 40美元
	亞洲地區	一年 45美元
【美金支票請寫明 Pay to Huang Te-Pei】		

發行人 范振國
 社長 黃德北
 總編輯 杜繼平
 執行編輯 陳乃慈 宋文揚

發行所 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社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4巷12號
 編輯部 台北縣新店市德正街27巷29弄60號3樓
 電話 (02) 8914-7520
 傳真 (02) 8914-7520
 電子信箱 critra99@yahoo.com.tw

北市建商商號092字第255400號

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危機與反全球化運動

本刊第四期譯載了2003年「世界社會論壇」出版的訪談錄《On Theory of the “Alter-Globalist” Movement》中訪問阿明（Samir Amin）的文章。本期再譯出對「世界體系論」創始人華勒斯坦的訪談內容。【編者】

阿任可莎多·布佳林（Aleksandr Buzgalin）
訪問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譯■李哲宇 關晨引

■：首先，我想先陳述兩個在我看來非常重要的話題（當然，你可另有選擇）。第一個話題是：請你就所謂的反全球化運動與傳統的反對運動、傳統左派、工會等等，以及1968年世代的所謂新左派加以比較分析；它們的共同點是什麼？又有何差異？第二個話題是：世界發生的變化與反全球化運動興起的關聯，為什麼會出現反全球化運動？只是偶然嗎？或者（用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看）這個現象之所以出現是由於某些根本的社會經濟因素？

□：好，我們開始談吧。關於歷史的反體系運動，我把所謂的「老左派」看做是十九世紀，特別是1848年以後，形成的整個結構的一個部分。在這個全球的地緣—文化中，自由主義居主導地位，各種意識形態也紛紛出現來論述如今已普遍習以為常的變動不居的社會變遷。社會科學的產生是用來解釋這些現象，反體系運動則是用控制國家來掌握這些變化的一種方式。這樣

的模式從1848年一直貫串到1968年。

在那個時期的末端，發坐了兩件重大的事情。一件是反體系運動因為它們的成功反遭失敗。反體系運動無往不利：如果你在1968年環顧世界，三分之一是共產黨當權，另有三分之一是社會民主黨或與之有幾分相似的政權執政，最後的三分之一則是民族解放運動當家。所以，它們全都掌握了國家權力，全球各地……

1968年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危機的轉捩點

■：而它們作為左派運動或反體系運動卻衰頹了……

□：它們都遵循著名的兩階段規劃：取得政權然後改變世界。結果它們並沒有改變世界，因為它們無法改變。事實上，1968年是場巨大的世界革命，它的兩大主調之一是，舊有的左派運動已成了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答的一部分。其主旨是：

「我們已不抱幻想了，你們沒有改變世界，我們現在拒絕你們了。」這個想法在世界不同地區採取了不同形式，但所指的是同一回事。這是主要的一點。

另一個主旨與作為基本結構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歷史演進有關，在我看來，這是資本積累的結構問題，這與這個結構已到達某些臨界的限制，不再能恢復平衡有關；有三個主要因素，其一是實際工資的水準上升；其二是投入品成本的上升，最後是稅金成本的上升，所有這些因素都在全世界範圍上壓縮資本的積累和利潤。

所以說，這個體系正處在危機之中，而反體系運動也處於危機之中。從1968年以來，世界體系處於過渡和崩解的時期，世界混亂無序，在伊拉克的戰爭只是這種狀態的進一步表現。

■：不好意思打個岔，在你看來1968是個轉捩點，而不是如Fukuyama或其他人所說的80年代末期嗎？

□：最大的轉捩點是1968年沒錯。1968年是文化最大的轉捩點。1968年是人們思想最大的轉捩點。在我們的著作《過渡的時代》中，我們試著去解釋為何1968年既是短期的康得拉惕夫（Kondratieff）週期的轉捩點，也是較長期的霸權週期的轉捩點，而因還是整個體系的惡兆。這是危機的時刻。我們已經處在於這樣的危機，而且我們還得再在這個危機中度過25年，或者是更久……。

在這樣的情勢中，真正的保守派終於與自由派分了家，另立門戶，重申他們自己的主張。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所幹的事。他們想把對經濟極具破壞性的三個現象倒轉回去：實際工資的上升和生態環境的新強調，以及課稅金額的提升。他們制定龐大的計畫要把這些問題倒轉回去。當然，

此其間，當權的運動也都在走下坡。第三世界的運動全都江河日下，共產政權也差不多都傾頹了。全世界的左派普遍陷於極度困惑迷亂當中。如我在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上的文章所說，他們試著以不同的方式應對。

第一種方式就是毛派運動，毛派運動持續了5年7年或10年而瓦解——主要是因為中國的毛派瓦解了。這些運動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第二種方式就是所謂的新左翼運動，即綠黨、婦女、少數民族等運動，然而他們都面臨與19世紀末的社會民主派相同的基本問題：要在「體制外」運動嗎？還是應該試著走進體制、走進議會，走進政府等等。當時他們決定走進體制，在這點上他們看起來與老左翼運動並沒有什麼不同，除了新強調的婦女、少數民族等等問題外，但在其他方面，在整體結構上他們還是一樣，並沒有什麼進展。

然後，就來了非常讓人質疑的人權運動。

所以到九〇年代末，人們尋找著能真正取代老左派的非常有意義的運動方式。首先，世界經濟的情勢對於越來越多人而言，變得越來越壞。突然，反全球化的想法湧現出來：制止全球化！把它推回去！運動發起，迅即風起雲湧，傳佈速度之快，令人吃驚，足見它應合了人們對於新的運動方式的渴求。

現在，有兩件事對反全球化運動或曰另類全球化運動非常重要。第一：他們棄絕集權式的運動理念。前此的所有運動都是集權式的運動，但反全球化運動或另類全球化運動對所有的事都採取鬆散的聯合模式。他們全力奉行這樣的理念：不搞集中權力的組織，應包容各種人，寬容各種差異。因此他們極力強調在國家政權之外

的人民群眾的聯合。當然，他們遭遇到難題，我們也將看到這些難題……

資本主義承受不了 工人的徹底無產階級化

■：也許吧，在討論這些難題之前，我想先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些新運動的興起只和「老左」與所謂「新左」的危機，只和反體系運動內部的危機有關嗎？或者其興起的根本原因也和資本存在模式及地緣政治的情勢等等的改變有關？因此，你認為資本主義體系在本質上有任何改變嗎？

□：不，我不這麼認為。完全相反。我看到反對運動對資本主義體系及其運行方式的瞭解，有了本質上的改變。不是資本主義體系改變了。而是19世紀時所作的分析非常狹隘，只看到整個圖像的一小部分，有一些根本的錯誤。一個根本的錯誤是，假設只有受薪勞工（the waged labor）才是資本主義的根本要素。長期以來，我主張資本主義的基本組成部分不是受薪勞工而是受薪與非受薪勞工的組合。1970年代，我們與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者Ernesto Laclau有場爭論，他寫了一篇嚴厲批評我的文章，他從我的文章挑出他認為特別異議可怪的一句，「一旦所有的勞工都自由了，社會主義就會實現」。他說這是匪夷所思，他認為：資本主義才有自由勞工！我回覆說：不，資本主義正好不是這樣——在一個付給所有工人貨幣收入的體制下資本主義無法生存，因為真要是這樣，要支付的錢就太多了，花費的成本就太高了。因此資本主義抵制無產階級化。無產階級化不是因資本主義而產生的，而是儘管有資本主義存在它也照樣發生。所以說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之一，就是在世界體系內無產階級化的速率日益上升。許多問題

正提高生產的基本成本，壓縮獲利的可能性，無產階級化的速率上升是其中之一。對此我們認知有誤。另一方面的誤解，是我們對資本主義的認知專注於工廠的層次，認為如果一個工廠是資本主義的工廠，那麼推而廣之，這個國家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現在我們知道了，就如世界體系分析所說的那樣，資本主義並不是在工廠的單位上運行，而是一開始就是世界經濟……等等。

所有這些事情，如「全球化」，現在看來都很清楚了，只是人們把全球化說成新事物，卻是看反了，我們該回頭看，全球化已歷經三、四百年，不是新生事物。要說真有一點什麼新意的話，唯一有所變化的就是我告訴過你的，資本主義正陷於結構性的危機。這並不是資本主義的「轉型」，因為資本主義仍以同樣的方式在運行，但正撞向前已存在的牆堵，達到瀕臨危機爆發的警戒線。只要資本主義離警戒線還遠，那還不會有問題，但一旦來到臨界的限制，我們現在就面臨這樣的處境，那麻煩可就大了。所以資本家們非常憂慮，他們想方設法要改變世界，設計出一種不平等、可保有他們的特權的新制度來取代這個體系，但不會是一個資本主義體系。他們沒有說，也並沒有使用這樣的用語，但這就是現今正在進行的方向。

在體系的過渡期較易撼動體系

■：但是，如果今天或明天而不是一百年之後我們碰到阻礙進一步發展的那面牆，並且試著在體系內尋求改變，這是否意味著體系本身不僅正處於危機，且是轉型的開始或者僅是處在轉型即將開始的階段？

□：現在正在開始轉型，事實上，我的所有文章都在強調體系將改變，唯一的問題是體

系將會轉變成什麼？現存的體系是不可能繼續生存的，但是這不意謂會出現一個好的體系來取代步入衰敗的舊體系。這是為什麼我不斷的強調：轉變會依不確定的原則，結果是非常不明確的，無法預先分析。因為那是千百萬不可控制的投入因素作用的結果，但我們可以施加影響。當一個體系「正常地」運作時，費力多而收功少；所有的革命看來莫不如此，例如法國革命、蘇聯革命……，社會資源大量投入，動員人民等，而30或50年後，你回顧之餘會問究竟真正改變了多少？答案是：遠比人們所想的還少，因為任何一種體系的強韌之處就在於：它發生混亂之際就會出現把它推回原本狀態的力量。如果碰到過渡轉型，結果會是相反的，這意味著轉型的震蕩劇烈，輕輕一推就可以將原本的體系帶入巨大的轉變，我可用古代的哲學話語來表示：我們從「決定論」的狀況轉向具有相對「自由意志」的狀況。轉型過渡期是人們的努力確實會有所收穫且是很豐碩的收穫的唯一時刻。

所以，像「世界社會論壇」的出現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它可以好好地有效策動明智的計畫者（我們不能預測但可以嘗試），我們是可贏得勝利的。如果我們不把握這機會，而將這機會拱手讓人，那我們就會失利。所以我想接下來的5到10年是相當關鍵的時刻。

我今天剛從網路上讀到由彼德·華特曼（Peter Waterman）所寫的文章，他相當憂慮，他看到在「世界社會論壇」中的衝突，有些本是老左派的成員想將論壇再弄成舊的組織形式

■：在蘇聯有相同的情形，老左派對反全球化、另類全球主義（alter-globalism）、社會論壇……等，也是提出強烈的批評，因

為他們認為這些事物並不符合左派的傳統和架構。

□：他看到了老左派在2003年的論壇比2002年扮演更加強勁的角色。對於由國際委員會決定結構上的重大決策，他頗有意見，委員會是一些不明底細的神祕團體組成，也不清楚是誰指派。他從無政府主義的觀點立論，而這樣的觀點是指你們必須始終讓事情保持在沸騰的狀態，絕不能制度化。彼得·華特曼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他曾經是共產黨員，大約在30年前脫黨，從那時開始就獻身於勞工運動，他知道很多相關的事而且身體力行。

為推動資本主義 往好的方向轉化而鬥爭

■：抱歉，讓我們回到重要的主旨幾分鐘。目前仍具資格界定為資本主義體系的現存體系，現已到達了決定此體系發展的基本支配力已經耗盡，至少不再如以往一樣強有力的景象。這將是一個性質上的轉捩點，有一些客觀的機會出現，會有不同的趨勢出現，而瞭解這些客觀的機會是什麼，是一重大的議題。體系本身正經歷轉變的過程，舊的體系處於危機；同時新出現的體系能往不同的方向發展，這是此重要主旨的主要概念嗎？

□：是的，我們正站在分叉點上。體系到達了某種關鍵性的狀態，有幾條前行的可能路線，但是你不知道要走哪一條路，所以這是一個分叉點。因此就某種意義來說，相當基本的階級鬥爭正在進行，並且會持續一陣子。重要的是，我去年在阿列格里港就說過，左派不要讓自己陷入僅止於指控罪惡的情境；並且認為罪惡的偽裝只是一條舊道路的新形式。在高位的聰明人正設法在不必然保持資本主義體系的情況下，

找出能維持階級制度、不平等、兩極對立的方式。因為，資本主義可能難逃劫數，在我看來是註定必亡，不可能生存。到了2050年，我們就不會生活在資本主義體系中，但是這不意謂世界會轉變為我們所希望的形式，可能會更加惡劣，或者會變得更好，這正是現在我們所要奮鬥的，那就是我經常要闡述的。

■：順著這個話題，出自於你所提出的觀點，形成我們對現代世界概念的其中一項重要特徵，即是核心、邊陲、半邊陲這種在全球社會中的結構劃分；且這不是新的情勢，已存在好幾百年了。但是如果我們檢視所謂的反全球化運動，這個運動不是集中化的，不僅不像老左派的政治組織，例如：共產黨或蘇聯那樣權力集中；而且也不是一個多少看得到核心與邊陲的體系。這可能是一件好事，也可能完全相反。

□：我還要加上另一個他們嘗試做的努力。他們非常用心的嘗試將來自南方的國家和北方的國家的運動聚合在一個框架中，擁有北方的和南方的構成因素。直到現在，沒有任何運動成功的整合南北，而原本聯盟的主要交往只限於拉丁美洲和西歐之間，現已擴張至北美、東歐和亞洲……等。因此，他們選擇在阿列格里港而不是巴黎或蒙特婁會面具有重要的象徵。當然這樣大型的運動團體連結還是有基本財務上的問題。大約有10萬人一起會面，大部份的人必須自付費用(其中99%使用組織公費)，可想而知，來自北方國家的團體勢必比來自南方國家團體富有多了。阿列格里港以南有極多人參加，只因為巴西、阿根廷和南美的人們能以便宜的花費參加會議。這項因素的考量成為是否要將會議召開地點移至印度的爭議之一，因為，如果不移至印度將會流失大量的亞洲人與會。然而，

即使單從馬來西亞到印度就要負擔一筆昂貴的費用，這可能造成距離印度較遠的亞洲國家較少出席會議。但是不論如何有一件值得認真思考的事，如同你所說的他們並沒有專門主事的總部，不論在阿列格里港的總部對自身採取怎樣的態度，但是他們沒有一個核心和管理結構。而這正是彼得·華特曼所談的事，他擔心在反全球化運動中出現管理核心。

不形成共同目標，運動就無法持續

■：是的，我參與了這些辯論，親自面臨了這充滿矛盾對立的過程。

□：這是當然的，他們的成功令人激賞。運動成功到人們樂於參與其間成為一員。你看到Chavez的形勢所顯露的情形……越來越多傳統的工會或政黨現在想加入論壇。對這不可避免的情況我們確實很憂慮，因為這將改變運動的走向。這是一棘手的過程，試著對廣泛的團體抱持開放的態度；同時有效率的運作，還要避免落入在世界網絡中任何一種傳統的階級制度。當然不會出現一個明確的領導者，而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擔任領導者或許是一項助益。困難之處也在此，沒有一條明確的界線來界定誰代表誰發言或做出決定。

■：讓我們回到基本觀點上討論另一問題。如果我們現在正處在十字路口，如同你幾分鐘前說的，對於發展將有很多不同的機會。我們能稱之為一轉捩點嗎？不單是經濟和社會問題間的關連，更是全球經濟和全球政治的連結。

□：這是一定的，現存的體系正值崩解。所以這代表著所有事物正處於急於掠奪重組的狀態。內部形勢的結構或許會瓦解，而且我們不曉得新體系會形成什麼樣的結構。但是對我來說相當清楚的是，現存的結構

只不過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一批待售的商品。而且如果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失去資本積累的基礎這個存在的理由，那麼所有的秩序將會重開。我們或許會也或許不會有國家結構，或是有和現在相同的國家結構。一般而言，每件事情將會是未定的。我們正處於一根本變革的轉型時期，不是改變少數的事物，然後恢復原貌而已，所有事情都會改變。這是一令人相當害怕的景況，是一個非常不可確定的轉變。這也是我看到「世界社會論壇」將面臨的主要問題。組織上的問題是一個大問題，但真正的問題是必須對他們所發起的運動醞釀出一些朝積極方向邁進的想法。因為基本上，截至目前為止這運動始終散發出一股消極的氣味：「停止這！停止那！我們不要世界貿易組織！我們不要美國攻打伊拉克！……等」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要強調的是，除非出現我們要共同邁進的大方向，否則運動無法持續下去。當然，將會有一連串的辯論和討論要進行。

■：這樣的做法將導致結晶似增長的組織化過程。

□：是的，有很多基本的問題，像是「低水準」的組織、財務……等都會是阻礙。但是仍有希望解決這些問題。網際網路作為一花費相當划算的溝通系統將會是一項助力。

運動團體間應互相寬容、理解

■：你說的完全正確。然而，有關要醞釀出積極計畫的這項難題仍舊存在。但在我看來這波運動產生一種新的有趣的現象。雖說

這運動沒有一積極的計畫，但是卻存在許多不同的計畫。這構成了一種新的組織形式即是「網絡」，如果這可稱為組織的話。有很多不同的政治團體，包含對俄國來說是陌生的、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的組織；另一方面包含有對土地、水資源、貿易聯盟、綠色植物的抗爭。有趣的是，這像是不同的手指，不單是一拳頭。當這些手指為了他們各自的企圖和戰略上的目標在5年的時間裡一起工作，彼此建立對等關係，這些分散的手指可形成一個系統。需要手指間相互協調合作才能獲得一個有品質的系統，只有一根手指是辦不到的。

□：你正以最樂觀的形式勾勒出整個藍圖。但是，原則上你顯然是完全正確的，這也正是希望所在。他們正創造出新的組織形式，因為他們肯聆聽對方的主張；並且擁有足夠的「移情同理心態」去瞭解其他團體最急迫的需要是什麼，也能夠將此種需要視為整體鬥爭的一部分。而且至少他們尚未開始相互詆毀，我想是因為相互指控是老左派的傳統，而這遊戲每個人都已經玩夠了。所以「世界社會論壇」拒斥相互詆毀的老遊戲，可能會有少部分人想要指責對方，但是大多數人擁有包容力和聆聽彼此的動力。若他們希望論壇能維持，這是相當重要的。

譯自：On Theory of the "Alter-Globalist" Movement. 2003.

感受你熾熱的心

本刊創刊後承蒙各界捐款贊助，謹申深摯的謝忱。

劉梅君教授 5000元 / 陳映真先生 5000元 / 鍾先生 3000元



台灣의 放鷹者

圖 ■ 陳乃慈
文 ■ 趙剛

「我看到了我們並不是要解放伊拉克人，而是要把他們踐踏在我們的腳下。因此，我成為了反帝者。我反對這隻老鷹將它的爪子伸到世界的任何角落。我極度厭惡在一幅蒙塵的國旗下，用一把蒙羞的步槍，把我們的閃亮男孩送出去打仗。」

這是馬克吐溫在一九〇〇年針對美西戰爭所說的話。我不過是把「菲律賓人」改為「伊拉克人」罷了。這一百多年來，美國在這個地球上打了無計其數的仗，其中有自己打的，也有找代理人打的。找來找去，其中也許只有反法西斯主義的二次世界大戰算是正義之戰，但也正義不足，因為他美國加入的太遲、犧牲的太少、獲得的太多。當今美國對伊拉克的施暴，雖然還不是歷史上最惡行昭彰的，但也許是近百年來人類文明史上的最大醜聞之一；美國戰車開進巴格達，醜態不亞於蘇聯戰車開進布達佩斯（1956）與布拉格（1968），而最近爆

發的性與宗教虐待，更是前蘇聯「邪惡帝國」所望塵莫及的。不同的是，前蘇聯的侵略鎮壓，曾重創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信念與良心，引發了歐洲左翼知識份子的深刻自省，但當今的美國醜聞，則似乎分毫沒有刺激到「台灣自由主義者」的良心。不惟如此，台灣的知識份子與政治人物竟還作態考慮參與這個醜聞。

這個參與美軍的欲望，其實只是「台灣走出去」，這個企求被知覺、被承認的國族慾望的變形之一，可以同情的理解；其他相類的慾望還有加入聯合國與WHO的運動，有政治人物的過境這裡過境那裡的運動，有新任教育部長的乾坤大挪移台灣島運動。出兵伊拉克，自然則是「台灣軍隊走出去」的運動。但這個由美國老大哥執台軍之手走出去的代價，也未免過大。人們利用黑道老大哥撐腰的結果往往是讓黑道完全纏身、予取予求，榨乾之後，然後棄之不顧。台灣和美國的關係其實又未嘗不是

如此！美國在二十世紀內打了多少戰爭，以後不知還有多少（布希說：反恐才剛開始），我們決定好了要和這個文明黑道全球走透透嗎？我們公民要問：如果這是獨立的代價，我們願意付嗎？和美國走透透，美國就會保證台灣獨立嗎？這些都是根本問題。

從這次派兵到伊拉克的爭議，我們應該要看到一個危險的趨勢：我們離和平的岸又遠了一些了。分析這個趨勢可以從兩個大方面來看，一是國家機器的政治性格，一是社會的反戰體質。兩者皆讓人擔心。

一、民進黨國家機器的政治性格

對於這次是否派兵到伊拉克，立委李文忠先生說：「因為台灣高度依賴美國，所以美國如果要求台灣，台灣沒有拒絕的空間」。立委蔡同榮先生說：「台灣拒絕美國，在道義上說不過去。」李文忠、蔡同榮等人認識到一個真實狀況，那就是台獨運動這個政治通貨的黃金存底就是台灣對美國的依附。但這個依附又不能講得太明白，因為那樣就會出現一個令人尷尬的矛盾複合詞——依附的獨立。

李、蔡誠實地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作為美國的保護國的台灣，其實沒有拒絕出兵的權力。加入美國的侵略戰爭可以有直接軍事行動、後勤軍事行動、或非軍事的人員與物資支援，等不同方式，但這是宗主國的選項，不是台灣政治家的選項。因此，台灣現下出錢不出兵，是美國的選擇，不是台灣民意或是政治家的選擇。如果這個清楚了，那麼台獨運動者就必須清楚地告訴他的追隨者以及召喚對象：依賴美國達成台灣獨立的代價，是台灣在軍事上甚至政治上的永遠依附；當然自主不會沒有一點殘餘，但那是殖民地式的行政自主。因此，對民進黨鷹派而言，人謂FAPA只代表台美人的這個批評是沒意義的，因為對他們而言，「台灣人」最終都免不了是某種意義的

「台美人」。

相對於李、蔡的鷹派立場，民進黨內反對或質疑參戰的聲音，都透露著「務實折衷」或「老成謀國」的鄉愿味，認為台灣最多只能做到送送錢糧物資，不必送命。在鄉愿的通情達理下，他們其實都沒有誠實面對台灣和美國的實際宗主國與保護國的關係，反而都在偽裝主體性，偽裝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在主導、在深思，在治理。

所以，民進黨的國家機器，在其外在表演上，可分兩派：李蔡的出兵派，以及其他的不出兵派。這兩派之間的心智差異則是，前者自知台灣國家機器在強權政治奕局中的無主體性，但在此一清醒的態度上依舊追求台獨，知道台獨終是要面對戰爭的。另一派則是傳統市儈派，僅在「表示追求台獨」，但是不嚴肅思考它的代價。這是糊塗派或擬像派（simulationists），想混水摸魚，藉著台獨光環能混一個選舉是一個選舉。但不論哪一派的心智狀態，都無法在這個格局下，進行國際政治判斷，因為附庸國的政治判斷是結構無效的，是徒勞的，是小朋友的「假如我是市長」的作文。

因此，作為公民，不管是支持或是反對台獨，我們應當要求清醒的鷹派把他們的很清醒的選擇不清醒（請美國決定！）的代價說清楚，並且能夠向群眾證明台灣對美國的依附是得到對方的保證的。同時，我們要譴責裝糊塗、什麼都要的、又要親美仇中、又要和平發財的「鴿派」。

在這兩種路線纏繞糾葛之下的台灣國家機器，其實是在不自主的走向戰爭，在國家機器內部，是沒有清醒力量把它拉回的。那台灣的社會力量呢？

二、台灣社會的軍事化

相對於大眾消費社會的主導自我意象，台灣社會與文化中的軍戰精神表面上一直很弱。

但是，軍戰精神從來沒有被台灣的市民社會有意識地反對過，也從來沒有形成過一個稍具雛形的反戰公共領域。台灣社會對戰爭，只有「怯戰」，沒有反戰。有些人說台灣人天性很務實愛和平，只對發財有興趣。但是沒想要打仗並不代表清楚的反戰。反戰不是自然的人性或民族性，更非消費社會的自然產物，而是文明的奮鬥果實，很有價值，但也很脆弱。

例如，我們說美國有一個六〇年代的反戰遺產，連我們現在反戰上街頭都在唱六〇年代的反戰歌曲。但這個反戰文化從來不是內生於基督教文明，也和美國自由民主傳統無關，更和大眾消費社會無關。杭士基的回憶非常清楚的說明了這一點：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你很難說動人去簽請願書。集會也沒有人要來。[...]到了大概是一九六五或一九六六年，越南逐漸成了大話題。然而人們還是很仇視相關的抗議活動。拿我們所在的波士頓做例子。這是個民風相當自由的城市，但當時我們辦不成任何反戰的抗議活動。因為所有的活動都會被粗暴地打斷。演講者會被數百名州警保護，以免被暗算。而攻擊抗議者的舉動，還會被自由派媒體稱頌讚揚。[...]直到一九六六年底，社會改變的程度，才足以容許相當公開的反對運動。而此時離越戰開打，已經有五年的時間了。當時已有數十萬美軍部隊的鐵蹄蹂躪南越。

反戰是反戰運動的成果——這是必須要清楚的。美國最後從越南戰場上撤出，不僅僅是軍事上的潰敗，也是好戰文化的潰敗。這個文明的果實被保守派如雷根與柴契爾等人說成是「越南症候群」或乾脆「自由派」；是八〇年代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的主要文化戰爭對象之一。老布希在九〇年代初對伊拉克的動武，就必須付出非常高的政治代價。到了本世紀初，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在美國被廣泛的民意所支持，事實上是雷根／柴契爾、老小布希

和新保守主義者二十年來的論述勝利。六〇年代的反戰遺產被清除殆盡了。

那台灣社會的自身體質呢？我們有把握說我們的社會文化底子裡的反戰因子，要比六〇年代初的美國還要豐厚嗎？我想很難。台灣的社會與文化其實一直是高度的準軍事化。幾乎所有的成年男性都受過長達兩年的專業戰爭訓練，而對這個訓練的社會與文化後果，到現在還少有專門的研究。以我的有限觀察，台灣男性的男子氣概、社會關係與社會空間的操作與想像，其實是非常軍事化的。這個軍事社會的編組，透過中小學的編隊朝會、升降旗、大會操、大眾排字，到青年救國團，到服兵役等等，一系列的身體工程，其實已把台灣社會軍事化與編隊化了。此外，這個軍事文化的內化是跨階級的。台灣的勞工運動唱的很多是軍歌，工會幹部與一般會員的關係想像也有一部份是在模仿軍官與士兵，集體行動也很依賴軍事編隊與儀式。而台灣的資本家在海外或大陸設廠，對勞工的集體管理也是常常採取軍事化的管理，這和其他的外資企業是很不一樣的。本地的資本家在外勞管理上也是異常的高度軍事化。此外，民間的準民兵編組（義消、義警）也一直是社會中的男子氣概、軍事編組的一種持續。從一個比較歷史的角度看，台灣社會的軍事編組化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沒有間斷過。想像台灣的文化體質，不能忘記台灣是經歷過法西斯主義殖民政權五十年治理的。

更何況，近年來，台灣媒體自覺或不自覺地一直在累積關於戰爭與武器的敘事。媒體這些年來透過對武器採購（甚至它的弊案）、透過軍事對抗中共的論述化，透過對美軍侵略行動的迷彩化報導，以及透過最近對台灣陸戰隊到伊拉克的想象排演，慢慢活化社會關於自身軍事力量的慾念和想像力。雖說台灣軍方和南美洲以及其他第三世界的軍方比較，政治角色比較從屬於黨政，擴張自身力量的企圖較不強

烈。此外，台灣的軍事工業也沒像不少資本主義先進國一樣，大到可以拉抬軍事部門，進而干預黨與政的力量。但這一切不是不會改變的，如果民進黨內的鷹派得勢，軍事力量也將很可能隨之而起，台灣軍頭的力量將大增。李傑的台灣可出兵論可能並非誤判或口誤——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謹慎。

因此，雖然《中國時報》的線上民調只有大約百分之二十的人贊成出兵，但這個數字變成百分之五十以上並非不可能，只要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宣傳開動。何況，這個百分之二十之中，又包括了多少積極的、熱情的、又有行動力的關鍵少數呢？相對他們，廣泛大眾也許並無意志與論述能力與之抗頡。

因此，要如何阻止這個趨勢呢？我們必須要從根本做起，即是「邁向公共化」。這並非高調，而是要從進步知識份子開始，公共論述戰爭的危機與代價。三個常識性問題必須向公眾提出來：誰會從戰爭獲利？誰要為戰爭掏腰包？以及，誰將死？此外，我們還要拓延到更深一層的問題，也就是台灣社會如何重新認識美國、理解中國、面對自己？這牽涉到台灣社會的認同問題。簡單的說，如果這個社會非得朝一個親美仇中的方向理解自己，那麼戰爭的可能性就會一直在那裡。我們要走出戰爭的陰影，除了要批判出自身的不自覺的「美國性」（如陳光興所一直強調的），也要積極地去理解作為一個文化與歷史實體的中國。第二個功夫並不比前者更容易，因為在政治正確的緊箍咒下，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不能被同情理解的對象。我們不能同情的理解中國，就必須永遠把中國當作一個敵對的，僅有「空間意義」的他者，於是只想要脫離它。這樣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終將是悲劇性的。杜正勝魔幻寫實地圖裡的鯨魚，在更魔幻的想像下有可能竟是一粒虛懸的餃子，隨時會落到下面的熱鍋裡。公無落下，公竟落下，其奈公何！



台灣的反戰力量薄弱在於自身體質中的社會軍事化，即我們的教育過程與社會歷練中無不為軍事化制度所強制規整。

上述這些問題，不管簡單或複雜，都一直是被主流霸權論述所壓制的問題，因此也從無機會在台灣社會中公共地被討論。公共論述也許無法阻止大災難的發生，但卻是唯一的機會。戰爭的危機可能正在秘密爬行中。對它的謹慎可能永遠都不嫌過，但台灣的麻煩在卻在於遠遠不及，且不為病。這是令人最憂慮的所在。最後，一語寄給清醒的鷹派，請你們不要過於自信，以為你們在地緣強權政治中可以憑藉聰明機關，控制戰爭之鷹的迴旋升降而不逾矩。葉慈的詩〈復活〉有這麼一句我以為是充滿詩人智慧的對放鷹者的警告：

越飛越遠盤旋而上
老鷹聽不到放鷹者的呼喚◎

以史爲鑑， 美國能給台灣什麼保證？

■羅德水

繼西班牙發生傷亡慘重的大爆炸之後，近期陸續傳出有外籍人士在伊拉克遭民兵綁架的消息，不僅歐美各國人心惶惶，連亞洲的中日韓也無一倖免，由此看來，儘管海珊政權垮台已屆滿一週年，不過，美帝國主義在伊拉克的災難似乎才要開始。

毫無疑問地，布希政府今日的困境當然是自找的，問題是，它給了台灣什麼樣的啟示？

美帝宣傳的「恐怖份子」 其實是弱勢者

還記得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各國對於恐怖份子無不加以譴責，做為所謂美國親密盟邦的台灣（台北的要員一向如此宣稱），當然不能兀自缺席，事件發生後，台灣的大小官員不只同聲譴責，更下令降半旗兩天以表哀悼於萬一，甚至不惜冒著得罪阿拉伯世界的風險，連「選邊說」都出籠了，一副只要美國願意，台北恨不得即刻出兵助戰，協助美國老大哥早日揪出元兇的模樣。

無可諱言地，長期以來台北與華盛頓之間存在著極不對等的關係，作為一個言必稱主權獨立的國家，更多時候，台灣似乎更像是美國的一個州。也因此「911」後多數台灣政客與媒體的反應一點也不令人意外，猶記八〇年

代，美國公然攻擊利比亞時，台灣媒體最常見的報導就是美國「制裁」利比亞，九〇年代有如現代版八國聯軍的波灣戰爭，更曾經被我們譽為是「正義的伸張」，殊不知「制裁」背後真正的原因是格達費不買美國人的帳，而「伸張正義」的真正目的其實是為了分散油源。

相較於美帝在911之後的氣急敗壞，在阿拉伯人眼中，911其實源於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國，源於美國近乎一面倒的力挺以色列，更別提布希政府欲除之而後快的奧薩瑪，正是二十年前美國人一手扶持的所謂自由鬥士，而被美帝塑造成世界公敵的伊拉克總統海珊，在兩伊戰爭時則是美國眼中的親密盟邦，如今被視為恐怖份子大本營的阿富汗，在冷戰時期更是美國防止共產主義擴張的重要防線，這樣看來，所謂的民主與極權，捍衛人權與恐怖主義似乎都只在一線之間，甚至存乎美國一心。

讓我們想想，有什麼人願意成為天生的恐怖份子？所謂的恐怖份子往往是弱勢民族的代名詞，恐怖攻擊往往只是弱勢民族在強權即公理的國際社會中，爭取些許合理生存空間的最後手段，相較於「911」的悲劇，阿拉伯世界或許認為，長期以來自命為世界警察，卻在各國大搞暗殺政變的美國政府，才是地球上最大

的恐怖組織。誤以為民氣可用的布希，若天真地認為軍事行動就能終結恐怖主義，不僅高估了美國的軍力，也嚴重低估了阿拉伯世界長期以來的反美情緒，只消看看，「911」後巴勒斯坦孩童歡欣鼓舞的景象，就可明白縱然美國已順利殲滅奧薩瑪，美國終將要面對更多的奧薩瑪及其追隨者。

美帝在台海問題上首重自身利益

好些年了，全球化與台灣主體論的論調響徹雲霄，然而，全球化總有個立基點，全球化不等於去主體化，更不是美國化。作為一個高喊主體論，又自詡為全球化的台灣，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於我們何異？虔誠的穆斯林與基督徒於我們何異？無辜的阿富汗與伊拉克人民與喪生於恐怖攻擊的美國人於我們又有何異？

或許在所謂北京的壓力下，台灣真的需要美國奧援，問題是美國真能給台灣什麼樣的保證？那些還在幻想美國將支援台灣對抗中國，甚至是協助台灣同中國永久分離的所謂台灣主體論者，似乎也該回頭看看，在美台尚有軍事同盟關係的五、六〇年代，美國帝國主義是如何處理歷次台海危機的？

作為一個帝國主義者，美國向來都只有利己的外交政策，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也向來不惜犧牲所謂盟國的利益。在國共戰事大致底定又未成最後定局的1949年8月，華府原本選擇以發表「白皮書」的方式作為企圖與中共修好的風向球，最後卻在北京倒向莫斯科以後宣告失敗，因此在1950年6月韓戰爆發之後，美國對台北的態度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不但宣佈「台海中立化」，甚至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助下成立「西方企業公司」(West Enterprise Co.)，藉以支持台北方面以金門作為前進基地的軍事突擊行動，其目的不外是藉由此種騷擾性質的突襲以紓解美國在朝鮮戰場的壓力，事實上，美方為了打贏韓戰，甚至也

大力支援在中國西南邊境的「滇緬邊區反共救國軍」對雲南的軍事行動。

無庸置疑地，美國關心的絕對不是台灣的安全，它所在意的是，台灣是否將為中共所奪取，並且用以作為威脅美國利益的基地。所以即便是美國對台北進行軍經援助，也絕不表示他們也將協助台北進行軍事反攻。美國當然希望可以在中國大陸的東南沿海進行騷擾破壞，使北京首尾不能兼顧，但是卻不希望因而與北京同時在朝鮮戰場與東南沿海同時發生戰爭，陷入兩面作戰的困境。正是基於這樣的戰略需求，加上台北與北京的敵對立場又恰好可以完成美國的戰略考量，於是美國便透過「中央情報局」成立的「西方企業公司」執行此一政策，而金門在地緣上的條件自然成為執行此項政策的絕佳場所。也因此當台北在1950年初有意自金門撤兵以全力防守台灣時，美軍當局的力勸堅守自然也就不會令人覺得意外了。

搖擺的金門防衛戰略是為了什麼？

至此，美國在韓戰期間支持台北堅守金門的目的就再清楚不過了。華盛頓要求台北堅守金門的真正目的，顯然不在於這些小島對於防衛台灣安全有什麼決定性的影響，或者是真的相信這些島嶼有助於台北進行連美國都反對的軍事反攻，相反地，恐怕是金門緊鄰大陸的地理位置吸引了美國，美方顯然想要利用金門這樣的地緣特性，作為騷擾中共，使其備多力分無法集中全力於朝鮮半島，從而減輕美方的壓力，甚至因而可以讓美軍獲勝。

然而，此種大力支持台北固守金門的態度，卻在韓戰結束與第一次台海危機爆發之後，產生了根本的改變。美國的改變並不令人覺得意外，主要的原因就是，韓戰結束之後，華府透過以金門作為基地的突襲，以獲取中共情報的動機已經大幅降低，不但如此，在第一次台海危機爆發之後，美國似乎發現，原來作

為突擊基地的金門，此時卻很可能遭致解放軍的進攻，從而使台海危機進一步擴大，甚至將美國捲入其中，危及其國家利益。因此美國政府內部在討論「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範圍時，艾森豪即認為，如明確承諾協防外島，將會是台北誤判形勢而升高攻擊大陸的可能性，更何況所謂的外島事實上包括一些根本無法防衛的小島，若連這些突出的岩石都在美國的防衛範圍之內，更將加深美國被捲入台海危機的可能。這也就是說，美國認為，金馬外島與台灣澎湖的法律地位不同，金門馬祖一向是由中國大陸的政權統治，台灣澎湖則是日本在對日和約中加以放棄的，因此，可以為防衛台灣而戰，卻不能為金馬喪失美國青年的生命。

要避免被捲入因金馬外島而起的戰爭，最為直接有效的做法莫過於要求台北棄守這些小島，因此，當台北在美國第七艦隊掩護下於1955年2月下旬自大陳撤退以後，美國政府隨即於4月下旬派遣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來台，力勸蔣介石自金馬外島撤軍，並以保證不會承認北京、阻止北京進入聯合國、繼續以台北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作為交換條件，但是，由於蔣介石堅持金馬外島攸關台灣安全，一旦自外島撤軍後，將引發進一步之壓力，最後可能導致台灣被託管，蔣介石並且明確指出，無論有無美國的支持，他都要全力防衛金馬，因此美國要求台北棄守金門的企圖並沒有實現，於是轉而希望可以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排除美國對金馬外島的協防承諾。

到底中美協防的範圍是否包括了金門與馬祖？「防禦條約」第五條中規定，「每一締約國承認對在西太平洋區域內任一締約國領土上之武裝攻擊，即將危及其本身之和平與安全，茲並宣告將依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此共同危險。」第六條則進一步對上述的「領土」範圍做了限定，「所有『領土』等詞，就中華

民國而言，應指台灣與澎湖（the terms “territorial” and “territorial” shall mean in respec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就美利堅合眾國而言，應指西太平洋區域內在其管轄下之各島嶼領土。第二條及第五條之規定，並將適用於經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領土。」

因此，依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金馬外島是否在協防範圍之內是有爭議的。雖然該約第六條中規定，「第二條及第五條之規定，並將適用於經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領土。」但是，美方顯然不準備與台北討論金馬外島的定位，當然也就沒有所謂的「共同協議」了，準此，金門與馬祖等外島並不在協防領土的範圍之內。所以當中共於1955年1月猛烈攻擊大陳列島並奪佔一江山時，美國的態度依然未曾改變，從艾森豪對國會提出的咨文可以清楚得知美國對協防金馬等外島的態度，艾森豪指出，「美國及友好的中華民國政府以及實際上所有的自由國家有一個共同的利益，這就是台灣及澎湖不應淪入侵略的共黨部隊之控制。……再者，去年12月，美國政府與中華民國已締結一個共同防禦條約，包括了台灣與鄰近的澎湖在內，……在1954年9月，中共開始了對金門的猛烈砲轟，……我沒有建議說美國將擴大其防禦的義務，至越乎台灣澎湖以外，此已由刻待批准的條約加以規定。」而國會在第一次台海危機發生時所通過的「台灣決議案」（Resolution on the Defense of Formosa），亦僅授權美國總統，「於其認為必要時，得使用美國武裝部隊專事確保台灣與澎湖列島，以防武裝攻擊。」準此，美國沒有將金門與馬祖列入共同防禦條約的範圍內是極為清楚的，亦即，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字，雖然證明了美國協防台澎的決心，但並不意味著美國有義務協防金門與馬祖等外島。不只如此，從美國參議院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通過時所做的解

釋，「締約任何一方自中華民國控制下的領土採取軍事行動需獲雙方一致同意」，我們甚至可以說，「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雖然使美軍協防台灣，但是也進一步限制了台北以金馬外島作為進攻的基地，杜勒斯就曾經在參議院發表聲明，表示如果台北要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必須事先取得美國之同意。

分裂的兩岸與國府的傀儡角色

所以，美國表面上雖然對台北的運補作業進行護航，實際上卻將護航軍艦「停在比十二海浬還遠的海上」，八二三砲戰期間負責烈嶼（小金門）防務的郝柏村更是毫不諱言地在其日記中表示，「如果從政治目的說，則護航的成敗，現還不能說，自美艦實施護航以來，就軍事上意義說，實在是很可笑的一件事，除了招來大規模砲擊，其運補的成效是微不足道的」，而指揮護航作業的第七艦隊司令海軍中將畢克萊（Roland Wallace Beakley）更是再三囑咐美軍艦隊不要與解放軍衝突，「因為他們所引起的砲聲，全世界也許連聯合國大會的議場都聽得到」，尤又進者，當「解放軍砲擊開始後，美國軍艦根本不管什麼國民黨軍艦，急忙退到料羅灣以南五—十二海浬，徘徊觀望，始終未發一炮。」美國此種所謂對金門運補加以護航的軟弱態度，是中美台三方都極為清楚的事實。北京指揮八二三砲戰的葉飛回憶說，「當時我在廈門雲頂岩前線指揮所裡，還準備應付美艦向我軍開火呢，當從望遠鏡裡看到美艦在我猛烈砲火之下溜走的情形時，真感意外」；台北的戰地記者劉毅夫則更為不滿的指出，「我站在旗艦姚道義支隊長身旁，悲慘地看著我四艘孤立無助的運補艦挨砲，再用無可形容的眼睛回頭看美國兵艦，他們好像根本無動於衷，他們好像奉的命令就是來金門參觀，而美其名曰『護航』，哎，狗臭屁的護航啊！」而根據代表中共參與「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王

炳南回憶美方的談話則指出，「你們宣佈的十二海浬的領海，我們是不會承認的，但我們的軍艦也絕不會進入什麼十二海浬。」華府避免與北京發生直接衝突的心態至為明顯。事實上，護航甚至有可能只是美國一種不得不採取的策略，以回應台北強烈要求美軍轟炸大陸以為報復的替代措施，因為如果不護航的話，台北為了防止外島補給線因砲擊而中斷，極有可能對大陸進行轟炸，如此一來，美國捲入台海危機的程度將大大提高。所以如果單僅護航而不需要轟炸就可以突破北京對外島的封鎖，顯然是犧牲最少又最符合美國自身利益的做法。

然而僅僅如此，美國顯然仍不放心，深怕因此捲入中國內戰，而直接與北京為敵，為了一勞永逸解決所謂台灣問題，達成使台海分裂定型化的根本目的，美國所再三企盼的就是取得台北不發動軍事反攻的承諾，終於在八二三砲戰逐漸接近尾聲時，藉由中美聯合公報的簽訂獲得台北方面的承諾。1958年10月21日，美國務卿杜勒斯飛抵台北，杜勒斯來台的目的十分明顯，他希望台北向美國做出不以武力攻擊大陸的承諾。經過雙方的折衝於23日下午發表「中美聯合公報」，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公報的第六項，「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並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礎，建立在中國人民之人心，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其中「非憑藉武力」一語，被懷疑為台北是否已經在美國的壓力下放棄了以軍事反攻大陸的可能，其實，「非憑藉武力」一語的英文版是「不使用武力」（not the use of force），更增加了此種懷疑的可能性。因此，當聯合公報發表以後，艾森豪對此一結果甚感滿意，並認為蔣介石同意放棄武力反攻既符合台北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利益。事實上，得到台北對不使用武力的承諾，可以說正是美國介入第二次台海危機的最大收穫。而

且，限制台北對大陸進行軍事反攻在二次台海危機結束之後仍然是美國對兩岸政策的主軸，據北京長期參與中美會談的王炳南表示，當1962年台北有意利用大陸內外問題頻仍發動反攻時，正在華沙舉行大使級會談的中美二國，態度竟然是一致反對，當王炳南警告說，「我可以斷定，蔣介石竄犯大陸之日，就是中國人民解放台灣之時」，美國代表的回答竟然是，「如果蔣介石要行動，我們兩家聯合起來制止他。」

台灣在中東悲劇上應有反美的同理心

以史為鑑，我們不難發現，就連在美台仍有軍事同盟關係的一九五〇年代，在面對北京的恫嚇時，美國都還顯得猶豫遲疑，更遑論中

美關係早已正常化而北京國力日盛的今天。話說回來，有求於美國者何止於台灣？南韓迄今仍有大批美軍駐紮，漢城對美國的貿易依存也絕不亞於台北，南韓民間卻普遍有著濃厚的反美氛圍，又如同樣是行資本主義卻提倡「亞洲價值」的馬來西亞，再如島國新加坡者，也不致像台北一樣卑躬屈膝。

只是不知道長期以來希望獲得合理生存空間的台灣朝野，在交相討好英美帝國主義，指責恐怖攻擊之後，對於與台灣一樣弱勢無助的巴勒斯坦人，甚至是那些淪為戰爭祭品的阿富汗與伊拉克難民，何時才能寄予些許同情的想像與祝福？而台灣這樣傾全力挺美，到頭來又能換來美國什麼樣的保證？◎

毛澤東：打金、馬是為了幫助蔣介石。

「台灣人民很不喜歡美國人，也不喜歡蔣介石。但是要蔣介石好呢，還是不要他好？現在要他好，他是親美派，但他還想自己統治。另外一批人也是親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國。

.....

美國要簽訂一個聲明，要蔣介石不打我們，要我們也不打蔣介石。我們說不行，金、馬、台、澎問題是我們的內政，你們管不著，唯一的問題就是請你們搬家。

看來我們和美國還得談下去。它不贊成我們，我們也不贊成它，談多久我們不知道。已經談了三年半，恐怕還會談十年，這是世界上最長的談判。你們不要怕我們會打台灣。我們打金、馬是為了幫助蔣介石，因為美國想把金、馬讓給我們，自己佔據台灣。我們放棄金、馬都給蔣介石。蔣介石一困難，我們就打金、馬，美國就可以讓蔣介石繼續做總統。

美國有戰爭邊緣政策，主要是為台灣問題而想出來的。去年我們也採取「邊緣政策」。我們打金、馬和蔣介石的增援船隻，蔣介石就請美國幫助。美國人來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們光打蔣介石的船，不打美國船。美國船升起國旗，叫我們不要打它。美國一炮也沒有打我們，我們也沒有打它。所以大家都在戰爭邊緣上。

美國空軍很守規矩，它總是和我們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離。有一次我們打下了一架美國飛機，因為他越了境，但美國不作聲，不要我們賠。」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毛澤東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代表團的談話。

怎樣才能出現 進步的第三勢力？

■陳培元

從總統大選之前到選後，不斷聽到「超越藍綠」、「建立第三勢力」的呼聲。這些聲音來自對資本主義體制有深淺層次不同的不滿的團體與個人，我們姑且用很粗疏的概念稱之為「泛左翼」。這些團體與個人的世界觀對何謂合理公正的社會以及改造社會之道的觀點容有差異，但都共同認為藍綠兩大陣營俱屬與財團勾結的右翼保守政黨，也都認為國族認同之爭是兩大陣營為了迴避社會、民生等重大問題而刻意炒作出來矇騙群眾以獲取權力的假議題，或者至少也認為統獨與國族認同之爭不是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勞動人民、弱勢族群最該關切的問題。

想超越藍綠，反而陷入藍綠框框之中

從這樣的認識與立場出發，所謂「超越藍綠」之道就變成在各種議題上對藍綠各打五十大板，深恐被貼上藍綠的標籤，對統獨與國族認同爭議則採取迴避或含糊其辭的態度，只強調階級、族群、性別等社會矛盾。對民進黨在這次總統大選中違法弄權，搞槍擊詐術，徹底破壞民主法治原則的罪行則大多不論是非曲直，不敢公開嚴正譴責，起而抗爭，生怕染上「挺藍」的污名。於是主觀上本想「超越」藍綠，實際上卻被困在藍綠之別中，成了兩眼只見藍綠，不是互抹顏色，就是不見是非，嚴重

脫離台灣現實，讓人有不食人間煙火之感。

這真是奇哉怪也，標榜要對抗右翼，強調以社會運動改造社會的人竟會比右翼勢力更脫離實際。乍聽之下，有人或許會認為這樣的指責過苛。我們先舉兩個明顯的例子來說明所言不虛。

首先，近年來，在泛左翼的圈子裡，參政、參選甚至組成第三政治勢力，以制衡右翼的聲音甚囂塵上。這本是正確之路，政治關係到統治、管理社會的權力分配，任何社會團體要保障、擴大本身的權益，甚至依照自己的理想改造社會都必須掌握政治權力，否則就只能淪為依違於政黨之間取利的利益團體，仍擺脫不了被支配的命運。馬克思、恩格斯一再強調階級鬥爭就是政治鬥爭，列寧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其理在此。取得政治權力不外循暴力革命與體制內合法參政兩條途徑。在台灣，姑不論民眾目前的政治意識與社會經濟條件，單從美國牢牢掌控台灣這一點，便可知一島革命殆無可能，剩下的便是先在當前資本主義民主體制下，通過選舉，介入政治，推進落實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社會經濟條件。然而，在資本主義形式公平的民主規則被民進黨徹底破壞，泛藍陣營及自由派人士奮起抗爭之際，大多數泛左翼中人的思維卻仍陷在「非藍即綠」的框框裡，只簡單地視之為藍綠陣營豺狼與虎

豹之間的統治權之爭，抱持消極態度，以顯示自己的「冷靜」、「超越」，不被藍綠「綁架」。可是，對「單一選區兩票制」的這類選舉規則，一些未積極參與抗議總統大選不公的團體卻又慎重其事地大加聲討。試問事關最高權力總統大選舞弊如不加以追究、糾正，等而下之各項選舉還可望公平、公正嗎？參與選舉還有意義嗎？不談槍擊案，光從驗票過程中暴露出的選務敗壞之嚴重，便可知答案。這真是典型的「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統獨問題也會影響社會財富分配

再者，泛左翼一般不願對統獨問題採取明確的立場，只空泛地主張兩岸和平、反對與大陸軍備競賽，而強調階級矛盾、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議題，似乎兩者可以分開處理。其實不然，我們且舉最近民進黨政府在國債日趨龐大、財政收支失衡下，仍預備耗費6千多億台幣購買美國軍備一事來說，這筆鉅款明眼人都看得出是民進黨付給美國的保護費與賠禮金。為什麼要付？不正是因為泛綠陣營罔顧美國警告，積極推動台灣分離的進程，造成兩岸關係緊張，戰爭危機升高的結果？泛左翼提出財富重分配、反對高學費政策、要求教育與醫療的公共化等主張，這無不涉及政府預算收支結構的調整。在經濟增長趨緩、政府收支亦復失衡下，國防預算大幅提高，必然擠壓到教育與社會福利等部門的預算分配額，泛左翼的上述訴求也就必然無實現之日。那麼，試問，泛左翼如繼續迴避統獨問題，不提出可切實有效地確保台海和平的主張，這些公共政策如何落實？對民眾能產生說服力嗎？

台灣當然應該建立有別於兩大右派陣營的進步勢力，客觀上也存在這樣的空間，問題是怎麼建立？上一世紀的八十年代後期到九〇年

代初，曾出現過一段社會運動的高潮，此後卻每下愈況，到現在則如強弩之末，欲振乏力。此中緣由，有待深究。在新自由主義當道二十多年，全球化浪潮洶湧澎湃之下，反制全球化的力量也相應滋長，全球的左翼正呈現復興之機。台灣在金權政治肆虐、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日趨嚴重的客觀形勢下，左翼的力量卻仍未見有長足的進展。這表現在思想理論的貧乏、路線綱領不明確、各小團體分立山頭、政治鬥爭經驗不足等等缺陷上。未來如果不能努力加深思想理論基礎，通過深入而全面的調查研究，樹立既切合實際又有前瞻性的綱領路線，凝聚力量形成符合組織原理、具有戰鬥力的團隊，那麼不論藍營崩解或綠營削弱，甚至藍、綠全都失去多數民眾的信賴，也不可能奢望會出現具備重要影響的第三勢力。

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聯姻

台灣的左翼要想興起，固然是百廢待舉，但有一點基本現實必須先清楚認知正如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所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特點便是由統一的世界市場及國際分工所構成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其政治的上層建築卻並非一個統治全球的世界政府，而是由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因此無產階級的力量總是與民族主義相聯繫，「在二十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中，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聯姻並非異常現象。這些運動如果不是“民族主義”的，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如果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可能是真正“民族主義”的運動。」（I.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1984, p.10.）兩岸的分裂是美國帝國主義遏制中國大陸的產物，台灣要維持與大陸的對峙乃至徹底從中國分離出去，除了充當美國反中國的馬前卒別無他途，這是台灣

分離勢力必然要與美國、日本的極右翼緊密勾結的因由。李登輝奉送釣魚島給日本，FAPA最近之與美國極右派密商派兵赴伊拉克，陳水扁耗費不合理的高價購買美國軍火，都是台獨要與中國大陸對抗的必有作為。此所以大陸許多左派強烈要求不惜以武力儘快解決台灣問題，好以全力對付美、日帝國主義勢力。

面對兩岸關係的現實

兩岸關係目前到了新的轉折點，統獨對決之日日益迫切，台灣不統不獨的所謂「現狀」，已從量變發展到質變的階段。在台灣分離勢力加緊推動制憲建國，泛藍陣營又無力遏阻之下，北京當局發現以經濟促統一的和平策略收效不彰，反成養癰為患，再不化被動等待為主動設定議程，一旦台灣有失，億萬人民之憤必排山倒海而來，政權非倒台不可。目前中共軍方彎弓引箭，蓄勢待發的態勢會不會發展成萬箭齊飛、鷹擊虎嘯，關鍵在台灣的作為。歷史會不會循著台灣國否定中華民國，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國進行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歷程，使得兩岸成為一國一制呢？我們不得而知，果如是，那麼台灣屆時又是另一番局面，前此所論台灣左翼的發展策略也就無實際意義了。◎

毛澤東：蔣介石也反對「兩個中國」，我們有一致之處。

「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企圖搞『兩個中國』，一個大中國，一個小中國。他們說，德國有東德、西德兩個，為什麼不能有兩個中國？我們說德國是戰敗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我們的敵人，按照波茨坦協定的規定分為兩個。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個同盟國。按邱吉爾、羅斯福、蔣介石參加的開羅會議的規定，台灣從日本手裡歸還中國。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日本人暫時佔領了，日本失敗後歸還中國。蔣介石失敗後跑到台灣，在台灣建立政府。全世界還有許多國家同台灣當局有外交關係。我們反對『兩個中國』，蔣介石也反對『兩個中國』，我們有一致之處，有共同點。」

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
毛澤東與拉丁美洲十七國
共產黨代表團的談話。

「歐洲的上層階級只是以無恥的讚許、假裝的同情或白癡般的漠不關心態度來觀望俄羅斯怎樣侵佔高加索的山區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蘭；這個頭在聖彼得堡而在歐洲各國內閣裡有其爪牙的野蠻強國所從事的大規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給工人階級指明了他們的責任，要他們洞悉國際政治的秘密，監督本國政府的外交活動，在必要時就用能用的一切辦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這種活動時就團結起來同時揭露他，努力做到使私人關係間應該遵循的那種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成為各民族之間的關係中的至高無上的準則。」

——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

知識界的 分裂與整合

■祝東力（北京《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副主編）

1

我們這個時代發端於20世紀70年代末。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979年1月中美兩國建交——以這兩個前後相繼的事件為標誌，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時期。其實質則是：在70年代中美關係解凍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被迫承認了中國國家存在的合法性，並接納中國進入國際主流社會。由此，近代以來的「救亡」階段遂告一段落，中國放棄了此前持續20多年的准戰爭體制，開始了另一個階段，即「發展」階段。「改革開放」，就是這一階段的新的政治話語和意識形態。這個歷史時期，迄今已有25年。

在這20多年「發展」的背景下，意味深長的是，知識界的歷史卻是由一系列「分裂」構成的。70年代末圍繞朦朧詩、圍繞人性和異化、圍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等問題，文學界和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分歧已尖銳地呈現，到1981年批判電影《苦戀》和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新舊知識界營壘分明，裂痕已無法彌合。陣營的一方，是忠誠於國家體制、以正統的馬列毛為理論資源的知識份子，也就是一般所謂的「老左派」；另一方，是以自由、民主等為訴求的知識份子，形成所謂的啟蒙知識

界。兩個陣營此消彼長，在80年代，前者迅速邊緣化，失去對整個知識界的良性影響力；後者則穩步取得話語權，在整個80年代執掌知識界之牛耳。應當指出，啟蒙知識界源源從西方獲取精神和理論支持，以一種泛自由主義的立場批評國家體制。但細緻觀察，可以說，啟蒙知識份子所持有的理想主義和反體制傾向，又仍然是「文革」造反精神在新時代曲折而強勁的延伸。其相同和相異處在於：「文革」造反依託的是毛澤東晚期思想，啟蒙主義則背靠西方現代理論，而兩者所針對的則是同一個國家體制。

新舊知識界二元對立，這一格局維持了不到10年，接下來便是啟蒙知識界內部的三次分裂。80年代末，國際社會主義陣營逐漸動搖，國內改革也步入動盪期。權力下放造成的諸侯經濟和城市改革引發的經濟波動，催生了新權威主義的出籠。新權威主義者認為，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經濟的自由化只能在政治集權和政治壟斷的框架內實現，政治民主化則應當緩行。新權威主義重新回歸於國家體制，以新的國家主義為訴求。一方面，他們完全剝離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以市場資本主義的改革為目標，由此區別於先前的「老左派」。另一方面，他們又斷然放棄了民主訴求，重新強化國家體制以作為市場經濟運行的保障，從而與原教旨的啟蒙主義分道揚鑣。圍繞「民主」問題，泛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首次發生危機，持新權威主義立場的知識份子從啟蒙陣營出走，形成了啟蒙知識界的第一次分裂。

冷戰結束，兩極結構塌陷，全球格局分化重組，中國作為擁有獨特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大國，轉而又成為美國圍堵遏制的首要對象。與此同時，作為一個東亞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態勢對世界範圍的市場、資源和權力架構形成了潛在的壓力。90年代，

從持續的經濟制裁到銀河號事件、北京申奧失敗和多次台海危機，中國戰略環境的惡化甚至使民間社會也感同身受。由此，在90年代中期激發了中國民族主義在體制外的崛起，絕非偶然。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出版，這本帶有商業寫作性質的書籍能夠熱銷，揭示了體制外的中國民族主義在民間社會有著深厚的土壤。中國民族主義者憂慮中國在「發展」階段的國際環境，退一步，他們力主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進一步則申張國權，關注中國在海外的市場、資源甚至生存空間的獲取。同新權威主義一樣，中國民族主義也脫離了原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例如不再保有國際主義的價值視野，而僅局限於自身民族利益的訴求。由此，他們也迥異於80年代在啟蒙知識界盛行的世界主義和親西方傾向。圍繞「民族」問題，原啟蒙知識界的第二次分裂發生了。

如果說，中國的80年代提前登場，即始於上述70年代末的兩個標誌性事件，那麼，中國的90年代則滯後展開——只是到了1992年以後，中國90年代的真正性格，如市場經濟和高速增長、全球化和社會分化、吏治腐敗和消費主義等等，才真正呈現出來。在90年代的這一系列特徵中，最引人矚目的大概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刻的社會分化。一方面是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區的高度繁榮，另一方面是廣大農村的凋敝和城市貧民的湧現。而這一切又同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同不平等的國際政治和經貿秩序息息相關。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分野不可避免地投射到意識形態領域，使「民生」成為各方面廣泛關注的緊迫問題，終於在90年代後期引發了啟蒙知識界的第三次分裂：一方面是新自由主義對知識界輿論的主導，另一方面是「新左派」的異軍突起。

2

改革的實質內涵之一是財富和權力的重新

分配，由此激化的各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和衝突，的確需要市場之外的國家力量予以抑制和平衡。80年代末出籠的新權威主義實際上相當準確地預言了90年代的中國社會，即「威權政治+市場經濟」，這也是東亞如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長期採取的發展模式。另一方面，並非巧合的是，恰好是在1992年以後，即在中國90年代的真正性格全面呈現之後，在原啟蒙知識界內部迴響起了關於「人文精神危機」的呼喊。其實質在於，啟蒙知識界原來單純以國家體制為抨擊物件，90年代則突然面臨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兩面夾擊，由此陷於深刻的困境。

民族主義與啟蒙主義的分歧在另一個維度上展開。自1500年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現代文明的成長便依賴於對東方民族的征服，其中，美洲的資源、非洲的人力和亞洲的產品及市場為歐洲的商業革命、政治革命和工業革命提供了前提條件。古希臘時代所實行的二元社會結構，即民主奴隸制——享有民主權利和自由的公民社會與一個龐大的奴隸階層彼此依賴、互為因果，這種二元社會結構自近代以來便在全球範圍內穩步展開了。一方面，西方社會擁有先進的物質技術、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教育文化體系；另一方面，其先進性的取得和維繫又離不開對東方國家和民族的全面侵奪和壓迫。啟蒙知識界曾經盛行的世界主義和親西方傾向完全無視西方現代文明的這種雙重性質，這在冷戰結束以後，全球形勢迅速向19世紀的格局倒退的時代，顯得尤其不合時宜。其世界主義和親西方傾向不再被成長於80年代、成熟於90年代的較為年輕的一代所延續，實在是時勢使然。

同新權威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一樣，「新左派」也曾是原啟蒙知識界的成員，或者曾在80年代啟蒙主義的思想環境中求學和成長。細緻觀察，「新左派」立場觀念的形成儘管是激

於90年代國際國內環境的劇變，但在文化心理的淵源上卻可以遠溯於中國古代的思想傳統。自秦漢時代起，「抑商」就成為中國古代制度、倫理和心理的穩定的組成部分。正像伊曼紐爾·沃倫斯坦所說：「在整個歷史上，大多數的文明，尤其是中國文明，一直在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現代中國，這種文化心理依次體現為20世紀初葉孫中山的「節制資本」觀念、世紀中期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及世紀末的「新左派」思潮。因此，一方面，「新左派」的確較多地從現代歐美知識左翼的文本中獲取理論資源，但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在其思想的底層仍發揮著深刻的影響力。實際上，就「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分歧來說，也並不限於眼前急迫的國際國內問題，而廣泛地涉及對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時代，以及對中西方歷史的基本評價。

「民主」、「民族」和「民生」堪稱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圍繞這三個基本問題，啟蒙知識界經歷了三次大的分裂。如前文所述，「改革開放」初期，在文學和哲學社會科學諸多領域，以正統馬列毛為理論資源的「老左派」圍繞一系列問題與啟蒙知識份子發生激烈論戰，不久便失去影響力，而迅速邊緣化。到世紀末，「新左派」以新的理論資源和論述策略出人意料地亮相於知識界，並對近20年的歷史過程持一種反思和批評的立場。從「老左派」的淡出到「新左派」的突顯，歷史似乎在一個新的高度重新回到了原先的起點，中間所經歷的則是一個近於完整的時代週期。「新左派」的出現也許是一個徵兆，它似乎意味著一個時代行將終結，另一個時代行將開始。

3

知識界的分歧和爭論儘管常被貶稱為「茶杯中的風暴」，但它們仍是現實的社會矛盾，特別是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即現實

的電閃雷鳴在學理層面的投射。中國進入「發展」階段，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國民財富洶湧般地增長，成績有目共睹。但另一方面，近代以來的三個基本問題，即「民主」、「民族」和「民生」問題仍遠未解決。對此，80年代延續下來的「老左派」、啟蒙主義者和新權威主義者，或者90年代出現的民族主義者和「新左派」，都不會有太大分歧。

中國以占人類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步入「發展」階段，其規模是史無前例的，其發展的環境和條件也截然異於西方國家。其中最根本的區別在於：西方國家自地理大發現以來，通過武力擴張和征服，曾獲得在人口和版圖上數倍、甚至數十倍於己的海外殖民地，以此作為人力和原料的供應基地以及製成品的傾銷市場。時至今日，西方仍以其金融、科技和軍事優勢維持著不平等的國際經貿秩序，從欠發達國家和地區源源汲取巨額剩餘和利潤。這種全球範圍的二元社會結構，對於中國來說是無法複製的。在當今的國際政治經濟架構中，中國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半週邊地帶，即處於全球經貿分工體系的中低端。由於現實的國際關係架構，更由於中國當今的人口規模，中國的發展不可能在自身國土之外汲取到較大規模的剩餘或利潤。這就是說，中國在「發展」階段面臨的矛盾不可能被轉移到自身之外，而只能在本社會內部予以消化和解決。這一境況從根本上約束著中國對自身發展路徑的選擇。

因此，中國各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和衝突——這是關係到中國能否繼續發展的最大瓶頸，因而必須化解。隨著問題和矛盾的繼續演化，中國知識界的各家各派還會發生各種各樣的分化組合。但是，如果承認上述中國截然區別於西方的發展環境和條件，並以這些環境和條件為總的參照和座標，那麼，整合當前處於分裂狀態的中國知識界就仍然是可以期待的。◎

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 (Eric Hobsbawm) 在《極端對立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 一書中指出：「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劇烈、影響也最深遠的社會變遷就是……農民的消亡。」二戰後，舉世各國莫不進入工業化、都市化的高潮，尤其是以發展經濟、追趕西方發達國家為施政目標的第三世界國家，紛紛力求將經濟結構由農業經濟轉型為工業經濟，大批農民由農村流向工業都市成為正式或非正式工人。自一九七〇年代，美、歐、日的壟斷資本為降低生產成本、擴大產品市場大舉進行跨國投資，八〇年代新自由主義在西方當道，掀起新一波資本全球化的狂潮，更加速了第三世界的農民轉化為工人的進程。中國大陸自一九七九年實行經濟改革逐步向資本主義過渡後，放棄了毛澤東工農業並舉、兩條腿走路的政策，一味強調市場規律的作用，用剝奪農民、迫使大批農民離鄉離土的方法，為國內外的資本提供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使大陸成為世界最大的加工廠，造就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但也使大陸工農的權益嚴重受損，社會階級矛盾日益凸出。十多年來，大陸農業、農村、農民的所謂「三農問題」日形惡化，雖經有識之士多方呼籲，官方屢謀對策仍未見緩解，主因就在其病根出在基本路線上，已非一些治標不治本的修補政策所可為功。本刊創刊號曾轉載大陸「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先生論述大陸會不會發生農民革命的文章，最近他又為文嚴重警告，再不妥善解決「三農問題」，就有可能再來一場文化大革命，本期我們再轉載李先生論「三農問題」的文章。今年初，大陸作家陳桂棣、春桃合寫了《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深入描述了農民的苦境，引起熱烈的回響，但因書中過於直接地揭露了農村的政治、經濟積弊，觸犯了官方忌諱，而遭到查禁，本刊特邀請大陸學者田力為先生撰寫書評，剖析大陸「三農問題」的癥結。【編者】

防止三農問題 轉化成 革命問題

■李昌平

三農問題的主要表現

1、我國中西部絕大多數農村地區的家庭農業收入在繳納稅費之後的剩餘，難以維持農民家庭的簡單再生產；絕大多數的農民工的工資難以維持本人勞動力的再生產。

我國中西部廣大地區的70%的農村，一家一戶種8畝地左右，正常年景每畝地產1500斤糧食，按照現在0.5元/斤的價格計算，每畝的毛收入約750元，除去每畝約200元的生產、銷售成本和100元左右的各種顯性和隱性稅費，每畝收入約450元，農民家庭種地的收入一般在3600元左右，加上家庭副業的收入也不過5000元，家庭實際現金收入不過3000元。由於教育、醫療、農業生產成本的價格趨高，這樣的收入水平難以實現家庭的收支平衡的。據京津高校大學生回鄉支農調查

的資料，中西部農村有66%的家庭難以維持簡單的再生產，有64%的家庭出現負債。

現在一個農民工進城打工，平均年收入在6000元左右，但要支付900元的藥費、1500元的住宿費、2000元的生活費、200元的衣著費、800元的交通費，實際拿回家的只有600元左右。一個年輕的小夥子要靠年600元的積累完成造房、結婚、生育子女、敬老是不可能的。

2、中西部農村的原有基礎設施功能退化，教育、醫療和其他公共品安排名存實亡，農村市場蕭條，農村金融萎縮，農民生產生活艱難，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圖景已經成為歷史。

最近一些年，國家治理大江大河的力度是很大的，成效也比較明顯。但是，由於農村的組織化程度和動員能力大不如從前，很多地方人民公社時期修建的農業基礎設施多年來難以得到保護和修復，其抗災功能退化嚴重。不少地方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業基礎設施破壞嚴重，以至於正常年景也災害頻繁發生，農業發展的潛在危險日益凸現。農村教育雖然教學樓比過去高了，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教育公共品不復存在，讀書已經成為農民家庭的頭號負擔（家庭收入的36%）；據衛生部系統的一項調查表明，農村醫療支出戶均500元，在農村生病住院已經是很奢侈的事情了，現在農民最怕的是生病。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農村的中學、公路、電力、通訊、泵站等基礎設施都由國家出資建設，現在都是「人民的事業農民辦」。本來就難以維持簡單再生產的農民哪里有能力再承擔本應國家承擔的農村公共品安排！農民可支配的現金收入日趨下降，農民的購買急下降，農村市場萎縮，中西部的鄉鎮企業也因為農村市場的萎縮而難以為繼，四大銀

行也相繼離開農村，貸款難成為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生產的瓶頸。留念故土不再是新一代的農民觀念，這預示著城市的無秩序化時代開始了。

3、農業投資持續下降，農村生態環境日趨惡化，農業增產不增收，不少農村面臨退回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態壓力。

近年除中央財政對農業投入有所增加外，省市縣各級政府都不僅不對農業投入，相反，市、縣、鄉（鎮）政府迫於數千億負債（僅鄉一級就高達2300多億）和數百萬超編人員的吃飯壓力，還層層截留中央對農業的投入；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農村每年動員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參與工程建設，但90年代以後，地方政府再以組織不起「人海戰役」了。投資和投勞的大幅下降，導致農村生存和生態環境狀況日益嚴峻，過去已經消滅的各種疾病在農村又重新氾濫起來，愛滋病等新的疾病來勢迅猛，威脅人畜的生命安全和生產安全。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農產品由短缺實現了向過剩的跨越，但農業的成本上升，農民的生存成本上升，農村經濟的發展進入了增產不增收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加入WTO後，國外的農產品越來越多的進入國內大城市市場，導致很多生產與進口農產品相同農戶的商品量越來越少，不少農戶更加小農化、面臨自給自足化的壓力。

4、中央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資源十分有限，且有限的資源又不斷被基層政府、部門吸納，解決「三農」問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體制和制度性障礙，嚴重影響了農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現在，中央政府對農村的相關政策在貫徹執行的過程中逐步被地方政府異化的現象非常普遍。政府的很多部門都因為有自

己的部門利益，在執行其職能的過程中，部門利益高於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現象也較為普遍。假如中央財政拿出一個億的資金用於農村義務教育，不僅不能減輕學生家長的負擔，相反還有可能加重學生家長幾千萬元的負擔。

農民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現在基層政府和部門「靠權吃民」的現象有氾濫之勢。近幾年中央以極大的力量推行的農村稅費改革，治理亂收費現在，但不少地方上半年「合費並稅」，下半年又「稅外加費」，並且這種現在有普遍化的趨勢。「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不少地方政府和黨的基層組織不同程度的「異化黨和中央政府在農村政策」的行為嚴重影響了農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5、基層幹部隊伍的債權人化，將異化基層政府的性質和農村基本經濟政策，幹群關係惡化。由於種種原因，縣鄉村已經存在數千億的債務，債主絕大多數是幹部和幹部的親朋。農村的稅收已經脫離了「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本質，不少基層政府的財政實際上淪為基層幹部的財政，這異化了基層政府的性質。不少村級組織的領導人，當村幹部就是為了收回自己和朋友的利錢，這異化了黨的基層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的性質。

由於債務基數的巨大，利息的奇高，不少地方的債主的債權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在增加。不少地方幹部為了收回自己的債務，強制性的將債務平攤到農民的頭上，拿不出錢的農民，幹部強迫農民用自己的承包地權抵押，對於這些嚴重違法的做法，市縣政府還作為經驗推廣。有些地方打著產權改革的旗號早就賣光了荒山荒地和鄉村企業，剩下的就只有承包土地、泵站、學校、公共道路了。由於前幾年種地不掙錢，農民種地積極性不高，農村大片大片的土地發包給債

主，30—50年不變，債主種地不交稅費，只用高利貸的利息抵扣就行了，債主變成了不交稅的「地主」。現在學校、泵站也成為債主爭奪的目標。基層政府、組織的性質異化和基本經濟制度異化的趨勢得不到糾正，農村「幹群」關係的惡化和各種矛盾的激化無法避免。

防止三農問題轉化成革命問題

農村存在的問題十分複雜。如果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長時期得不到消化，有可能轉化為新的更為複雜的問題，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

一是防止農民問題轉化為民工問題，即農村問題轉化為城市問題。農村剩餘2.5億多勞動力，且每年還新增一千多萬人，未來幾十年農村將面臨2—3億人的就業壓力。而城市每年所能吸納的農村勞動力在600—800萬。如果農村的經濟不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農村的社會發展（義務教育、醫療衛生、養老保障等）不扭轉市場化趨勢，農村勞動力將無序的湧進城市。假如每年只以2000萬人的速度進入城市，城市的失業率將上升4個百分點。進城的民工、下崗失業的城市居民和失業學生問題交織在一起，那將比農民問題更加難以應對。防止知識份子在城市與工農相結合，要作為今後一個非常長的時期「城鄉協調發展」的主要戰略目標。

二是防止底層貧困問題轉化為社會治理危機。由於貧困，農民和農民工為了降低生存成本或為了活命，不得不非法生存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由於財政危機，基層政府和部門為了生存，不得不以違法養執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一旦底層民眾和基層政府、部門非法生存普遍化，整個社會將失去法治的基礎，社會治理將處於無序混沌之中。

執法違法越來越嚴重，現在司法腐敗越來越嚴重；底層民眾上訪越來越多，維護普通百姓的權益的途徑越來越窄，成本越來越高。地方政府和司法執法部門越來越脫離民眾、失去民眾信任，矛盾越來越多的向北京集中。越來越多的人找不到維護權益的途徑或支付不起依法維權的成本，整個社會在積累「暴力維權」的力量。在今後一個時期，要切實把「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落實在行動上。但誰去落實呢？不實現官本位體制向民本位體制的轉變是落實不了的。用什麼辦法實現這個轉變呢？從目前的改革理論和社會實踐來看，問題只會加劇，難以緩解，實現體制的轉變更無可能。

三是兩級分化問題轉化為階級對立問題。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權力和資本的勾結越來越緊，窮人的權利越來越小，越來越難以支付維護權利的成本。總理也只能給幾個人討工錢，這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樣

下去，那就是逼著窮人（無產階級）開展「新三講」運動：講階級理論、講階級隊伍、講階級鬥爭。

越來越多的人懷念毛主席，那是因為總理也幫助不了幾個窮人討工錢，共和國的法律也幫不了窮人。越來越多的人覺得沒有階級的理論武裝窮人，窮人不團結起來，僅靠總理討工錢是靠不住的，靠服務於資產階級的法制維護窮人的利益是靠不住的。靠不住怎麼辦，毛主席來了個砸爛公檢法，搞了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時時講。如果現在有領袖號召砸爛公檢法，號召「新三講」，說不定又是一場新文化大革命。

誰都不希望革命，我們必須努力避免革命。既不要資產革命，也不要無產階級革命。有妥協的可能嗎？這需要中國人的大智慧。◎

轉載自：烏有之鄉 <http://www.wywxwywx.com/>

稿約

歡迎踴躍投稿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 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以5,000字

以內為宜。

- 二· 理論文章以10,000字為度，特殊狀況不在此限。
- 三· 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 四· 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 五· 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 六· 來稿請於每月十五日前寄達。

建立適當的道義高度去排斥理智和邏輯

評《中國農民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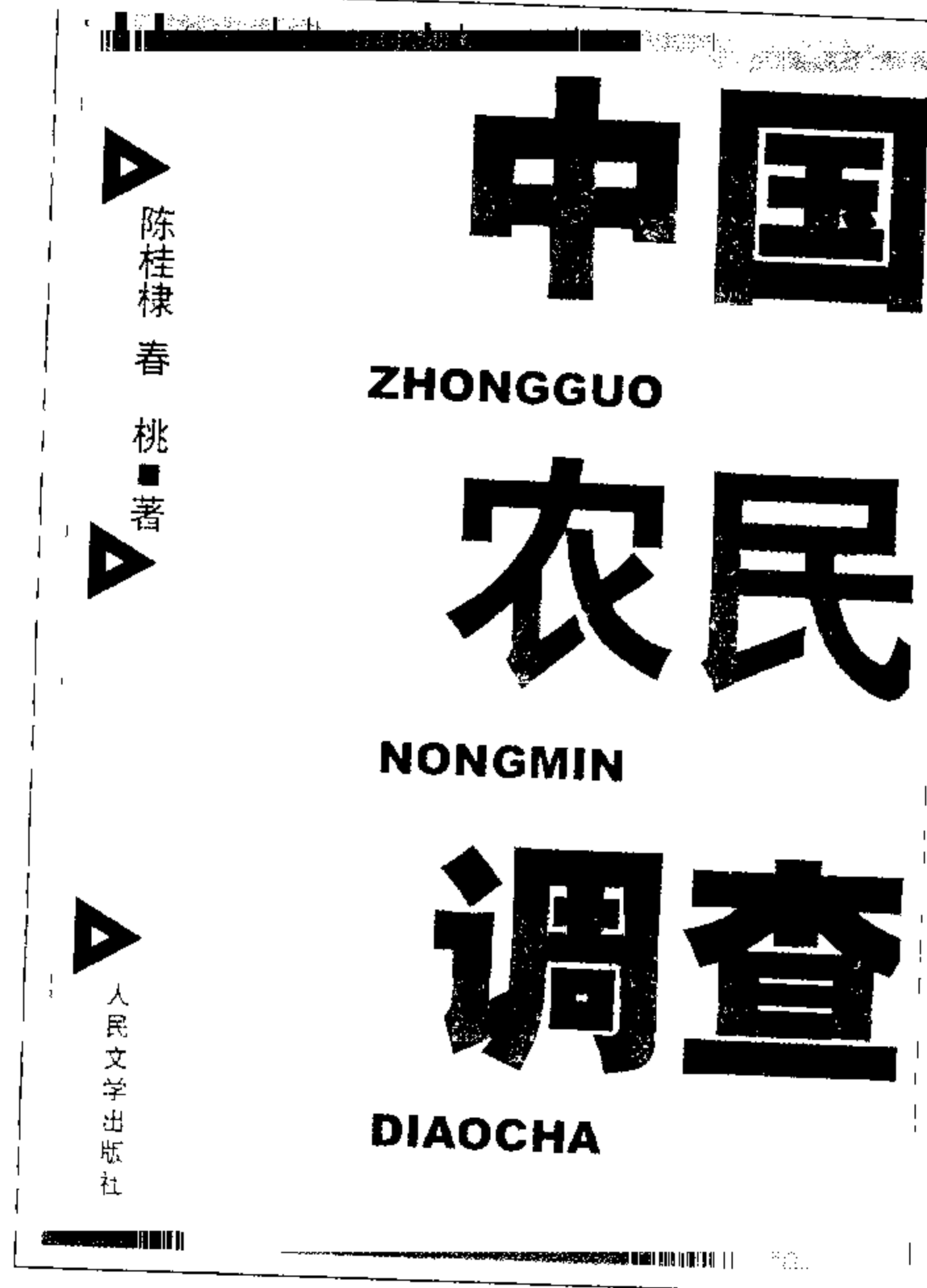
■老田

「三農問題」受社會關注的程度迅速上升，有兩本書對這個上升過程的貢獻尤大，一本是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本就是下面要加以討論的《中國農民調查》。

一、《中國農民調查》的敘述結構

這本書的前四章敘述了因為農民負擔問題，而引發了嚴重的幹部與農民關係的緊張，幹部動員國家機器甚至是直接出手殘酷鎮壓農民。在作者列舉的系列事件背後，給人提供一個這樣的畫面：中國農村不僅是一片貧窮與黑暗，而且毛澤東曾經反復強調的「階級鬥爭」正在殘酷地進行著，那些違背統治階級意志的上訪農民常常陷入生存危機。整本書的敘述結構，是從描述農村中殘酷的「階級鬥爭」現實開始，最後卻是在「制度萬能」的迷信中間結束的。

接下來的四章裡，作者分析了農民負擔問題的由來，「幾十頂大蓋帽管一頂破草帽」一一揭示了政府機構膨脹和農民負擔同步增長的過程，也揭示了各種政績工程與達標考核指標給農民帶來的沉重負擔。作者似乎不知道「科層化」管理和「市場化」服務的改革方向，都是西方的現代化信條的核心，中國農村改革的方向其實就是基於西式現代化的想像，問題只是出在中國剩餘有限的農民，無法享受這樣的高成本現代化管理與服務模式。特別中國農民曾經享受過低成本管理和服務的，筆者自己就還記得毛澤東時代的民辦教師、赤腳醫生和大



小隊幹部都是與農民一樣，在生產隊記「十個工分」的，為什麼今天非要拿高工資不可？農民負擔僅僅是因為人員膨脹和違規費用開支增加嗎？那些「合理的高工資」難道不是農民負擔的一部分嗎？

最後四章是作者心目中間的救星出場了，著力宣揚了一通「好人救中國」與「好制度救中國」。除了與前四章的「黑暗」現實對比顯現的「光明」之外，對於農村和農民的未來則看不到明確的目標和路徑，只給人留下一個迷迷糊糊的憧憬「壯麗的日出」，然後作者就結束了全書的敘述。

改革20年來，農業發展的問題視野和目標排序，也從來沒有系統進行過。如本書所作的這種「實事求是」的敘述，也就是針對個別問題——幹部過度提取行為——進行渲染和發感慨，最後通過指責壞人，然後自己就當上了好人。當然對於這樣一本按照暢銷書寫法的作品，似乎不必苛求，然而整個學術界並沒有顯示出足夠的區別，除了更少事實材料和更多舶來的專業術語之外。倒是這本書比國內的學術界更加值得肯定。

二、如何面對歷史經驗與現實問題

在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初期，主管商業和糧食的副總理李先念，在各地浮誇數字的基礎上，「謹慎」地認為當年糧食產量已經達到10500億斤，被自稱「保守和右傾」的毛澤東再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按照7500億斤公佈糧食產量，並據以安排基本建設規模，結果造成隨後三年的重大困難。毛澤東迅速吸取了這個教訓，從1958年11月份的武昌會議開始一直進行糾偏，直到1961年才把政策調整到位，總共花去了三年時間。這一次決策資訊錯誤帶來的嚴重後果，曾經在1980年代廣為宣揚並大事渲染，照說有這樣的前車之鑒，今天的知識精英和官僚精英群體本應該深深惕戒才對，然而現實卻很難叫人樂觀。綜合書中的介紹和其他消息，江澤民在安徽參觀看到的是一個省縣兩級政府密集投資而建設一新的小崗村，聽到的是按照事先預備「農民就怕政策變」的彙報；而朱鎔基在南陵縣峨嶺糧站聽到的敞開收購的「謊言」，看到的是臨時搬運過來的滿倉糧食；如果依賴這樣的決策資訊渠道去制訂中國的農業政策，這很難不叫人擔心。

中國的農業發展過程，經歷了非常獨特而且對照強烈的兩個不同時代，這樣的明顯對比顯然是有利於總結經驗和教訓的。但是該書在提到以前的集體農業時，總是巧妙地轉移話

題，把人們帶到對窮困人口的關心和國家工業化過程對農民的剝奪上（不提貧困人口比例由80%以上降低到33%的成績，這個成績還是高積累政策支持重工業優先的同時取得的），幫助人們選擇去當「同情心的好人」，而直接遮罩掉對真問題的對比和關注，這樣寫法非常方便地遮罩掉了一段歷史，當然也就自動地取消了問題視野和路徑反思，可以方便地得出自己想要的一切結論。

本書與「改革學術」和「改革輿論」保持了高度一致，在多處反復申述了一種農民「積極性萬能」的腔調，這也是大躍進好傳統——「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一個變相版本（譚震林1958年發明的）。區別僅僅在於從前是說「公有制」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能夠帶來農民的積極性，所以是「萬能」的；現在是反過來論證「土地私有制」和「個體勞動」萬能。在宣傳和論證手法上面，當時使用的「畝產萬斤」等方式論證人民公社制度的效率，難免顯得過於粗糙和破綻百出，而今天的宣傳手法則要精緻得多，「改革輿論」和「改革學術」相互支撐、配合默契。共同點是完全不考慮農業生產的多種限制條件。

在改革二十多年之後，農村問題已經非常嚴重的今天，真正的理論和政策反思，迄今還沒有進行。作為「深入」描寫農村現實的一份重要文本，《中國農民調查》也很難說是做到了有助於人們反省的作用。書中建立的道義立場，看來好處還是不少的，可以方便地通過一種「堂而皇之的敘事」排斥自己不喜歡的一切，甚至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絕常識。大陸1984年比1978年糧食產量增產1億噸，化肥施用量增加96%，1998年比1978年增產2億噸，化肥施用量增加362%，為了論證「制度萬能」形成了一個約定俗成的慣例，「改革學術」和「主流輿論」拒絕討論化肥的作用，這本書當然也遵守得很好。至今在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上

難免留下這樣一個疑問：農民無休止地化肥增加施用量到底起到增產作用沒有？

三、最新的政策調整繼續強化了「單一農業政策」傾向

改革學術和改革輿論最後把全部視野集中農民的「積極性」作用上，或者把農民看作是純粹的「經濟人」，假定農民只受物質利益的調節和對市場價格的反應上，就是在這樣的強大共識基礎之上，形成了一個「單一農業政策」。

溫家寶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間，說要逐步取消農業稅，在幾年時間之內調整到位，已經有吉林和黑龍江兩省宣佈今年一步調整到位。今年的中央一號檔說對農業要「少取、多予、放活」。在湖北把農業稅降低3%（原來是7%），在產糧區調查中間發現，國家開始注重對產糧區農民進行補貼，糧食和種子補貼30餘元。在發放補貼的同時對農民相互之間的合作的組織依託進一步弱化，農業政策越發呈現「單一政策」傾向，試圖通過對農民所得的微調去促使農民自己解決問題。這實際上就是中國政府所能夠做的極限。看來不僅是學術和輿論界都這麼說，決策人士的視野也完全局限在給農民以收入刺激的單一方向上，這個補貼政策的實施，同時還伴隨著強化個體農戶的分散性，繼續瓦解農民能夠依託的組織力量，使得鄉村社會更趨於「原子化」。

筆者自己是職業農民出身，按照我自己和父老鄉親們的見識和經驗，農業生產要受到多個方面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土地面積（包括復種指數）、氣候和灌溉條件、土質情況、光熱條件、農藥化肥投入、種子、還有田間管理等因素。看中國那些專家和權威，好像只有田間管理或者勞動投入這個單一因素就決定一切，因此他們說只要是刺激了農民的積極性，解決了勞動投入的意願，就把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根據筆者自己的經驗，就是在勞動投入這

個因素上面，老家的農民大幅度簡化了耕作程式，單位面積的勞動投入減少一半以上，增產主要依靠化肥投入的增加。在分田到戶初期，每畝水稻需要化肥碳酸氫銨（一種氮肥）30斤左右，至今已經超過120斤，為了維持同樣的產量，農民也不得不逐年投入更多的化肥。今天化肥施用量已經成為農民收入減少的一個重要因素。

根據筆者自己的職業農民經驗，由於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缺乏出路，滯留農村從事農業，結果帶動土地和其他農業生產要素也長期處於充分利用狀態，換言之，勞動力過剩使得農民對市場價格信號並不靈敏，而最近20多年的糧食生產開始的急劇增加，最開始是因為化肥投入增加引起的，後來化肥投入不再起作用了，糧食生產波動則主要是出於自然因素特別是水旱災害的影響。

由於單個農戶的剩餘有限，難以承擔意外風險和學習成本，因此行為模式更加趨於保守，對新技術和新耕作方式的接受能力下降。由於傳統大家庭制度的解體，今天的個體農戶是歷史上規模最小的「小農」，連傳統耕作技術都已經難以順利在父子之間進行傳遞了。今天農村耕作技術退化是非常嚴重的。原來在集體化時期留下的水利設施，由於年久失修和解決不了運行費用問題，普遍陷入荒廢，導致抗旱除澇條件急劇惡化，這足以威脅中國的糧食安全。而失去了合作生產組織作為依託，土壤改良和土地平整為代表的農田基本建設已經完全停止，糧食增產完全依賴化肥投入增加。農民還失去了曾經擁有的低成本教育和醫療服務，農村「看不起病」「讀不起書」的比例越來越高。這些問題在中國農村已經存在許多年了，這些都是在單個農戶的家庭中無法解決的，問題不在於以有限的國家財力去給農民收入做一些微小的調整，而在於農民缺乏適當的合作去解決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問題的嚴重性

還在於：20多年來化肥對農業增產的作用已經發揮到頂點，此後的糧食需求增長要靠什麼來維持？

四、「三農問題」是整個民族在西式現代化道路上陷入困境的體現

本書指責了國家工業化時代高積累政策對農民剩餘的提取，在義正詞嚴的姿態背後難免就突出了另外的潛臺詞：中國的「三農問題」由來已久，人們似乎不必大驚小怪，也不必對今天那些官僚精英群體過分苛責，他們中間的很多人還是做了不少好事的。在另外一個方面，本書作者卻省略了一個重要問題：農民是否應該永遠依靠繁重的體力勞動進行農業生產。毛澤東時代工業化的努力的目標之一是要依託集體經濟組織實現機械化的，在1970年代，筆者老家的生產隊已經實現了抗旱與脫離的機械化，而包產到戶則全面帶來農業耕作方式「傳統化」。作者指責國家工業化過程提取農民的剩餘，卻不指責已經取得的機械化成就發生了根本逆轉的過程，這一切都是為農民著想的道義立場上進行的。

由於分田到戶的普及，單個農戶已經無法使用機械力量了，耕作方式向傳統回歸，高積累政策時期形成的農業機械產業陷入破產，進而又導致上游機床產業的破產，最終瓦解了高積累政策造就的整個重工業和裝備工業體系。而已經形成的資源開發能力卻不會浪費，單個農戶已經無法使用拖拉機了，中國的精英們正需要小汽車。經過了這樣的產業升級和資源分配重點全面轉移的政策調整過程，精英們回頭一看，毛澤東時代的高積累政策對自己需要的小汽車產業毫無幫助，難免有點怨氣，可以因此認定毛澤東時代的高積累政策完全是浪費，但是這僅僅是精英階層的感受而已。

三農問題不僅僅是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問題，實際上是整個中華民族在西式現代化道

路上陷入困境的集中表現，考察中國農民失去拖拉機的過程，實際上也正是中國失去重工業和裝備工業的過程，結果卻是部分精英可以擁有自己的小汽車。少數人的現代化與多數人生產條件改善之間資源分配的深刻矛盾和尖銳對立，使得主流知識精英關於社會關係的敘述至今無法實現「科學化」，主流政治學、經濟學完全抄襲西方並論證「制度萬能」，只有讓人們相信了「制度最終決定一切」，才能夠方便地給多數人許諾「西方的今天是中國的未來」，否則就沒有辦法面對中國的大眾。現實的資源分配關係的高度緊張，使得知識精英只好把給畫給老百姓的「大餅」推遲到將來，這個大餅的實現又完全依賴「制度萬能」的落實。在這樣的敘述中間，將不得不省略掉歷史和現實的視野，遮罩掉對經濟和政治發展起重要影響的社會因素，為了把敘述維持在「制度萬能」軌道上，最終需要以犧牲理智和邏輯為代價。本來西方現代化過程是伴隨著理性敘述的興起，但是事實逼迫中國主流知識精英的言說轉入「傳統化」，1980年代興起「傷痕文學」就曾經起著完整的意識形態作用，至今還是脫離不了「傷痕文學」的氣味，始終無法丟棄講故事套路和自覺遮罩宏觀視野的敘述模式，這是無法相容多數人利益的西式現代化進程，迫使知識精英陷入了一個「整體性言說困境」。

這本書的作者，不見得達到了「自覺」地填補「整體言說困境」的地步，但是社會上選擇合適言說的客觀條件卻始終存在，能夠吸引人的敘述，總是要在特別欠缺的道義立場方面有所建樹，用講故事的形式去重新解釋「歷史和現實」來贏得一點道義，要相對容易一些。這本書在大陸知識精英中間的受歡迎程度，是不是也反映了主流知識精英的「整體言說困境」呢？

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有關一九八九年事件的 的一些思考 (下)



文化帝國主義和「後現代境況」

本文前一部份從「新自由主義」改革與社會矛盾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及其處理這兩個角度分析了一九八九年事件。這裡，將從當時中國所處的世界和歷史的時間—空間角度，亦即外部國際條件，以及廣泛存在於社會上的一般文化條件的角度繼續進行分析。

美國總統布希在一九八九年二月份訪問中國時，邀請方勵之參加官方宴會的行動，是美國在一九八九年一系列公開插手的開始。美國和西方集團對中國的所謂「不同政見者」的格外關注，與它們對中國「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關心，以及在更廣泛意義上，與美國和西方集團對第三世界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整體戰略，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

二戰後的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政治的發展，經歷了種種驚心動魄與出乎意料的轉折、迂回，在回味了歷史事件的山重水複、不勝逆料之後，再來看戰後美國對華戰略，就能發現更令人歎為觀止的高度穩定性和一致性。這個戰略指導思

想，從艾奇遜提出「把希望寄託在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身上」、「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國得到自由」的戰略構思開始，到肯南對「圍堵東亞共產主義」戰略的具體操作的設計，再到麥克亞瑟和杜勒斯將西太平洋大新月形包圍圈與「和平演變」的戰爭、和平兩手對華戰略具體部署到位，這一整套戰略哲學和操作程式，不但沒有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而有所改變，相反，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方向，證明了它的先見之明。

美國的對華戰略不是一項孤立的外交決策，而是它全球戰略之一部份。這個全球戰略，簡單講，就是按照美國自己的面貌、理想和利益來徹底改造世界，實現以美國為核心、聽命於美國統治層、服務於「美國利益」的世界市場型資本主義體系，建立並永久維持一個以美國為金字塔頂的、以美國的文化價值實現徹底征服的四海臣服、萬方朝拜的全球帝國。（註二十三）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美國對華戰略的，是考察一下戰後美國針對第三世界戰略的演變，特別是戰後以來美國在第三世界從支持反共獨裁政權到有控制地放鬆政治高壓、並推行按美國所開的「民主化」「處方」的轉變。發生這個轉變的原因比較複雜，超出本文的範圍，其中較為主要的包括：作為最首要的冷戰自由主義反共櫥窗的日本，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後顯露出穩定發展的趨勢，緊隨其後的是七十年代的南朝鮮、臺灣，七十年代以來全世界範圍內各種革命運動和反體制挑戰的漸趨低落等等。這個轉變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美國實現全球統治霸權的方式轉換，即從暴力與強迫基礎上的控制，轉換為對資訊、知識和文化的操縱基礎上的控制。

首先，這種新的操縱和控制是建立在以西方國家中心、以西方化的第三世界大都市為次級中心和中轉站、以貧困不發達的廣大地區為週邊邊陲的資訊交流和通訊的基礎結構之上。

全世界90%的國際新聞和資訊被西方國家的四個商業新聞集團所控制；通過對新聞報導的篩選、解說和操縱，西方中心力圖實現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上對非西方邊陲的完全徹底的凌駕、滲透和主宰。因此，有了這種更高層次上和更有效的控制，也就不必將寶押在個別的世界獨裁者身上，而有可能以更隱蔽、更微妙的手段從根本上扼殺反抗和批評意識。這個思想，在一份題為《贏得冷戰：美國的意識形態攻勢》的美國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報告中被精闢地表達：

在外交事務中，有些目標通過直接和外國的人民接觸能夠比和它們的政府接觸更好地達到，在今天，通過通訊技術和工具的仲介，有可能接觸到其他國家人口中重要而富有影響力的那部份人，從而給他們傳達消息，左右他們的態度，甚至能成功地促使他們採取某些果斷的行動。然後，這些團體就有能力對他們的政府施加相當大的影響。（註二十四）

從這個視角來考察美國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及「不同政見者」的態度，能看出美國支持

註二十三：Z·布熱津斯基《競爭方略》(Game Play)第一章)中說到：「我使用帝國這個術語作為一個道義上的中性詞，用以描述政治關係中的一種等級制度。這個制度可從集中權力的中心向外輻射其影響。」「雖然美國承擔其帝國角色時有些勉強，而且並不承認自己是帝國，但國會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辯論，卻始終集中於怎樣更有效地保護和治理美國的帝國領地——而且鷹、鴿兩派的政綱都運用了純屬帝國派的觀點。美國支配的帝國體系通過各種條約的安排而正式化，一些安排實際把西歐、日本和南朝鮮置於被保護國的地位。目前這一世界帝國很大程度上還僅是一個由共同利益及由非正式的民族和商業聯繫組成的混合體。」

註二十四：Ammand Mattelart, 1978, "The nature of communications practice in dependent society,"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 1, Winter, p.12.

「官方的自由主義和市場取向的改革」並同時支持中國「民間的自由主義反對派」的兩手策略是一貫的和根本的，同時也不把希望全部押在官方或民間的任何力量之上，而是利用其中矛盾，分而治之，並不斷尋找最忠實的代理人。而實施這個兩手策略的先決條件，則是將精心設計的一套思想文化與價值觀念大規模地輸進中國並取得主導地位，從而使任何批評與不滿意識都無法擺脫西方主流媒體所布下的無形的思想禁錮。

這裡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這種新型的文化帝國主義並不是完全依靠其文化產品的直接的、正面的入侵，而是常常依靠間接的、示範性的和發散型的影響。以所謂「中國缺乏媒體自由」來否認文化帝國主義的存在的觀點是膚淺的。例如：中國的大眾傳媒雖然是在政府的管理之下，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對西方文化影響的阻斷，相反，恰恰可能是：在中國自己製作的節目中，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大量傳播著西方意識形態宣傳，因為這種宣傳早已滲透到了人們的思維定式、語言辭彙和資訊傳達的約定俗成之中。研究第三世界的媒體的學者指出：在這些國家裡，即使它們的電視臺不播放西方或美國的電視節目，西方和美國的消費主義的文化與意識形態依然能夠發揮影響。（註二十五）

中國八〇年代「現代」思潮 與西方戰略扣合

這一點從一九八九年事件前夕中國的文化思想狀況中就可以得到印證。在思想領域，已經被第三世界八十年代的災難證明為笑柄的「現代化」理論，在中國竟被包裝成「未來學」的時髦貨色，由政府官員極力贊助並大量印行，在中國知識分子精英中成為盛極一時的意識形態時尚。這種時尚被凝聚成象《河殤》那樣粗俗、淺陋的宣傳品。由黨的總書記帶頭，改革決策者對作為美國戰後反共戰略之一部份

的東亞「四小龍」模式極力推崇，更進一步在政治思想上凝聚成所謂「新權威主義」。一些在全國頗有聲望的知識份子，如方勵之、嚴家其、王若望、溫元凱者流，在解放思想、打破禁區的動人名義下，實際上成為西方意識形態的熱忱的兜售者和帝國主義的文化買辦。這裡，並非是在詛咒所謂「政策寬鬆」、開放言論的罪惡，相反，而恰恰是指出：在暢所欲言、無所禁忌的「思想解放」的外表之下，實際上是由一小部份知識份子精英以生吞活剝後的西方冷戰教義實行思想上的輿論一律和沉悶專制，在為民請願的旗號下，將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主義戰略內化成一套改革綱領，實際上積極地為跨國資本主義給中國套上奴役和暴政的枷鎖效犬馬之勞。而這一切是在熱熱鬧鬧、亂亂哄哄的「思想解放」的喧囂外表之下進行，才是它諷刺和可悲之處。

在社會和大眾生活層面，另一種形式的文化帝國主義在大規模入侵，那就是西方消費主義商品和符號排山倒海而來。自從最早「領導新潮流」的精工表、雷達表、雀巢咖啡「味道好極了」等進入中國以來，大量的西方消費品和廣告迅速佔據中國的市場和大眾媒體，並成為時尚追求與社會地位攀比的顯著標誌，整個社會的文化與意識迅速地可口可樂化。以大城市 and 社會精英為風氣之先，中小城市和廣大市民跟進，喝可口可樂、吃漢堡包、穿耐克鞋成為「跟上潮流」、「觀念更新」的符號暗示，甚至連中國自己給小學生生產的產品，書包上印著美國國旗和林肯像，文具盒上畫著米老鼠、唐老鴨。這裡，也並不是說這些淺薄的可口可樂文化本身有多麼利害的魔力，相反，它

註二十五：G. Chu and Alfian, 1980, "Programming for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pp.50-74.

們只是文化帝國主義滲透的結果和症候，是這些現象背後的政治經濟勢力在謀算和推動著貪得無厭的攫取和控制。

以上的討論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外部勢力在中國一九八九年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和角色。值得強調的是：真正發揮了重要作用、使事態朝著符合美國對華戰略方向發展的，是長期的文化符號和價值觀念的滲透，特別是通過中國本土的買辦性的知識份子—政客精英為代理人來間接發揮影響。

西方影音傳媒的殖民滲透

本文前面曾指出：一九八九年學生和群眾的訴求中存在各種不同的、互相矛盾著的政治傾向，如何敘述和解說這個事件就成為一件有爭議的事情，而敘述和解說本身又成為一種政治行動參加到事件中去，並影響著事件的進程。這裡將考察西方新聞媒體及其特有的高技術傳播方式對事件的影響及對事件的解釋權的主導。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西方媒體大規模地聚集在北京報導中蘇首腦的歷史性會晤，因而一九八九年事件經過了一個西方商業媒體以其最新的全球衛星技術和影像操縱手段進行再創造的過程。

通過聲音影像多媒體處理技術和衛星傳播技術，將形象、資訊、商品與意識形態完滿地凝聚在一起，將新聞報導和政治灌輸融為一體，以實現思想文化上更嚴密的控制和操縱，這是當代資本主義所特有的文化現象。許多學者將這種文化現象和戰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演變相聯繫，並以「晚期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第三階段」的概括，將其與二戰前以民族國家和民族市場為主要角色的資本主義相區別。這個階段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和內在矛盾在七十年代以後日益突出，這些包括跨國公司在全世界的迅速繁衍、新的國際勞動分工的出現、世界經濟的金融化（包括金融投機

的興起和第三世界的巨額債務的出現）、「靈活生產」取代「福特模式」，以及在文化上，以再現美國生活方式和制度神話為主要內容的大眾消費主義在全球各地區的滲透和主宰。關注資本積累的矛盾的發展深化及其相應的在政治與社會層面上的調控方式的變化的學者，反駁了所謂「後工業社會」論有關資本主義已經從本質上發生轉變的觀點，認為戰後的晚期資本主義或多國資本主義，意味著資本的統治延伸到在此之前尚未商品化的領域，意味著資本統治的更純粹形式；在綠色革命將第三世界的傳統農業社會加以毀滅的同時，新的殖民主義，以廣告媒體工業和全球資訊網路的形式，進一步對自然和無意識進行更深刻的殖民滲透。（註二十六）

一九八九年西方媒體蜂擁聚集北京，使正在發展的矛盾衝突疊加上了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後現代」的自我表現和媒體影像操縱。和「後現代狀況」的「遺忘歷史」的特點相聯繫，假如一九八九年的事件還能夠稱得上是某種「運動」的話，那麼，它確實「遺忘」了近代中國歷史上貫穿始終的群眾運動和社會運動，特別是具有先進傳統的學生運動，因為這些運動從來都是和反對帝國主義、走向社會

註二十六：Jameson, Fredrick.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 London 1978.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Brasil Blackwell, 1989. Bob Jessop, "Regulation Theorie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Economy and Society*, 19:153-216. 1990. Alain Lipietz, *Mirages and Miracles. The Crises of Global Fordism*. Verso, 1987. Edward Herman, Noam Chomsky, *The Triumph of the Marke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5.

主義前途和道路的綱領目標相聯繫，也總是和工農勞苦大眾相結合、長期地進行耐心細緻的組織工作等等。而一九八九年的所謂「運動」只延續了春夏之交的一兩個月，它的根底之輕，只及于西方記者的鏡頭所光顧之處和之時，雖然是以「反腐敗」的為民情願的社會關懷肇始，但很快就和任何社會矛盾的嚴肅分析相脫節，流於純粹的面對媒體（主要是西方媒體）的形象演出。除了時間跨度上的來去匆匆，在組織上也極度地頭重腳輕，出現了幾個知識份子精英「領袖」和一群學生「領袖明星」，而他們的權威僅僅來自簇擁著他們的西方記者的攝像機、話筒和閃光燈。新中國第一代在觀看電視廣告中長大的大學生們，他們本能地瞭解西方記者尋求戲劇性畫面的媒體盛宴的製片需求，於是先後即興上演跪在地上遞交請願、唱《國際歌》、樹立「民主女神像」等特別上鏡頭的場面，從封建主義、共產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的符號庫裡得心應手地任取所需。

然而，五彩紛雜的「後現代」演出從來也不是有關「多元」、「反體制」，受西方媒體誘導和操縱的學生「運動」也不是真的那麼天真無邪地「無中心」、「多主題」、「無宏大敘事」。西方媒體的決定性「中心」和「主題」就是大商業財團的利潤和市場，這又與跨國公司利益和西方集團的全球政治軍事戰略構成一個嚴密的結構。西方大商業媒體在精心篩選過濾資訊、堅持不懈地宣傳冷戰和反共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方面，是絕對不容有半點即興和隨機的因素的。八十年初，西方媒體對波蘭政府鎮壓團結工會的新聞加以大肆報導，而恰在同時，美國支持下的土耳其政府鎮壓工會的新聞，則完全不加以報導。中國一九八九年事件期間前後，在南朝鮮、菲律賓、南非和薩爾瓦多，爆發了人民群眾的遊行示威、抗議美國所支持的獨裁政府等活動，由於這些鬥爭是挑戰資本主義體系和美國霸權的，對這些事件的報

導和對中國事件的報導相比，可以說幾乎是被忽略的程度。只有如此，《時代》週刊和「有線新聞網」的新聞節目，才能真正和插在新聞之間那些商業廣告——花旗銀行、福特汽車、可口可樂——保持完全一致的「宏大敘事」：資本主義和美國制度是人類進步的頂點。

以上談的是西方勢力通過新聞媒體和文化符號間接地影響操縱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情況。當然，以美國政府為主的西方勢力也毫不猶豫地在事件中進行了直接的插手。這一點，被一九八九年以後中外媒體所透露出的許多報導所證實。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幾個月內，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中國的運作系統基本合二為一，在北京積極活動。美國大使李潔明在燕京飯店、北京飯店、京倫飯店和友誼飯店分別派駐了「監視小組」搜集情報。美國之音的對華廣播從每天兩個小時增加到八個小時，再增加到十一個小時。在五月的最後一周，美國大使館為兩百多名中國人特別簽發了簽證，並以「特別基金」為他們提供旅費。之後，中央情報局參與了秘密營救「民運」領袖的「黃雀行動」，並為逃亡行動提供了夜視鏡、紅外線信號裝置、快艇等裝備。（註二十七）

美國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背景因素

由「新自由主義」改革與官員腐敗所造成的不滿所引發的一次群眾抗議運動，反而又得到美國這個「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總設計者的利用和支持，這看上去似乎矛盾，但這恰恰展示了美國多管齊下、兩手並行、分階段推進的既定而又靈活戰略。作為自由派知識份子精英的至高無上的精神教父，華盛頓對他們的支持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它對群眾反對腐敗、反

註二十七：見《當代思潮》九三年第五期，牛羊《美國中央情報局與中國》。

對物價上漲的呼聲，為何也表現出同情支持呢？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調整必然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貧富兩極分化、物價上漲、社會動盪這一點，美國自己心裡知道得最清楚，何況在第三世界各地的結構調整所導致的食品騷亂經常是伴隨著焚燒美國國旗的民眾憤怒的。有一點很清楚：美國對別國國內政治派別的支持，從來不是出於道義原則，對意識形態教條也不總是那麼嚴肅認真：美國在戰後也假惺惺地支持過一些第三世界的反殖獨立運動，還支持過波蘭的團結工會，然而它的真實目的是盡人皆知的：不擇手段地推動和維護美利堅帝國的利益，唯此一條，其他假仁假義，投機取巧，背信棄義，都在所不辭。美國對事件直接插手的契機，就在於政府與學生和群眾之間的互動，沒有導致尋求解決問題的良性迴圈，即檢討物價飛漲、腐敗橫行的真正原因，調整改革的失誤，相反，互動出現了對抗性的惡性循環，並發展成為一場政治危機，為美國從中漁利提供了機會。美國總統布希認定：「這些學生是我們的人。」其原因不在於美國統治層對任何學生運動有何迷戀（實際恰恰相反），而是由於在當時當地削弱中國政府的權威符合美國的意圖。總之，使得外部勢力得到干涉介入的機會，是自身內部矛盾的斡旋和解決的失敗所造成的：反腐敗的群眾缺少揭露批判「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的明確理論思想，反而被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精英所欺騙利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力量無法正確認識社會矛盾的真正性質，更無力發動群眾，才使得西方勢力乘虛而入，輕易地主導了學生運動的政治取向。深刻認識一九八九年事件中各種矛盾因素的共存，包括已經分析過的通貨膨脹導致群眾抗議、政府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簡單粗暴，以及外部勢力伺機而動、介入干涉，多重因素的合力造成了最後的結果，是正確評價這個事件的性質的最基本前提。

一九八九年事件對中國發展進程的影響

本文前面部分從「新自由主義」改革與社會矛盾、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和文化帝國主義等方面分析了發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事件。本文的最後一部分將討論一九八九年事件對中國九十年代發展進程的影響。

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證明，發生在短時期內的政治動盪，特別是那種廣泛涉及社會各階層、暴露出政治精英層內部的矛盾分裂、並且最後導致流血收場的劇變事件，都會給後來的社會與政治的發展進程留下深刻的印記。中國的一九八九年事件，也被證明是中國八、九十年代社會政治發展的分水嶺。

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最主要矛盾衝突圍繞於兩個方面，即經濟的和政治的：在經濟方面，市民群眾對改革開放政策所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政府官員貪污腐敗、特別是價格闖關造成的物價飛漲嚴重不滿，「自由派」知識份子精英則迫不及待地推動全面的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綱領，在政治精英層記憶體在著在急進改革與漸進改革、計畫為主與市場為主的爭論。在政治方面，市民群眾和學生憑著集體記憶運用起大民主的手段，並試圖對官員腐敗現象加以批評和監督，「自由派」知識份子精英和改革派精英則操縱利用民眾街頭抗議的形勢，趁機推銷「多黨制」、「保護私有產權」的「西方民主」綱領，政府則為了繼續推行既定的改革計畫，強制恢復「壓倒一切」的「穩定」。

顯然，無論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存在著截然相反的訴求和發展方向。而暴力收場的結果，只是「穩定壓倒了一切」，造成動亂的深層矛盾並沒有解決，代表不同政治訴求和改革綱領的階級或政治勢力之間並沒有發生正面決戰，相反，這場決戰被動亂的流血收場所延遲和打斷。在新的政局鞏固之後，哪一種政治經濟政策占上風，是否所謂「保守派」、「反

改革派」就一定隨著戒嚴部隊的進駐而捲土重來，事情並不會完全按照西方冷戰教條的庸俗邏輯去發展。

中外歷史上不乏正反兩方面的案例和多種多樣的結局。由精英與群眾參與的抗議或反叛運動被鎮壓之後，生存下來的政權是得到加強呢，還是被迫依照抗議運動所提出的訴求和綱領推行改良呢，還是饒恕、接納反叛的精英、同時繼續鎮壓反叛的下層？美國對革命後的古巴實行豬灣入侵並企圖挑起國內反革命暴亂，古巴革命政權進行了成功的抵抗，並由於這個事件大大地鞏固了自己；美國的南北內戰，其實質是北方成功地平定了南方的叛亂，但在擊敗南方之後，北方統治層在一定程度上寬恕、接納了南方的奴隸主階級，在改造南方奴隸種植經濟的同時，對種族歧視制度和對黑人的社會壓迫基本未加觸動。另一類實例是佛朗哥、蘇哈托、皮諾切特等右翼政權在血腥鎮壓人民反抗之後，推行白色恐怖，實現了長期穩定的反動保守統治。當然，執政者在鎮壓異己之後又積極推行反叛精英所提出的改良綱領，在歷史上也不乏其例。最突出的也許要算在鎮壓「百日維新」之後清政府所推行的「新政」，以及俄國在一九〇七年之後斯托雷平推行資本主義發展同時鎮壓民眾反抗的反動統治。（註二十八）

一九八九年的矛盾衝突中幾種政治力量及其綱領和訴求混雜交錯在一起，因而它的後續發展既相似於歷史上反復出現過的一些格局，也顯示出它本身所特有的階級和時代的組合。

動亂的直接後果是使政治上層不得不對改革政策進行一定的反思與調整，這首先來自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中將最主要的問題歸結為：「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麼違法亂紀和腐敗現象等等，都出來了。」「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在外部環境

方面，鄧小平指出：「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最終發展成為一個附庸國（註二十九）。這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領導人第一次承認中國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重新殖民化的危險。江澤民《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更明確談到了改革開放中存在著一些人要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的「主張」：「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用勞動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育和養肥一個資產階級，在我們人口眾多、社會生產力很低的情況下，只能使大多數人重新陷入極其貧困的狀態。這種資本主義，只能是原始的、買辦式的資本主義，只能意味著中國各族人民再度淪為外國資本和本國剝削階級的雙重奴隸。」對前十年改革的反思的深刻程度，以及付諸政策時的言行一致的程

度，是影響中國後來發展方向的關鍵。吸取勞動人民的血汗的中外剝削階級在中國的重新興起、勞動人民淪為外國資本和本國剝削階級的雙重奴隸的發展趨勢，這才是認識到了改革方向失誤的本質，它是造成社會動亂、民眾抗議的根本原因。在這個認識基礎之上，所召喚的政策方針與政治實踐應該是昭然若揭的，同時也是直率無情的：那就是發動群眾，喚起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識，依靠廣大勞動階級的政治參與熱情與強大力量去遏制正在復活和興起的資

註二十八：很明顯，這裡所列舉的案例中，「反叛」和「鎮壓反叛」的階級角色和所謂「歷史進步作用」各自截然不同；正是由於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動亂」和「平息動亂」具有罕見的含混和爭議的性質，才故意列舉了這些性質完全不同的事件，以求全面的比較思考。

註二十九：鄧小平《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鄧小平文選》。

產階級，特別是依靠下層群眾的力量監督和揭露「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制止腐敗勢力和資本主義化「主張」在黨內取得當權地位。事情的發展證明，最高層的認識，和政治精英層內不同力量的懸殊對比，不允許中國的政治實踐向這個方向發展。

蘇東事變與中國改革問題檢討

沒有群眾政治實踐的支撐，對改革的反思就變得蒼白無力，甚至給人一種官方御用的印象，即不敢聯繫觸目驚心的社會現實，又缺乏針砭時弊的批評精神，特別是：沒有形成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理論觀點展開大辯論、大批判的形勢，這首先是因為自己本身就在理論問題上心虛，自信不足，其次是為了「穩定壓倒一切」，害怕「爭論」。因此不僅不能爭取到廣大的一般群眾的信服，反而是讓「自由化」的知識精英們所鼓噪的庸俗淺薄的冷戰反共教義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群眾意識。在最新的國際事件發生後，就無法避免被西方「共產主義死亡」的聲浪所震蒙，就只剩下「不打頭」、「韜光養晦」一條下策了。

這裡所說的國際事件自然是指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的蘇聯東歐事變。本文不打算展開分析蘇東事變，這裡僅指出幾個要點：一、自從戰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興起以來，蘇聯就不再是世界進步力量的領袖和中心，也不再是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的真誠盟友，其興衰也不再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關鍵因素；萬隆會議、印度支那人民反帝鬥爭、第三世界國家爭取經濟主權的鬥爭、一九七四年第三世界國家發起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這才是貫穿戰後時代、從根本上挑戰世界體系的一條鬥爭主線，人類社會主義前途的可能性也維繫於此：在這裡面具有關鍵地位的，就是作為不發達國家的中國走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脫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新

路的可能性。二、事實證明蘇聯工業化道路是成功的，因此才成為許多受西方列強壓迫下的第三世界國家羨慕和學習的模式，而問題在於蘇聯沒有發展出可持續的、不斷革命的社會主義政治；至八十年代，這突出反映在勞動者的積極性極度低落造成生產停滯，因而導致政治、經濟的全面衰敗和最終危機的到來。東歐國家從七十年代起，就實行「市場社會主義」的改革，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引導的依靠外債的發展，這恰恰是導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政治危機的直接原因。三、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的瓦解從來就不意味著社會主義運動的重大失利——這個失利早就發生了，它只是一個長期潰敗過程的最終完成。然而，這個事變為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突然打開了一大片待殖民地區，給西方統治層的自信心打了一針強烈的興奮劑。

蘇聯東歐事變，其實恰恰有力印證了三十多年前中國開始超越蘇聯經驗、獨立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無以倫比的先見之明。這本該是在歷史的裁決面前慶祝勝訴的大好機會，然而茫茫中國，竟見不到有人自信十足地去認領這份歷史的裁決書。這一方面是由於在過去十年內中國妄自菲薄地一筆勾銷了自己的獨立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又退縮回蘇聯的官僚主義的窠臼，但更重要的是，精英層的心態和一般大眾的政治意識被籠罩在官方理論和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反共教義所共同設下的那套粗俗的範疇和思維定式之內。對一些自由派知識份子來說，蘇東事變還意味著一九八九年在中國流產的「民主革命」，卻幸運地以「天鵝絨革命」的方式在蘇聯東歐完成了。官方理論在一些基本假定上，實際上是和自由派精英們默契一致的，比如：蘇聯垮臺的原因，就在於它的生產力的捕鼠本領不如資本主義靈光。因此，蘇東事變警告著中國：「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表一】 每年新批外商投資企業數和投資金額

	投資企業數				協定投資金額 (億美元)			
	日本	香港	台灣	南韓	日本	香港	台灣	南韓
1989	294	4072	540		4.39	31.59	5.5	
1990	341	4751	1103		4.57	38.33	8.9	
1991	599	8502			8.1	72.15		
1992	1805	30781	6430	650	21.7	400.4	55.4	4.2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年鑒》，1990-1994年，改革出版社。

這大概是從「八九風波」到「南巡講話」的轉變的關鍵因素之一。

「南巡講話」立即發生作用，並極大地刺激了三個方面的發展，具有諷刺性的是，這也是「八九風波」後政治高層有所反思過的三個方面：一、納入國際壟斷資本、全球資本主義的軌道；二、私有化和養肥新的資產階級；三、思想文化和社會意識的演變。下面分別討論這幾方面。

冷戰後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過程

在一九八九年事件剛剛收場時，西方主流媒體幾乎異口同聲地評論道：隨著共產極權鐵腕的鎮壓，強硬保守派的重新得勢，十年前由鄧開創的自由企業精神的繁榮、向西方的門戶開放、傾向西方民主價值的中產階級的成長的時代，終於悲劇性地結束了。然而，這不過是按冷戰自由主義教條公式拼湊出來的童話世界。在東亞冷戰前線地區，那裡的投資者對「自由企業精神」有更透徹的理解：從一九九〇年起，日本、香港、東南亞、臺灣、韓國等地區的資本掀起了一個大規模進入中國投資的浪潮（見表一）。

其中，激增的港臺投資多為「兩頭在外」的勞動密集、高度污染的出口加工型企業。這些東亞「奇跡經濟」轉移到中國大陸之後，也把東亞資本主義的高度壓迫性的管理手段強加在大陸工人頭上，恍如三十年代半殖民地上的

血汗工廠重新降臨中國。據調查，來自港臺地區的外資工廠大量雇用一些曾在臺灣當過憲兵軍警的人員作監工，這些人由於臺灣的解嚴，失去了用武之地，現在來到大陸的沿海經濟特區施展他們過去在白色恐怖機器裡練就的拳腳。（註三十）

其實，在反共、圍堵的白色恐怖年代為「四小龍騰飛」做出重要貢獻的出口加工血汗工廠的廠商們心裡最清楚：戒嚴和「社會穩定」是他們投資的最好的環境。整個東亞「自由企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一直和反共、反人民的軍事鎮壓與白色恐怖結下不解之緣。東亞的資本家們都還記得，沒有蔣介石在臺灣的「二·二八」及其以後的長期白色恐怖，就沒有後來臺灣的「經濟奇跡」，沒有蘇哈托在一九六五年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就不可能有印尼的「經濟起飛」，沒有光州大屠殺，南朝鮮也不會步入「富國俱樂部」行列，沒有馬科斯宣佈軍管、鎮壓異見，日本和東亞「小龍」也不可能進入菲律賓放心投資、大膽剝削。九十年代初，同樣是這些東亞廠商，看准了中國「社會穩定」的條件，做出了現在看來是十分英明的決定。當然，中國仍然是在共產黨政權之下，和東亞的

註三十：Anita Chan, "BOOT CAMP AT A SHOE FACTORY: REGIMENTED WORKERS IN CHINA'S FREE LABOUR MARKET," Washington Post, Outlook Section, November 3, 1996.

反共政權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廠商們想必是將「管它黑貓白貓」的邏輯延伸其意而用之了。

隨著東亞資本的大量湧入之後，歐美資本也看準了大勢所趨，隨後跟進，而且這一次，「國際壟斷資本」的化身——大型跨國公司大舉進入中國，將「納入軌道」的過程大大推進了一步。比趙紫陽執政時期規模更大、開放程度更高的經濟特區——浦東特區和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在九十年代初建立起來。除了外國直接投資外，從一九九〇年起中國的對外借款也年年激增，從一九九〇年的102.89億美元增加到一九九五年的481.33億美元。

從一九八九年底對「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的警告，到幾年後不惜任何代價地急切要求「和國際接軌」，這個變化是驚人迅速的。在國內政治經濟政策方面，同樣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

私有化和養肥新的資產階級

在一九八九年，在剛剛經歷了兩年多的物價失控和社會動盪之後，高層領悟到「如果一味削弱乃至全盤否定計劃經濟，企圖完全實行市場經濟，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必將導致經濟生活和整個社會生活的混亂。」（註三十一）然而，到了一九九二年的十四大，反而是計劃經濟在中國行不通了，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要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產權清晰、權資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新的政策導向，包括名詞用語，都更接近世界銀行所欽定的新自由主義教義，也大都是趙紫陽的改革智囊曾經制訂但卻未來得及推行的綱領。再到了五年之後的十五大，對那些仍心存疑問的人們，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趨勢也已是「不可逆轉」了，這次改革到了「攻堅階段」：「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

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於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實行鼓勵兼併、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形成企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隨著企業改革深化、技術進步和經濟結構調整，人員流動和職工下崗是難以避免的。」（註三十二）

一九八九年後改革政策的幾次重大「突破」，不僅是以政府的「看得見的手」去創造市場的所謂「無形的手」的過程，也是以政府的「看得見的手」培育最新一批財產佔有階級（或稱第三代富翁、新生的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企業家階層，隨不同的學者的用法而不同，但都基本上指同一件事情）的過程。據研究，在價格改革中憑藉權力瓜分價格雙軌制的巨大差價的「第三代富翁」在一九九一年後的「股份制改造」、「開發區圈地運動」和「房地產熱」中又撈取了更大的一筆巨額財富。一九八九年後，國有資產流失——私有化的過程加速了：從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間，僅長期資本外流的總量就超過10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通過非法轉移的形式逃到國外的。其中，一九九二年又可以看作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和私有化「大躍進」之年，私營企業家牟其中認為一九九二年是「輝煌的一年」。學者認為，中國當代的「原始積累」過程已于九十年代初完成，這可從所有制結構變動的資料中清楚地看出：從1993年12月到1995年12月，全國非

註三十一：江澤民《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註三十二：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97年9月12日）。

公有制企業的工業總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比重，由10.5%增至20%。全國非公有制經濟社會零售總額則由1993年11月份的38.1%增至1995年11月份的51.8%。（註三十三）

從新的階級和階級關係的形成看，「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底，我國已有雇傭工八人以上的註冊私營企業主32.8萬戶，從業人員500.8萬人，註冊資金1041億多元。……其中，自有資金逾百萬元的一九九二年底逾5000戶。有人說已逾100萬人。其中還有少量千萬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現一些雇工超過千人的私營企業。據國務院研究室的典型調查，私營企業主的實際數約比註冊數多出一倍。」「無論是在絕對人數上，還是在經濟實力上，當前我國的私營企業主都超過了一九五五年以前，何況我國現在劃分私營企業主的標準在雇工人數上要比建國初期高得多。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認定，一個民間資產階級已經在經濟上形成，它至少已經是一個自在的階級。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註三十四）

階級分化反映在日益嚴重不平等的財富分配上，據研究，至九十年代中期，占中國人口總數10%的貧困人口只佔有私人存款總額的3%，且有下降趨勢；而10%的最高收入者卻佔有存款總額的40%，且有上升趨勢，這個差距正在按每年10%的速度擴大。中國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係數從1986年的0.19左右，上升至1990年的0.23左右，再上升到1994年的0.37~0.434，甚至有可能高達0.59。（註三十五）

在新的資產階級被養肥、勞動人民的幾十年血汗積累的財富被瓜分的同時，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取得政治權力、工農勞動階級的民主權利被侵犯和逐漸喪失的過程。私營企業主「已經逐步提出獨立的政治要求。現在，私營企業主擔任縣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縣以上政協委員8558人，縣以上團委委員1357人，縣以上婦委委員1430人。對此，有些私營企業

主仍感到不滿足。……福建省晉江市一個私營企業主提出：『我國政治體制的革新，將隨著私營經濟和私營企業主隊伍的發展而展開，今後進入各級政權領導班子的將是一大批私營企業主，不能再把私營企業主搞成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政治花瓶了。』」另一方面，工農勞動者的越來越被排斥在權力體制之外，「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全國發生罷工225起，參加者有3.79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七十一起，三資企業八十二起，集體上訪的四千起。一九九三年二月，湖南金竹山礦工遊行時打出的標語是『我們要吃飯，我們生活』。」（註三十六）九十年代以來，職工群體罷工、集體怠工、集體上訪、抗議性遊行、集會、靜坐等突發性事件急劇增加。

思想文化和社會意識的演變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在思想文化和社會意識方面的變化也是引人注目的。一九九〇年，港臺歌星及其商業化的推銷體制大舉進軍大陸，讓大部分中國人略加領教東亞資本主義的「往俗裡走和無靈魂」的文化氣氛，但這不過是向東亞反共體制所特有的保守主義社會意識全面轉型的揭幕式。這個轉變，既是「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是硬道理」等政策與意識形態所要求，又和中國主流知識份子精英在九十年代所形成的堪稱極端保守反動的「自由主義」新宗教密切相關。在

註三十三：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蔡仲德《「奇跡」辨蹤——關於私營經濟的一些思考》，《真理的追求》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註三十四：《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列印稿）。

註三十五：何清漣《財富與貧困——現階段貧富分層評析》，《書摘》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註三十六：《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列印稿）。

八十年代參加「文化熱」的知識份子們，在九十年代從西方理論中找到了「自由主義」這一唯一的真理與福音，這套價值體系除了照搬戰後西方「冷戰自由主義」中最極端、最荒唐、連西方的保守派都羞於啟齒的論調之外，還以實用主義的方法天才地解讀從馬克思主義到英法革命史到蘇聯東歐演變歷史，竟然全部得出為私有化、自由市場和等級秩序作辯護的結論。主流知識分子的心態越來越趨於封閉，越來越獨尊一套狹隘僵化的反共自由主義教條，「並以此出發而形成了一套頗為完整、對幾乎所有問題都有某種現成答案的新的意識形態。」（註三十七）

主流知識份子精英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中大部分都是採取了反對政府的態度或親自參加了遊行抗議活動，在這個問題上大多數也至今仍採取批評政府的立場，然而在九十年代起勁地叫喊反對激進主義、告別革命的，和同樣起勁地讚揚蔣經國、蘇哈托、皮諾切特的鐵腕手段和經濟奇跡的，恰恰仍是這批主流知識份子精英。這與其說反映出一種矛盾，不如說更反映出其中更深刻的內部一致性：主流知識分子精英心目中的改革，從來就是一種從上至下、壓制下層民眾的改良運動，對這個改良運動的最大威脅，就是下層民眾的平等意識和集體行動；現在官方的改革已經不僅接納而且超過了民間知識精英的經濟改革綱領，精英們也就很自然地脫去了僅存的一點反體制的外衣，恢復了他們捍衛等級秩序的本色。至此，一九八九年抗議人群中的兩種勢力徹底分裂了：下層勞動者在全國各地越來越多地抗議抵制「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同時，知識精英們則在策劃和奢談更多的「新自由主義」漸進「轉型」。

一方面有知識份子精英這些精神僧侶為「發展的硬道理」的官方宗教作詮釋，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人與人的關係遭受市場的蹂躪和瓦解，中國社會在九十年代的社會現實和大眾

思想意識越來越朝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野蠻黑暗的方向發展。婦女兒童被拐賣，貧困的人口出賣肉體、出賣身體器官，出租典賣妻子，下崗失業、貧病潦倒的老工人，流動民工、窮人、婦女在社會底層的悲慘掙扎，血汗工廠裡對工人慘無人道的折磨和污辱，所有這些都成為這個社會的日常景色，甚至被視為「發展的必要代價」；要維持這種社會下層遭受深重壓迫的「社會穩定」，就必須使大眾意識變得麻木、渾沌、混亂。無論橫向比較還是縱向比較，在中國，特別是那些經濟改革的「成功」地區，大眾意識中對乞丐、窮人、婦女、弱者的態度，都到了令人吃驚的極度反動和愚昧落後的程度。

在主流的反動和大眾的困惑之外，也同時存在著一些有正面意義的新發展。那就是略去粉飾，開始根據事物的真實性質直呼其名，根據最新的社會現實去分析和反思。對於越來越多的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再是只是一個「姓社」「姓資」的純粹名份之爭，或「黑貓」「白貓」純粹顏色之別，而是有越來越明確的參照系的、存在著實質對立的二元。在知識理論界，人們越來越直率地、誠實地把改革和「轉型」的目標和一般化的、特別是以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為樣板的「市場經濟」相等同（儘管它的對立物現在在理論界那裡被冠以「舊體制」這一既不準確、又不誠實的代稱）；在社會中下層，幹部群眾坦率地講現在走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道路」，搞的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說社會主義，幹資本主義」，（註三十八）這種說

註三十七：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二十一世紀》一九九七年二月號，第三十九期。

註三十八：幾位老共產黨員《向中央領導進言》，《中國與世界》一九九七年第九期。

法假如是他們從身邊的現實來作純粹描述判斷的話，其實是實話實說。階級和階級矛盾，這些概念長期被人們認為只不過是空洞的政治詞令和整人的工具，現在人們突然發現它們是能夠準確精闢地分析社會現實的工具；「新生資產階級原始積累」、「階級關係的變化」、「當代資產者階層」、「當代買辦者階層」等用語，出現在最新一代的社會調查分析中，這也就蘊涵了新一代的批判社會和改造社會運動的萌芽。（註三十九）

結語

本文在開始時曾提到對於一九八九年事件存在著一種和西方主流神話相一致的解說，這就是所謂「民運分子」和大部分知識份子精英所持有的觀點，即它是一場「群眾性的反對共產黨專制的民主運動」。然而，進入九十年代之後不久，中國的事態發展就使得這種解說變得越來越無法自圓其說而分崩離析了。首先，那些留在中國的知識份子精英們，觀察到政府的經濟政策全盤接納了在一九八九年被鎮壓的改革精英所主張的改革綱領，隨即拋棄了在一九八九年的反體制的激進姿態，恢復並發展了其「新權威主義」的原貌，並在「反左」和所謂「思想解放」的鬧劇中扮演了御用打手的角色；（註四十）其次那些逃到海外的「民運分子」，在中國改革的現實面前，也陷入了極大的窘境：他們鼓吹的私有化主張，已被中國所實際發生的大規模「自發的私有化」所超越，因而他們只好繼續仰承西方和臺灣反華勢力，守著陳舊的反共八股，這批人和仍在國內的少數所謂「不同政見者」因而陷入極度的孤立。另一方面，一九八九年事件對於中國政府也變成了總被揭短和攻擊的口實，到處被動，所藉以辯護的理由，幾乎超不出「亞洲價值」這樣淺薄低劣的措辭。更值得深思的是，在一九八九年後發起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中

國應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聲音，在九十年代後期，也陷入了極端尷尬和困難的境地：一九八九年「平息動亂」的成功，沒有能夠防止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進一步瓦解、貪污腐化和大規模私有化的發展，也沒有帶來社會的穩定和社會矛盾的緩和；相反，在九十年代，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攻勢都比一九八九年更有組織、更有策略，並以更猛烈的方式大舉撲來。對於那些對資產階級改革不抱幻想、仍然堅持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們，一九八九年事件值得去進行更深刻、更全面的分析和反思，特別是有關改革、民主、群眾和社會主義的不斷革命等重大問題。

一九八九年事件及其中國在九十年代的發展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西方冷戰神話中的有關民主與私有制加自由市場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和諧共存的虛假性。不僅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給下層勞動人民以平等的民主權利，向資本主義「轉型」的過程更不可能對日益淪為私有資本的廣大雇傭勞動者給予任何民主的發言權。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化改革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改良」，亦即是由上層精英所策劃、主導，從上至下地強制推行的利益再分配，它的一個常在的特徵就是：在有控制的漸進過程中確立起一個新的等級秩序和特權利益階層，而這個新的特權階層的利益就是任何改良運動的驅動力。

假如說，改良總是和上層、精英操縱、反

註三十九：《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列印稿）；梁曉聲《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註四十：實際上一些有先見之明的新生資產階級在一九八九年事件期間就已察覺到未來的發展趨勢，表示支持「社會穩定」、支持「平息動亂」。見《牢記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訪南德經濟集團總經理牟其中》，《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三日。

民主和等級秩序相聯繫，那麼，和它們對立的事物，也就是：下層、群眾、民主、鏟平等級和革命之間則有著不解之緣。歷史上的許多非市場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都是通過「改良」完成的。而迄今為止的歷史上，和人類的未來時代，建立起真正平等的、民主的社會——社會主義的努力，只能依靠有下層群眾廣泛參與的革命運動，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要堅持長期的繼續不斷的革命。（註四十一）

這最後一點至關重要，它關係到中國為了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到底是依靠改良還是依靠革命的問題。東歐、蘇聯和中國的歷史實踐已經證明：社會主義社會的改良運動只能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反面，社會主義的發展和鞏固必須要堅持長期的繼續不斷的革命。另外，這也是在中國各種政治力量中那些仍然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左派重新認識自己、重新給自己定位、重新塑造自己形象的一個出發點。

長期以來，中國的左派被主流媒體和輿論稱為「保守派」，這的確是對「左」「右」這一對來自近代革命史的辭彙的諷刺。左派需要做的，不是對「保守派」帽子的默許或被動防禦，相反，而是從理論和實踐上說明：他們是一個先進的政治力量，是真正的革命者和社會變革者；而改革精英們或者改良派才是名符其實的保守派。

這不僅僅是恢復名詞的原有用法的問題，而是有關革命與改良（或「改革」）之間的本質區別——最典型的改良主義心態，就反映在今天被高頻率使用的「轉型」一詞：它意味著改革的任務就是要把一個固定的「舊體制」轉換到一個固定的新體制，一旦「轉型」完畢，或「轉軌」完畢進入「新的軌道」，就大功告成，完事大吉了，人們就可以一勞永逸地享受「新體制」運作帶來的巨大好處了。改革的全部學問，就是今天以各種花樣出現的「轉型期

的××研究」。「轉型」完成，改良任務也就結束了，在「新體制」下，我們的改革家們就變成了最僵化的保守派。

相反，繼續革命的倡導者在任何時刻都不會滿足於現狀，總能發現現有體制中的不足和黑暗面，他們變革社會的意願要遠遠超過任何改良的倡導者。社會主義的繼續革命不是僅僅局限於改掉某個具體的「舊體制」，而是對一切帶有舊的剝削制度痕跡的體制、思想、文化、風俗、習慣都抱著強烈的批判態度，以發動群眾的方式和這些舊制度的影響和挑戰作鬥爭，以下層的主動性作為社會變革的驅動力；而這還不是結束：剝削思想、等級秩序、官僚主義仍會不斷地出現，形成新的「舊體制」，也就需要新的不斷的革命。可以看出，改革與繼續革命的區別，就在於：改革最多只是對「市場經濟」的一次性「制度創新」（不排除照搬和復舊），而繼續革命則是對未來的人類制度安排不斷地進行無數次創新（儘管未來需要具體什麼樣的制度創新現在還無法預料）。毛澤東晚年曾經無情地批判當時在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認為它還存在八級工資制等，在很多方面和舊社會差不多。這表現出一位真正的革命家的豁達、灑脫的心境。這和那些一方面詛咒「舊體制」、另一方面崇拜「現代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改革家相比，孰為保守，孰為開放，是一目了然的。

中國未來社會主義的希望，在於重新學習和理解毛澤東所留下的寶貴財富。

改良死了。革命萬歲！◎

註四十一：當然，我們今天會聽到從改革家口裡說出「改革也是一場革命」的妙語，但很顯然這或是不著邊際的空洞辭令，或是不知深淺的葉公好龍。

轉載自：《中國與世界》一九九八年，六月號

將軍掐熄 的煙頭

■周良沛

一個個掐熄在煙缸裡的煙頭，正是創作靈感熄滅的作品，然而，他還是一支接一支地抽，不知催發靈感，還是要它墮胎。

將軍是位儒將，能武能文，寫得一筆好字。戒嚴時期，非常時期，不僅無法吟詩作文，擠在這間小屋子裡頭，連筆硯也鋪展不開。

我們對坐著，誰也不糊塗，可是，一切都像朦朧在騰騰的煙霧裡。

我有些後悔，進門時，一肚無名火，不該衝著他來。我是瞪著眼對他說：「這下可好了，我們軍裡可出名了，中國外國，都在謠傳我們『血洗天安門』！」

「你也信？」將軍眉頭一蹙。

「我信？我信就不那麼老遠的往回跑了！」

「要造謠，就讓他們去造吧！」他吁了口氣，說他無所謂，又怎麼可能無所謂呢。忽然，他語氣嚴肅地問道：「你說，真是謠言重複三遍就可能成事實？」

他在提出一個不需再回答的問題；又確實是令人深思的現實；不信邪，可以氣粗，可是，現實的嚴峻，現在叫人氣粗也只能沈默。

其實，謠傳這支部隊是「X家軍」，還說這位將軍是某某的兒子和女婿時，我是啼笑皆非。

「你們，你們真是扯到哪裡去了，人家是種田人的兒子，『早稻田』出身的一一」

是的，現在各種各樣的「關係網」，那個不是封建宗族性的關係？若要說到上下級的關係時，也就不由人家去發揮想像的本領了。何

況，這場風波也是無風不興波。若不是社會上的腐敗現象惡性潰瘍，「官倒」和「不三不四」的「大款」炒來倒去，哄抬物價，搞得連手紙都搶購起來，惶惶不安的人心激起了不滿，否則，在這以「人民」的名義所建國的社會，不可能會有幾十萬人上街的。《參考消息》上的日本電訊就說，他們不是反對社會主義，而是反對不搞社會主義。這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沈痛教訓。任何人忘記它，最終都要遭報應的。可是，一亂起來，有的趁亂添亂，以暴力動搖、顛覆現有的社會秩序時，這是任何時候，任何制度下的政權，都不能不聞不問的。現在，世界任何一處政局不穩定，有暴力事件，不都是爭著派兵去維持和平麼。可是，一個有著堅強的國防力量的主權國，那能不用自己的部隊去防範事態擴大，抑止暴力行動延發呢？這場風波，《美國之音》說是「民主運動」，台灣學者說它是「親美運動」，不論怎麼「動」，子弟兵總不能等它給百姓「動」來災難。身為軍人者，不論他自己怎麼想，在這之前的一段時間，兵營外有風波，營區是實行封閉管理，對外面的「熱鬧」，知之甚少。一聲令下，也不能不來這裡。然而，若出師無名，乃至名為「鎮壓學生」，那麼，他們服從的「天職」，無疑是趕著他們去犯罪。可是，不論開初「學生」有多麼充足的理由，且是不容人不反思的理由，至此以釀成各地深度的無政府狀態和趁火打劫等等治安問題，若非束手無策，則不容不理時，為政，為軍者在此時要他們執行的命令，也是眼前不能不面對的嚴峻現實。這一事件，前後有它相關的因果，畢竟又很分明地分出它很不相同的幾個階段。若民眾反腐敗的義憤，不是被後來的動亂所淹沒，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府，若不支持，反而壓制，都是不義的，等於自掘墳墓。然而，動亂若是不可收拾，反叛者亮出他政治反對派的旗幟，「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成功者寫的歷史，自然是

另一頁歷史。為此，此時此景，他們來京執行任務，也就不能不讓別人有這樣的看法。那樣的說法，道德的評價，政治的評價，或是怎樣對待民族、國家利益的問題，無論該褒當貶，基本事實總是不會變的。

清場、示警與群眾場合的混亂

那，是執行戒嚴令的先行受阻，六月二日黃昏，部隊命令務必在三日凌晨前趕到大會堂，準備執行清場任務。這時，部隊要是著裝列隊，只會同樣受阻。於是，叫大家著裝越隨便越好，越分散越好，個人只要記住自己的番號，跟大會堂的門衛對上口令，自然放行。可是，在這大熱天，除了襯衫，當兵的，臨時上哪裡去找套完整的便服呢？結果，除了汗衫、襯衣，好多還是兵褲、兵鞋，有的還帶了水壺。雖然行前畫了路線圖給大家，然而，大多都沒有到過北京，圖，是清楚的，路，還是認不準。雖然叫「越分散越好」，可是一種職業的天性，叫他們走著走著又湊在一起，總想互相有個照應。結果，兵褲、水壺、一律的平頭，都是當兵的標記，少不了被人盤問、糾纏。有的到了天安門廣場，還傻乎乎地問「大會堂在哪裡」的時候，「高自聯」在外放哨的人慌了，大聲嚷道：「大兵來了一一」，「大兵來鎮壓學生了一一」

廣場上又是一陣騷動波。

到時候，他們在大會堂清點人數，只到二分之一，於是只好在這二分之一的人中再選出一些出去，再去找回走散的人。同時，二百零五個偵查員，全靠客車掩護，裝運的一點武器、軍裝才武裝起來，準備參加清場。

四點，廣場閉燈了，燃燒的廢棄物，還在冒散濃煙。偵查兵出動了，用十分鐘的時間，擺脫了圍觀的人群，迅速到達紀念碑東南角上指定的位置。這時，廣場上我們的大喇叭宣布清場即將開始，敦促滯留在廣場的人員盡快離開。

極少數暴徒準備了不少硫酸、汽油瓶和汽油桶，企圖製造爆炸事件。「高自聯」的喇叭是對著我們的大喇叭來的，宣傳「四十八小時絕食」者的講話，有些原來聽到要清場都已散去的人，有的又受它影響而再重新聚攏。

偵查員的對講機裡傳來指揮部的命令：「快幹掉『高自聯』的喇叭！」，可是，這時要驅散這數以千計的人群，要是衝突起來，在雙方人數太懸殊的情況下，完全可能被包圍錮起來「包了餃子」。無法向指揮部再作報告了，劉建軍機警地領了十三名戰士轉了一個方向，在紀念碑的正東方向搭起人梯，連續翻越了三層欄杆，到了底座的最上一層。

這是歷史性的時刻，我們應該知道偵查兵孫濤、朱耀清的名字，他們翻上到最上一層，舉槍一個一個點射，兩個喇叭啞了，另一個陳志軍拉斷了發電機上的導線，關閉了開關。沒有聲音了，沒有燈光了，一時突發的死寂和黑暗，把剛才這裡的氣勢、威風，全掃光了。

碑座後竄出一個人影倉倉惶惶地往石階下跑，閃過眼睛，偵查兵提起槍大喝一聲：

「幹什麼的？」

「我是侯德建一一」

「侯德建又怎麼樣？」

「我是知名人士！」

「知名人士又怎麼樣？」

「我是來勸說、疏通的，叫學生快點撤離廣場的一一」

這些有文化的現代兵，本來都知道這個台灣歌星的，可是這不是酒吧、舞廳，一時難以想像他為何來，也就記不起他是何人了。只見他這樣連說帶跑地消失在夜色之中。

也是照例，也叫「打掃戰場」吧，這個設在喇叭下的「高自聯」指揮部，又是發電機、又是861型電台等等等等，完全不是用來向廣場說話的。

這時，圍坐在紀念碑下的一些人，有的在

破口大罵，同時把石塊、汽水瓶向偵查兵砸。戰士頭上的鋼盔是乒乓作響。有的戰士衝回過去，衝動地舉起槍托，眼睛一閉，一想，手又放下了。有的上去逮住在扔瓶子的手，用勁擰住對方「你還想鬧個什麼名堂？」，同時也就把他狠狠甩開。一個不明身份的人幾步衝來，企圖奪史新的槍，史新側身一讓，一腿飛去將他踢倒在地，這時幾個正往上衝的人，見他朝自己連滾幾滾地滾過去，也就一下閃開地退下了去，鬧哄哄的一群，一時也突然傻眼無聲了。

偵查員鳴槍示警：「統統趴下！誰也不許亂說亂動！」

一個女學生，知道是真的槍響，放聲哭了。她起來，戰士對她說：「你快走！我們不會向人群開槍的！」，可是，這時要沒有槍，是無法排除對清場的各種干擾和破壞。

當群眾陸續撤走時，又有兩個身份不明的人不肯走開，扯開衣服指著自己的胸口：「開槍吧，向這裡打吧，打死我也不走！」偵查員也不想和他多說，上去一把逮住他倆，強行拉下紀念碑。

五點正，清場正式開始。廣場華燈齊放，早已候在場外的二十餘輛裝甲車，說是需要，不如說是一種氣勢，是一種威嚴之威的氣勢，配同三面的部隊，一同進入廣場。這是五點半，正是太陽升起的好時候。

蹲過貓兒洞的兵

這一切，除了一部份指揮人員能從大會堂的屋頂看清，部隊更多的人，都還困在裡面。數以萬計的軍人，僅能分有一份「立錐之地」。廁所也有衛兵，還得憑批條才能進入。交通四路受阻，靠直昇機運來的給養，確實解決不了什麼問題。最困難的時候，是八個人分一包方便包，五個人分一個麵包。大家完全只能象徵性地吃到一點東西。這次進京，考慮到情況複雜，把沒有參過戰的新兵全留在後邊了，來

的，全是在老山蹲過貓兒洞的兵。他們，當時胯潰襠爛，連褲頭都無法穿，窩在貓兒洞裡打「裸體戰」。我當時有則手記寫道「……體內缺水，流汗也流不暢快，幾天尿一次，尿得下身痛得滴出來幾滴，還真想把它喝了，可是尿都尿不出來的尿，喝，還喝得成嗎。整天那麼窩在洞裡，下肢明顯萎縮。天黑跑到排指揮所的洞裡領給養，出洞跑幾十步，也是在極其危險之中舒展一下手腳的時刻，是危險中的歡快。要不是日夜警惕地準備戰鬥，這麼窩著，還真不想吃什麼。這乾糧，也許是科學配方合成，腸胃可以全部吸收，也許身體消耗大，需要的多，又吃得少，也就無所謂排泄。過半個月，肚子突然猛痛，本來就是一身汗的身子，這時額頭、掌心全沁冷汗。肚子痛，痛得能叫一下也好，可是，在哨位上哼一聲也要壞事，於是，只好悶著痛得又叫不出來的聲音堵在喉頭，像要換不過氣來似的。這，真是怪事，男人真在生孩子，屙出來的，只是一長條血糊糊的黏液，完全是具早期流產下來還未成型的嬰兒……。」但是，這不是貓兒洞，是人民大會堂啊，雄偉、莊嚴、富麗、堂皇。這些男人，又一次在生兒子，為了希望、快樂的誕生，在承受分娩的陣痛，歷史的痛苦。

扛起責任 承受謠傳

是的，這時要動員大家克服困難者，自身也有難以開口的難處，此刻，還好跟大家說什麼呢？當兵的還是一個個硬梆梆的在挺著嘛，還能叫他們「樂觀」得開懷大笑麼。站在樓頂，看十里長街，槍聲傳來，濃煙滾滾，全是路障，全是燒的軍車。軍人罵不還口，打不還手，贏得群眾的理解，也叫許多同志遭受了混合著流血的屈辱與痛苦。這是一場付出太大代價的風波，這是一場軍人不惜代價出來平息的動亂。不僅現在，就是未來，總是會有要罵他們的，有的是不理解，有的是別有心計。人民

還從未遇到過如此複雜的情況，包括我們工作的失誤，包括群眾對腐敗現象的抱怨，這些問題，他們不能等它完全解決了再說，他們不僅不是針對，恰恰是維護群眾正當的不滿要求而挺身出來，讓他們在有一個安定的環境解決這多問題，不然，十里長街的濃煙，就要燒到大河上下，長城內外，就是全國大規模的內戰，內亂。別有用心的，可以從中漁利，不理解的，那時就更不理解了。眼前如果有一個不動兵的辦法自然更好，可是各方面的問題衍發得亂了起來，就別無選擇了。軍人付出了血的代價，由此，有人把一切責任，似乎必然推給他們承擔。然而，外面是槍聲，情況多麼危險，誰知道這多被罵成「血洗天安門」的戰士，都是手無寸鐵地困在大會堂裡啊。將軍眼巴巴地看著戰士餓得消損了戰鬥力，更加犯愁。可是，一提「戒嚴合法！自衛合法！」，困著，餓得萎了的人，一個個精神抖擻了。兵勇，無傢伙也不行呀！有志，不能伸也不行呀。將軍也不想追查是誰出的餽主意，見一個個把壓地毯的銅條拿在手上也跟一支槍似的。

「亂彈琴，誰教你們這樣幹的？」他把幹部叫來：「我們是來保衛首都，還是來大會堂搞破壞的？這些壓條要有一根不在原地原樣，你看我來收拾你——」。他聽到傳來的槍聲，看到滾滾的煙火，外國電台，還在播放他們在南苑與友軍火拼的謠言。將軍走回來又對下屬幹部說：「壓條只要放回去就行了，可不要層層追究責任——我們要理解自己的戰士——」

人，陷進在矛盾中，不知是難言的困惱，還是要有宣洩的淚。手下這多指揮員，又在飢餓的威脅下，在自衛而無傢伙的困惱中萎了，一個個在眼睜睜地等待未來。

當他們第五天走出大會堂時，各地，外國都在謠傳他們曾「血洗天安門」。

血，血，那些進京受阻，被衝亂打散的同志，那些直接參加平息風波的同志，在自衛中

首先是自己流血，在我們國家，私人是不允許藏有槍枝的，在這已聞到血腥的風波之混亂中，能夠拿出槍來熱鬧他們「民主」的遊戲者，自非等閒之輩。要是以它殺人、燒車、還焚屍，且不說傷害無辜，就是他仇恨的該殺，這也不符民主政治下的人道原則。此時，帶槍的人以槍自衛，是他的人權，不違遊戲規則。回擊殺人者，即便亂槍之中也有誤傷者的血，而這血債該向誰要，還不明白麼？

血，血，他們，除了那二百零五個偵查員被瓶子、碎磚砸出來的血，只有他們在清查廣場的那些窩棚，不只是在三處五處看到所丟落的避孕套。當中抓來收審的，有個人的口袋就搜出三十一個避孕套時，戰士真是罵開了花，罵開了血。然而，謠言重覆三遍，似乎真能成為事實時，我們彼此正因為都是知情者，此時只有沈默相對，掐熄的煙頭還在冒著輕煙。

「這裡有酒，要酒嗎？」將軍看著桌上的瓶酒，終於開口了。

「幹什麼，要喝醉嗎？」

「不，斗酒百篇，寫點詩嘛！」

「寫詩？我早已不寫詩了！」

「那——」他拿起一支毛筆，「拿這枝筆去吧！擠在這裡，也無法磨墨展紙，你拿著還有用，筆杆是實心的，挺有點份量——」

「我不習慣用毛筆寫稿——」

「隨使用什麼筆，多寫實話吧，你可以表達自己不同的意見，甚至也可以為『民主意識』公開亮出不同意見，但是，一件事可以有千種看法，事實卻只能有一個，寫到具體的事，要說謊，造謠，那麼，為文也如為娼——」

哦，將軍是要寫詩了，煙缸裡掐熄的那多煙頭，那多熄滅靈感的作品，它在消散最後一點輕煙了。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二日，豐台
二〇〇四年一月，昆明改訂◎

美籍中國農業問題專家韓丁 (William Hinton) 五月十五日在美國逝世，享年85歲。韓丁傾注大半生的心血關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大陸長期從事調查研究，寫出了《翻身》、《深翻》等名著，是研究中國社會主義土地革命的必讀之作。本期我們先轉載美國《每月評論》的《韓丁生平紀要》譯稿。下期將刊出由韓丁的生前好友金寶瑜教授執筆的悼念文章。【編者】

《韓丁生平紀要》

著■約翰·梅志 (《每月評論社》) / 譯■舊文1

威廉·H·韓丁於2004年05月15日星期六清晨逝世。他於1919年出生在美國芝加哥。17歲時 (1936年) 他以自食其力的方式得以完成遠東之行。因為缺錢，他便以洗盤子為生，後來在日本一家英文報紙擔任了六個月的記者工作。他的行程繼續推進到在日本人佔領下的朝鮮和華北，經過蘇聯到達波蘭和德國，最後當了一名美國貨船的普通船員，終於得以自費返回美國。比爾·韓丁 (比爾是威廉的暱稱) 曾於1942年讀過埃得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並因此改變了他的一生。據比爾自己說，這本書把轉變了他的世界觀——從一個和平論者改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945年他作為美國戰事新聞局的職員又重新回到中國。他躬逢國共兩黨在重慶開和平談判，曾和周恩來很熟悉，也與毛澤東見過三次面。從會見中，他可以看到並且感覺到中國的未來發展前景。1947年，聯合國救濟總署 (UNRRA) 要贈送中國拖拉機，在多位隨行機務教員裡面，比爾·韓丁是其中之一。在國民黨控制下，韓丁被指派到某一個地區，他因當地盛行貪污而感到憤慨不已，於是就志願轉進到河北省南部的一個解放區去。解放區的生活狀況十分艱苦，可那裡的誠實和熱情正是比爾夢寐以求的。他為解放區引進機械化農業方面做出了貢獻。

到了救濟總署結束，美籍技師被遣返回美的時候，比爾·韓丁要求留在中國。他在一個離長治市不遠、地處山西省東南的解放區北方大學，擔任一名英語教師。1948年他要求參加設在長治市郊、由大學提供職員的張莊 (直譯：長弓村) 土地改革工作組。韓丁花了六個月時間，白天在田裡幹活，並日夜參加土改會議。他很仔細地做過筆記，記述土改過程，並與張莊人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朝鮮戰爭於1953年結束之後，韓丁回到美國。他的筆記被美國海關扣押了不說，竟然移交給那個臭名昭著的參議院內部安全委員會 (即「伊斯特蘭委員會」)。美國聯邦調查局置韓丁於不斷騷擾之中。他的護照被沒收，而且被禁止擔任任何教職。剛開始還允許他做貨車維護員，到後來乾脆上了黑名單，被拒絕了所有就業要求。後來他在他母親留給他的遺產土地上從事農業，並以農業為生長達15年之久。在整個期間中間，韓丁連續不斷地大膽陳述中國革命的成功之處，而且進行了長時間的 (終於成功的) 法庭戰鬥，重新取回被伊斯特蘭委員會拿走的筆記和文檔。

等到取回筆記和文檔，既是張莊的觀察員又是參與者的韓丁就著手寫張莊土改實況的報告。這本名叫《翻身》的書於1966年出版。就在許多美國的大出版商拒絕出版之後，它由每

月評論社出版了。《翻身》出版，一鳴驚人。幾十萬本行銷一空，並且翻譯成十種語言面世。話劇作家大衛·海爾改編為劇本，首先在倫敦演出，然後遍及全世界。在周恩來的關懷下，《翻身》被翻成中文，他於1971年邀請韓丁再一次訪問中國。

比爾·韓丁繼《翻身》之後繼續寫關於革命中國成就實況紀錄書籍，如《鐵牛》和《深翻》。在反復多次訪問中，他重新拾起中斷了的、那些原是他於二戰末期帶到中國來的農業教學工作。尤其是他一再地回到張莊，引進新式農業技術並把自己儲蓄得到的資金投到各種張莊的新型工業那裡。他把張莊稱作是「第二故鄉」。比爾的愛得到了張莊人民的回報。2002年春天，張莊派遣鎮長坐一次長途而特別的旅行，到波士頓附近比爾·韓丁所住的一家私人療養院，去看望衰老和因嚴重心臟病臥床不起的比爾·韓丁。他從張莊帶來的是美觀的相冊，上面寫著比爾·韓丁：中國人民的一位老朋友，是張莊為表示對比爾·韓丁致敬特別出版的。這裡寫的《生平紀要》就是根據那本書完成的。

隨著鄧小平快速擴張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形勢和逆轉，韓丁日益與中國共產黨領導所採取的方向背道而馳。在中國蒐集到的《每月評論》論文集：《一場沒有完的戰鬥》（由印度喀拉普爾省的基石出版社於2002年出版）陳述

了韓丁整個風燭殘年所凝注的批判和鬥爭的心血。比爾·韓丁一而再、再而三地抗議現在已經被當成官方教條的關於片面否定文革的評價，他這種反對不下於對美國全球帝國的反對程度。他對農民和一般人民的革命轉變力量深信不疑，因為這是他根據自己的切身經驗得到的結論。

比爾·韓丁從來沒有像他在最後幾年裡那樣接近過《每月評論》。甚至遲至1996年，比爾在《每月評論》出現企業危機的時刻，好像眼看危在旦夕之際，親自干預並得以化險為夷。1990年代末，他訪問印度回程中，在紐約市停留，以便與我們《每月評論》同人談論那次旅行。他愉快地敘述了關於年輕的印度毛主義學生們如何整夜要求他談論中國發生的事情以及印度和其他國家將會發生的事情，因此而使他耗盡了僅剩的能量資源。比爾看到《每月評論》各期印度版呈現破爛狀，就以愉快的口吻提到：雜誌確實是被傳閱的。疲倦而且有病的他，因為惦記著為掌握理論和實踐而戰鬥的那些窮苦革命青年，顯得年輕和精神充沛起來。

正直而熱情的、既是農民又是革命家的比爾·韓丁的一生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革命實踐的普遍的核心。對於他來說，文化的和世代的差異都證明不足以成為他在學習和教學上的障礙。讓我們像他那樣活下去吧！◎

轉載自：華岳論壇 <http://washeng.net/>

本刊第七期有若干錯誤，茲訂正如下，並向作者與讀者致歉：

勘誤

一、〈台灣民主的歧路〉一文，P.2右欄倒數第4行最後一字「也」應改為「或」。P.4右欄第19行第6字「地」應改為「的」。

二、〈弱勢群體之聲〉第一集中，P.26〈民工〉一詩，第5行第6字「園」應為「圓」。同頁

〈無名礦工〉一詩，上排第9行第2字「麵」應改為「面」，下排第5行最後一字「灑」應改為「酒」。

三、〈音樂有時未必不是無聲的〉一文，P.56左欄第16行第10字「人」為衍字，應刪去，P.59右欄第4行第1字「生」應為「聲」。

霜降

顏世鴻的回憶錄

(完)

著■顏世鴻 / 編註■藍博洲

十五、十一月廿八日

康熙二十二年秋，施琅克台灣。翌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置諸羅縣，其縣界北至基隆市，當時，新店也屬於諸羅縣。日據屬文山郡新店街。舊地名是，大坪林、龜山、直潭、青潭、安坑，這戲院所在似是安坑。我不知道新店地名始於何時。

在新店，我反而不大讀書，改下圍棋。

因為十一月一日起，到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止，我實在抹不掉心內那一點不安。不安，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留在台北的人，尤其是葉盛吉的生與死。除了寫信，偶而看看《生命的科學》以外，我很少看書了，這是從十月底就如此。不只我，三十一個人無不如此。表面裝著樂觀而快活，其實大家心內很悶，或許可以說如鉛塊那麼沉重，而大家卻裝出「沒事」的表情。

就在這時候，施部生案判決了，九名死刑者中包括那未滿十八歲的劉嘉憲（被捕時未滿十八歲）。不過，這倒不是空前的事情，在流亡學生的案件中，就有一個未滿十八歲的青年被槍決了。

施部生的故事很多。台中商職畢業的，也是當記者。當晚，在草寮，伏擊他的保密局的

人，早已毒死他們放的狗。他們本來是有夜間值班的，那晚上也睡著了。當他驚醒，那邊的卡賓槍已經吐了火來，當場就死了幾個，施部生小腿挨了幾個子彈。在保密局，他邊和法官（大概又是那一位姓莊的廈門先生）下象棋，邊讓醫官開刀取子彈，醫官有意吧，沒有用麻藥，他仍臉不改色地下棋。子彈留下一顆，醫官推說難拿，可能是事實，也有可能是故意的。所以他老是拿著那竹拐子走路。平常他是不上手銬的，因為跑也跑不掉，不過也算是對這類好漢的禮遇。

十一月七日早上，當他出了門，走到楊廷椅的押房前，用竹拐敲敲那鐵柱：

「大目仔，我先走了，等你。」而後又一跛一跛地走出去。

至於那一天，他是否破例用手銬，而後是否也是五花大綁，這些細節就傳不到新店了。只是消息說，他們（同一天一起走的有施部生、呂煥章、張建三、李金木、蘇朝鐘、林如松、彭木興、黃士性、劉嘉憲等九人。）動身那一天（註五十九），中共、北韓及聯軍三方面都證實，中共的軍隊已經在北韓作戰。據捕虜的說法，十月十五日威克島會談的次一天，中共的軍隊就渡過鴨綠江了。

註五十九 ◆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施部生等九人於一九五〇年十月廿七日執行槍決。

我們之間，有一個傳說，王超倫（註六十）的父親，每天破曉必到馬場町的堤岸。他看過不少這種亂石崩雲、驚濤裂岸的演出。其實，我們心內都知道，那老人家不是好事之輩。他們王家已三代單傳，當然他是要在那裡等待，有一天兒子的遭遇是否也是如此。到那一天為止，他只好以極消沉的心情，來等候那摧心傷神的一刻。

為了那一去不返的一代精英，就在那時候，我想寫下一塊悼亡的墓誌。其實，那又算什麼呢？或許有一天，我也會禪悟。如東坡的〈定風波〉：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一點省悟和智慧在我心頭一閃而過。

十一月八日，中共公開宣佈他的「義勇軍」已經在北韓作戰。十一月九日，朱冠軍（原空軍軍糧補給庫庫長）因貪污案被判死刑。十一月十三日，陳布雷逝世兩週年。十一月十五日，國府發表「潛台匪諜自首辦法，延期十一月二十五日截止」。十九日，高雄案七名槍決。高雄案是一個意外，因為他們在桃園時企圖逃脫，幾個人加碼。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社會部陸效文案，六個人悉數喪命馬場町。如此行情的起落，正使人心如那潮汐的起落，在新店的我本身就心裡不安了。

十一月廿四日，如前面說的，麥帥又命令全軍北上，馬上結束戰爭，願他的孩子們在聖誕節趕回美國。麥帥是那麼幼稚地估量已入韓境的中共的戰鬥力量。自十月十六日入北韓以後，中共未曾全力對付美軍。是這個局面使他低估中共的戰鬥力量？或者是他存心引起全面

戰爭，而準備揮軍入東北，甚至製造國軍登陸的藉口。

總之，二十六日起，二十萬美軍遭遇到二十萬中共軍隊的突襲。那一戰，甚至有人形容為「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敗亡」。因為美軍一口氣又逃回到三十八度線以南。美國在那數天之內受到了慘重的損失。甚至聞名世界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也差不多被殲滅，只有一部份靠第七艦隊的火力才自咸興逃回開城。第八軍軍長華克中將，卻被向南遁逃的自己的坦克車所碾死。

這一消息還沒有聽到，我們卻聽到台北案去了十四名（註六十一）。草山支部，無一倖免。十四人中醫師及習醫者共六人。（郭琇琮、吳思漢、許強、謝湧鏡、朱耀伽、謝桂林）。謝湧鏡當時只涉及草山支部，以後「熱帶醫學研究所」有人自首，仍有不少學醫的人在馬場町結束一生。以後，我也聽到他們十四人不准收屍，當翌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學委案十一人押到刑場時，還在那裡看到昨天早上出去的十四位朋友。

示眾，這沒有什麼意義。馬場町，連白天人家都不大願意從那裡過路。可能是兩種原因。第一是對台北案，未出押房，（或出了押房）就由許強帶頭，喊了口號。還在卡車上大唱國際歌，使駕駛員心慌，出了小小毛病。

第二個理由是，給廿九日早上的十一個人，加上一個刑外之刑。但這十一個人嘴上都被塞上東西，已經不能喊口號，也不可能唱歌了。所以，屬於第一個理由的成分大。而第二個理由，只是湊巧他們十一位趕在次一天，赴會馬場町而已。

註六十 ◆ 台大工學院學生，台北市人，任「台大工學院支部」書記。

註六十一 ◆ 十一月二十八日執行槍決。

廿八日早上的槍決，連廿六日的韓戰，在廿八日晚上，我就由「消息」聽到了。消息是如何地來，我不知道，總是由隔壁的台北案的房間傳過來。也傳了那歌聲：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
我們繼續向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
你為愛國而犧牲，
冬天有淒涼的風，
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現在是我們的責任，
去爭取民主自由。
.....

好淒涼的歌，淒涼的聲，那麼低地如低泣。如孤獨的老人的獨語。

那夜我失眠了。自從十月底我又開始時常患老毛病，失常地無法控制睡眠。我一生難得失眠，自從那一年，在那山腹上患了瘧疾，曾經有一次嚴重的失眠，我才第一次嚐到這種味道。失眠之後，我心裡就怕那使人難受的偏頭痛。這裡沒有藥，連APC和阿斯匹靈也沒有，而且吃了更怕十二指腸又出血。還好，大約過了半夜睡著了，而且睡到放洗臉的時候才醒過來。

十一月廿九日的早晨，外面還下著台北冬天註冊商標的毛毛雨。我整天，一直到知道法官來這裡開庭之前，說了不少廢話，不像平常的我。好似是有意要對自己那股極端的焦躁不安，做一個相反的擬態。而且不光是我一個人，好像整個房子的人，都變成那臘月將盡時盼望過年的、無憂無愁的小孩子。

人在生活中本來就有這種心理上的自衛作用。看來有股預感，使我們心中感受到一種極

度的不安，將遭遇到極度的悲哀。大家似乎都想，而且是一種半意識作用吧，不要以自己的情緒來打擾其他人的正常生活。所以才變成這種平日少見的比較熱鬧的場面。而且我們似乎都知道，大家都是做假的，因為平常我們的反應不是如此輕佻。

我一邊下棋，還一邊唱那往日的流行歌：「Marrounier的街路樹」、「日落黃昏」、「青春芳草地」、「雨夜花」、「椰子的果實」。那一天，我的棋下得不好，而Q似乎也不怎麼好。我排了六子，Q似乎下得比平常慢，有時候還似恍惚想著什麼事情。而由Q看我，我可能也是如此。二十多天，我已經由九子進步到五子。

到了晚間，我們的案子才被叫到那半樓上，我也是第一批被叫上去的八個人，然後其他七個人被叫到軍法官前面，而叫我一個人在旁邊等候。他們七個人是判十五年徒刑，褫奪公權十年，而後他們下去。軍法官的桌子只離我約一公尺多。我看到五個名字和六個名字，用紅半圓弧勾在一起，而後寫一個「全」字。我的心臟跳得很快。我馬上知道「全」字的字義，而這時候，另外五個人又上來，我們並列在一起，軍法官叫了名字，然後宣判主文，「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年」。然後是十年的十四個人上來了，我們又下去了。我的淚水不斷地湧上，只強忍哭泣的聲音。

十六、十一月廿九日

十一月廿九日，破曉時，台北也是下著毛毛雨，在B區，看守進來叫人了。第一個李水井，再來楊廷椅，一直叫到王超倫。王超倫和葉盛吉都是在廿七押房。

當王超倫聽到看守唱出自己的名字時，並不是慌張失措，只是熱淚奪眶而出，猛用右拳擊打左拳，說：

「我實在不能死，也不想死在馬場町。」

這句話，不是真性情的人是說不出來的。在那一生只有一次的舞台上，如此被視為怯弱的表現，有些人是不屑也不敢為的吧。大家知道，他家三代單傳，而老父每天破曉都在馬場町的堤岸上等候，這對他們父子倆，是何等催心斷腸的一刻。那種場面如何去述說呢？如用某將軍（陳誠）的話則是：

「一路哭，不如一家哭。」

我或許少讀歷史。自魏晉以後，五胡亂華，在帝王之家，恩德仇恨報應不誤。我有理由堅信，蒼天是公平的。

有父母在世，為人獨子是不是應該走這條路？古人說：「父母在，不遠遊。」何況這是以死亡為押注的遊戲，輸者永離死別。但偏偏葉盛吉也是獨子，鄭文峰、鄭澤雄也是；劉家只有兩個兄弟，而兩個人都走了，弟弟就是那位聲帶剛變音的劉嘉憲；謝桂林死於台北案，弟弟謝桂芳（台中農學院學生）是台中案的無期，因肝癌死於綠島，成為第十三中隊的老大。（當時編制是十二中隊，所以拿墓地稱為第十三中隊。）就結論來說，也是一樣，而兩鄭與王超倫都無後。

王超倫出了房門，葉盛吉覺得身體發抖，心跳很快，他抓著老李的肩膀。他知道大家都不看他，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盼待看守不要再轉回來。時間覺得很長。他們看守要把人銬起來，交給已在門外等候的憲四團。其實，時間不到一分鐘，看守又轉回來，叫了葉盛吉的名字。就在這時候顫抖停了，他慢慢地站起來，穿上鞋子出去。

大約一分鐘，葉盛吉又走向押房，大家以為他有救了。不過，他只是拜託老李，那一包行李交給我，而後他又走了。

以前看過夏目漱石寫的〈道草〉，裡面一段介紹法國哲學家的學說，以後也聽過類似的

說法。年輕人甚少考慮過已經過去的日子，因為在他們眼前還有太多的未來。可是一旦在生命的前途發生了破局性的限制，他們的思維會迅速地向過去流動，甚至連日常未曾記得的、遺忘的世界，也會呈現在眼前。

新綠時的葡萄棚架那一片綠影，母親那略帶憂患的慈祥眼神，在那大榕樹下無知的孩子互相立下大願。台北高校尋常科的失敗、考進中學、搬進宿舍的鄉愁、那中級滑翔機在永康的台南機場做了三六〇度的旋轉、四年級的日本旅行、還有那大雨天父親喝了那麼多的啤酒、兩次渡日、在他順利的一生中那兩年慘敗的黑暗日子、和大舅子在上野車站相別去仙台、在仙台受到國分上尉的侮辱性的言論及老楊一再向他介紹三民主義、中國的古典、還有在滿洲的中國人的遭遇。回台以前在吳港等船的日子、而後又是一段父親反對的愛情、S的出現、然後到軍士教導團當一個月的醫官、五月十六日到台北的那一景，而後又是五月廿九日下午四點那一幕、最後是剛到人間不久的兒子的相片。孱弱、難產，不過，總是葉家有後了。連兩旁的憲兵，他似乎也不在意了，「葉家有後了」，他這才微微一笑。

前面有似楊廷椅喊口號的聲音，還有別人。他留下這笑意進入了電燈下，那麼多的憲兵，還有卡車。在電燈之下，法官的臉色似有些不自然的蒼白。

「李水井、楊廷椅、……」，覺得很久才點到他的名字，他只聽到「死刑」、「終身」這些字眼。而後由憲兵很熟練地綁，然後又插上那很討厭的牌子，好像是要去演古裝戲似的。然後，憲兵猛然把布塊塞進嘴裡，又用帶子綁到頸部。他並沒有掙扎，被押著走進那部最後面的卡車。

那一天，王超倫的父親確實看到這十一個年輕人。年輕，除了李水井三十一歲，其他都

只是二十出頭。而他們到此以前，昨天去的十四個人，仍然躺在那河畔沙灘。而他們也不照規矩來，一下車，後面就有槍聲了。王的父親，看到一顆一顆的子彈，穿進獨子的胸膛及腦殼，淌下一地的鮮血。葉盛吉也一槍打到腳部，向前倒下去，而後胸部、腹部又有痛覺，最後有兇猛的一擊向心臟，而後結束了。

那一塊河畔，現在據說成為青年公園，可能成為跑馬場。青年公墓與青年公園差不多，只差一個字。在這裡死亡的可能三千吧。蔡案、洪案、于案、陸案、重整案、再重整案，還有如少數幾個人的案件，如簡文宣案、莊孟倫案（保密局高雄站長，廈門美專出身，一九三七年同時參加軍統局及共產黨）。

以後，龜山監獄砌好了，這塊地方就不是流血五尺的地方了。伊藤博文的漢詩不比乃木將軍好，不過當過宰相，做過大事的人，有一句「埋骨何必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或許一言成讖，他真的死在哈爾濱車站，在韓國人開的手槍的子彈下。在本質上是橫死，換一個想法，也是一樣的死。

當時風行的就是極像紐曼邏輯的「是」與「否」的兩分法。黑白分明、漢賊不兩立、「強盜」與「警官」、忠臣與奸臣、革命的與反革命的等等。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帝王邏輯也有這種味道。如說得牽強一些，本來如王子英（註六十二）不逃，王超倫或可免一死。一九四九年夏天，王子英案發，逃往海山區，以後海山區案發，又逃斗六；工學院的支書就由王超倫替代。學委案甚至許多不是支書的，也沒有逃出劫數。

一九五二年春某一天，當時我已在綠島，《中央日報》還沒有開放。有一天，我在海邊

倒垃圾時撿起了一小片發黃的舊報紙。那麼巧！處理相當嚴格的這種「舊報紙」由何流程，而能在這沙灘留下？不管如何，那就是王子英自新後寫的那一篇：《我們的前途並未杜塞》。（太舊的記憶了：大約是如此吧。如今老了，記憶不可靠。）我迅掃全文後，也不收留，拋向海濤中，心內仍能輕輕一笑。

雖然我年輕，仍知選擇生存比死亡，有時候要有更多的勇氣，要忍下甚多無奈的痛苦。不然人家也不會說：

「死亦我所患，所患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辟也。」而恰恰有些生，比這些死更有所患，不得不強忍。只因為期有所為也。當然這「所為」，已不是為區區的一生了。

我不知王子英的遭遇。只是如王超倫這樣遭遇的，還有太多了，徒說無用。英雄的時代也是悲劇的時代，不知該不該這麼說，那倒下的年輕人，許多許多只想當一個平凡而正正當當的中國人。有些時代，愛國本身是一種罪愆。何況當年，這一條罪名的臨時條例，是唯一沒有「時效」的臨時條款。一九五四年以前，就是那「麥卡錫主義」退熱之前，前仆後繼，其數三千。

而在中國大陸，十年風暴，又有多少未開的花蕾，散落在無限江山。我仍只有蹲在那馬桶上，苦思人類的，比較長久的，比較理性與樂觀的未來。我自知不是先知的料子，也無英雄的胸懷，以後才專用這不雅的「蹲」的時間，去想人類的未來。如果人類幸而還有歸屬於他們的未來。這個問題，如是，這篇追憶錄的副主題，會伴著主題，一再出沒。

歷史是記載的、永不回頭的，那些日子也永不回頭了。如夫子感歎：「逝者如斯夫！」

註六十二 ◆ 台北人，曾任台大工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領導台大學運。

我內心因此盡量不去探看這一段「歷史」了。實在沉緬在上面徒使人傷情，而且中國有太多太多這種故事。所以屬於歷史的，就讓它永遠成為歷史，睜大的眼瞳，盯在遼遠的未來。

這是一段對自我說服的歷程。但有時候，人總是會在時間的奔流中，有意無意回頭一顧。心創的痂皮下面，仍有舊創，還會隱然作痛。

十七、憤怒的少年

施部生案另一位工委是呂煥章。呂煥章的生活樣式（雖也是傳說）一向不誇耀，也不是萎縮。當天，也不慌不忙，靜如處子。

那麼敬重地走完生命的一分一秒，那種心境，合該去當禪僧。如今我年過不惑，知天命，自捫還沒有那份道行。呂煥章不自棄、不疾言、待人接物如長者，對來唱名的看守，還自然地說了一句：

「辛苦了。」

這種人，唉！偏偏在今天的社會，我尚未遇到。那年，呂煥章享歲只有二十七歲而已。

「勞駕你，不要慌張。在心臟打一槍就好了。」呂煥章溫和地向後面的兩位憲兵這麼說。我自忖再修養幾年、幾十年，也無法達到那種境地。雖然呂煥章曾經是，而且就是在那一刻，仍是憤怒的少年人。

當年的這些故事，在人類的經歷中也不算不得是什麼大事。光是中國，就是從不斷的動亂和人頭落地中，延伸到今天。又是老話重提，孔融子女，幼齡尚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之理。在亂世中，人對政治的另一面有驚人的、早熟的智慧。說來老蔡（蔡孝乾）的智商還不及他們（指那些坦然赴義者）。

不過，只有一點似乎是可以肯定的。雖然如人類的行為一樣，中國人的行為曾經有崇高的，也有醜惡的，有的是偽善的，有的卻是露惡的（借夏目漱石的形容），雖然這些是人類

的無限變數所概括的函數。中國經歷了近代史上罕見的大風暴，現在似乎又走出了這個暴風圈，但是，不只中國人，甚至世界也在期待，中國不會再產生這種災難。因為中國的人口究竟佔全世界的二十二%。世界要安定，必需先有一個安定又現代化的中國。

有許多人羞為中國人，因為許多封建的德性：好似受過大學教育的子弟，對無知又赤貧的父母敬而遠之的心理。也有許多人認為中國人是無救的：沒有教育、貧窮、自私。的確目前兩岸的年輕人都有一些「金錢饑餓症」，尤其大陸的教育在那文化大革命的十五年左右，與時代完全脫軌，而目前因為個體戶經濟比教授、工程師、醫師的生活好，而對教育並不熱衷。其實，在美國、日本拿了博士、超博士而不肯自認為他是屬於這個母體的人，多得如「過江之鯽」。（這個形容，目前在台灣的西部河川，已經不能通用。污染而死亡的河川，已無昔日的景況，甚至這死亡的訊息，迅速地傳向近海。）他們的心態，也是可瞭解的。這裡，沒有他們新近才享受到的一切：民主、自由、秩序。他們可以稱為「河洛心態」，自西晉熾帝年間，河洛人一直向外流亡。雖然他們在墳墓上聊表對故園的鄉愁，他們已經對故園的一切沒有貼實的興趣。他們一路逃亡，到江東、福建、廣東、台灣，或為華僑，近來如東渡的一群「不知歸」的候鳥，向美西、或美東。傳說，美國的華僑已經有一百萬，不！已超出約一百七十多萬。

他們不再承認自己是河洛的後裔，或是中國人。而自己肯定歸屬於這新地「美國」為榮，不過許多美國人卻不以他們為同胞而感到光榮。他們仍是一群特殊的族類，所到的地方，炒地皮、組中國城，但並不是團結，老僑老是吃定新僑。他們的表現不如韓國，甚至日本，雖然日本人有些獨善主義的傾向。他們有

些曾經是精英，不過，中國人多，大概不會因為缺少這些人而無法生存。

猶太人並不值得欣賞，當年在西貝假別人屠殺難民營中的巴勒斯坦難民三千人，而今仍在約旦河西加薩走廊開槍格殺，規模雖不同，仍然是與納粹德國的作風相同。不過他們流浪兩千年，仍有對自己種族及國家的執著，這一點與「河洛」吉卜賽的表現有所不同。

一旦中國人被教育的一代興起，封建的色彩已經褪色，中國似乎可以走出那暴風雨的勢力圈外，廿一世紀的中葉以後，必然有一個中國人的世紀的來臨。這不是誇耀中國如何強大、富有，也不是喋喋不休地歌頌中國人的才智出眾。只是向你們保證，中國將可以充分地，向人類的和平、平等，表現他們的貢獻及服務的熱誠。

今年（一九八八）季辛吉、布列辛斯基等十三個人向美國國會提出的二〇一〇年的美國戰略中，敘述「選擇性抑制戰略的再估」時，已經把中國列為坐三望二的國家。當然，屆時中國人口為日本的六倍半，而總生產額不過大約相等而已。不足謂富，但小康足矣。而後再二十年，中國人足夠豐衣足食，參與當時飛揚的科技。

三百餘年來，台灣的河洛人在荷蘭、明鄭、清朝、日本人統治下，過了長期不稱心的日子。不過，論真，就算是呆在故鄉閩南，又是如何。中國老百姓自明朝，也可以說自有河洛人的歷史以來，大部分的人也是過著這種不得志的日子。不然就不必冒風浪、黑水溝白水溝之險、瘴癘之地，來開發這塊本來是原住民九族所居之地。在日據初期二十五年，自那民主國的那幕悲劇後，仍有不少人向日本的統治權，做了無望的武力抗拒。算不算林獻堂先生與梁啟超先生在奈良一夕談，改變了反抗的方向與方法暫不作結論，不過就那時候的觀點，

客觀地來說，那是中肯的看法。回歸，回歸於祖國的努力，那些灑血馬場町河畔的年輕人，大都嘗試過。他們曾到基隆碼頭去歡迎來台的國軍。

那個事變（指二、二八）不一定要在那一年約二月底發生。而是在那時候隨時隨刻都可能爆發的一座火山。因為在戰後，生產萎縮的年度，戰勝的中國，台灣的物價比情形更慘的戰敗國的日本，飛漲得多還快。如光是行政上的拙劣，大家尚可以忍受，台灣人最最失望的是貪污加上貪污，而且對待這淪陷三百年的同胞，部份的官僚、亡兵，都排出一付勝利者對待占領區的態度。

平心而論，這種遭遇不光是台灣與東北，是所有的淪陷區都嘗受的經驗。中共的成功是這種亂局施予的。有些人肯定了日本人的法治，甚至自己也可以搞出一套這種法治、民主，給這片受難之地。卻忘了他自己還沒有跳出中國人的那德性，尤其是河洛人低劣的根性。

如果不信，你翻看所謂日據時代的台灣社會運動那些軌跡，和今天自認為最前衛的在野黨（指民進黨）的運動就足夠了。當年東晉之亡，也是由那「爭」而來的。他們也知道這條路是不通的，所以他們做了另一選擇，還是回歸祖國的另一條路。他們不是要做先知，他們如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把生命當做一種「浪漫」的賭注。

不要以為他們幼稚地無知。他們知道史大林對同志瘋狂的肅清，及在那大饑餓中死亡的數百萬老百姓；他們甚至也知道，為什麼在這獨夫之下，人民仍為祖國而與德國拼命。如果他們活著看到吉拉斯的著作，波蘭、捷克、匈牙利的變故，他們仍然不會覺得太意外。論知識、論對世界的認知，他們這些秀異份子，比台灣任何時代的那一撲火的飛蛾，散落的雨夜花，也高出甚多。

中國人，長久以來，被視為沒有國家觀念的一盤散沙。抗戰中有那麼多年輕人，不顧前程而赴國難，他們也是為了對抗這一觀念而死亡的。中國人被認為不會團結，他們曾經團結起來，想創造比東漢更有氣節，比貞觀更富裕的，自由、民主的，中國人的新世紀。

中國人，人家總說，如猶太人一般太愛金錢，容易受金錢污染。他們都傻得連自己大好前程也不要了，生命也下賭注了。不是為自己，而只是為了他們愛這個國家。而這個國家，在封建與腐敗下已經快淪為永世不能超生的封建與腐敗，他們只好挺身而出，盡自己的力量而為。他們在赴死時，仍然相信，中國一定可以新生，雖然路不會是平坦的。如果有那麼平坦的道路，他們也不必經過那麼多曲折去尋找了。對大部分的人來說，那個事變在心靈上所受的敲擊及傷心是下選擇的動機。

十八、霜降之日

對我們而言，馬場町，是有生之年難忘的。不過，台灣的住民知道這一名詞的恐怕不多了。光復之後，馬場町分三里：永儀里、永寬里、永成里，都屬古亭區，與川端町相鄰；清代稱為崁頂、加蚋仔，加蚋仔一帶產竹，菜農多。那年，我憑弔古地時，舊的菜市場還可以看到，所以有人稱這一帶「饒有林園之勝」。古亭區範圍大，信義路之南邊，杭州南路以東，包括我曾住過的新榮町、千歲町，常買舊書的兒玉町，每天走路經過一年多的富田町，連台灣大學都屬古亭區。

古亭區之名，來自古時候（這又是清代到日據初期了）稱為古亭庄，不過，那時候的古亭庄還大一些，包括現在大安區城中區的一部分，和古亭區的大部分。

據說，明鄭時期已有人家，姓周，在這裡拓墾。又一說古亭之稱來自鼓亭。當時台北盆

地仍是湖沼之地，而且淡水河潮水一天，便受影響。古亭近公館一帶地勢略高，不過也近角板山的泰雅族。

清朝攻克台灣，設省時，省會已設在艋舺之地台北。當時淡水河船舶可以直入艋舺，八里庄曾經取代安平，興旺了一段時間。河洛人漸多，泰雅族就愈退入山區，鼓亭就變成古亭了。因為景美、大坪林，都成為河洛開墾的新地。

而今不但古亭區的農田沒有了，大安區也沒有了。

不過，馬場町，除了一些高高的公寓以外，有一片僅次於以前的羽衣公園——（陽明山公園）的青年公園，佔地達三十一公頃。這公園的東，以前是崁頂，西為加蚋仔，一屬泉州同安人，一屬漳州。和閩南相同，河洛人好鬥，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曾發生一次規模不小的械鬥。經過日本人統治五十年，只有這械鬥消失了。

日本人曾在這設練兵場。台北市有台灣軍的步兵第一縱隊、砲兵聯隊，砲兵馬多，所以，這裡自然地成為馬場町。以後，又改為臨時的飛機場，那是太平洋戰爭以後的事情，大家慣叫「南飛機場」。光復後，日本人的飛機都成為臉盆、水壺、各種容器。「南飛機場」一時廢用，只有軍火庫。

當年，數千人灑血之地，就是新店溪在這裡流過的河畔。北邊的河畔，就是今天的青年公園的一小部分。青年公園是一九七七年十月完工。據說，遊客川流，尤其星期天假日人擠人。誰曾想到，當年，這裡連白天也是甚少人影，鬼氣甚多之地。一九七一年，我因公出差，曾經重遊此地，在細雨霏霏中站了半小時，當時，除了一片公寓以外，甚少見到人影。

當時誰伏屍何地，我無從知道。只站在細雨霏霏之中，而且剛好是十月二十三日——霜降之日的下午，天上烏雲壓天。◎

《弱勢群體之聲》 第一集

共
24
首

■浪淘沙

深圳的手指

據保守統計，深圳工業區每年至少2萬打工仔的手指、手臂，被嚴重缺乏勞動保護措施的私企工廠的機械輾斷，而得不到賠償。

二萬
二十萬……
血淋淋白骨鋒利的手指
刺在深圳淫逸無度的夜空

金錢擦不去的血光
灼烤著蛇口、羅湖
還有香蜜湖高爾夫球場上
吐著蛇信的頭顱

滿天揮舞的血手
一年至少二萬
二十年至少二十萬……
無法統計飛濺夜空的流星
拖著鮮血和骨髓的
慘叫
應和著恐怖得令人戰慄的
車床、磨床、洗床……
和一切兇殘機器
輾碎的人性

二萬
二十萬……
打工仔的手指
給老闆和太子們
打造經濟奇蹟的手指
為一個時代的臉
貼滿黃燦燦金子的手指
二百萬……
親屬拿不出訴訟費的手指
二千萬……
二萬萬……
中國大地上彈響憤怒哀歌的手指

來料、加工、外銷、免稅
這個開膛的魚村
有世界一流的投資環境
血沫翻滾的肉漿
釀製著特區新股的紅利

二萬
二十萬……
打工仔的手指
二百萬、二千萬、二萬萬……
十指連心的靈魂
血痂石塊般磨利的匕首
刺在深圳淫逸無度的夜空◎

廣州街頭相遇聶耳

青春，最奔騰壯美的海域
什麼時候被閹割了
怒潮和風暴？

青春，最奢侈的一首
《畢業歌》（註一），又有哪個學子的財富
買得起

你，一個民族最天才的音符
像同學們一樣奔赴祖國
經濟騰飛的市場吧
正如千百萬南下民工中的一員
在羊城的角落
拼爭一隻羊的草飯

黃花崗車水馬龍的高速路口
烈士屍骸奠就的
現代化牌坊下
聶耳，我遇見了你
一個衣衫襤褸的盲流
一個被藝術和神聖剝奪了名字的孤影
一個繁華都市的人渣
一個金錢宣判了罪犯

服役吧，一日三餐就是你的罪證

悲哀喲，你白金般的天職
悲哀喲，你神子般高貴的血性
那些無法奴役的部分
還有祖國的精靈
和人民的祭司

但，腳下是尊嚴全面失守的
淪陷區
而你就是時代捕殺的亂黨

黃花崗的血雨腥風
是誰還在非人非鬼的吟唱
聶耳，我看見了你
不，我只看見了那不斷抽動的嘴唇
那鮮血噴濺的嘴唇
正面對侵略者被迫著
被迫著
發出最後的吼聲

一個時代的義勇軍戰士倒下了
聶耳，我看見了你
在浸透鮮血的聖歌中復活
——你就是藝術之子
——孫志剛（註二）
用23歲的青春鑄成最危險的時刻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這，熱血點燃的
祖國的聖歌啊
誰能聽出一個民族
撕裂肝膽地的哀泣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
人們……」◎

註一：《畢業歌》——人民音樂家聶耳（國歌曲作者）上世紀30年代作曲的一首著名抗戰歌曲。

註二：孫志剛——2003年春季，在廣州街頭由於拿不出城市暫住證，被員警活活打死的藝術青年。

我不能再以詩歌扶貧

我不能再以詩歌扶貧
真相已吃光夜空的麥粒
黑衣的妓女展開鋪天的屍布
想像的夜風是貧民窟搖曳的
罌粟，它彌散著吸毒者
褲襠的黴氣

我丟下詩意的舵盤
貧窮的錨
已套牢詩人的眼睛
貪欲和猥瑣的火海
翻滾如浪饑餓
哺育一隻求乞的「公雞」

中國的版圖，可以這樣說
不。報紙、書刊、雜誌、學術年鑑
這些象形文字組裝的機器
在時尚的生產線上
生活的敝屣推陳出新
而貧窮
是一切時尚的商標

但我不能再以詩歌扶貧
誰說不應取消這項
人間的福利
我這裡沒有春花秋月可賣
我的詩品是高利貸的老闆
口袋裡裝滿天國的金幣
但每一個詞
落在世上
都是擲地有聲的冥幣
只有死亡
是人間通行的
利滾利◎

施善繼頌詩 四題

■施善繼

我以這四首小詩，誠摯的向前驅者楊逵先生致敬。謹謹聊表個人的一點心意。
楊逵八十年的行誼，已經塑成典範，並且上升為一面迎風的旗幟，在正義者的胸懷烈烈招展。

楊逵作品研討會

中國·南寧 / 2004年2月1日~2004年2月7日

三·十二 —— 逝世之日

消息傳來，您在凌晨猝逝。
我漫步在前進的道路，
因為驚愕，身體顯得顛躓。
明天的行程，荊棘依舊滿布，
我怎能讓淚水把視線遮住。

多想匍匐前去您硬朗的身旁，
不是奔喪，是去給您問安，
領受昔日的叮嚀、囑咐與關愛。
您已夠累，該好好休息靜養，
我會替您輕輕把棉被蓋上。

對這島上的人民了無遺憾，
八十歲的傲骨埋入深愛的泥土，
八十年沸騰洶湧的心血溶為養分，
在地層下常久滋潤這塊土地。
嫩草會茁壯，枯樹也將蘇生。

一九八五年，臺北

三·二九 —— 殯葬之日

把您底遺像製成的小小紀念章，
牢牢地別在胸前徐徐跨入靈堂，
您底音容即刻充塞我底腦海，
往事在我眼前重聚，歷歷如繪，
喉梗眼熱鼻酸，幽明隔斷。
我不停地不停地提醒自己，
在這裡哭泣就是對勇者失禮。

您底遺像製成的小小紀念章，
成了懸掛在眾人胸前的勳章，
牢牢別上它彷彿戰士披上盔甲，
去和不義拼戰，和壓迫者廝殺，
向無止無盡的黑暗舉起投槍。
戰士堅挺脊梁不許被壓彎，
不諂媚，不尾隨偽善者搖旗吶喊。

輓歌已在凝重的空氣中輕揚，
忍住憂傷對勇者依依不捨的瞻仰，
您屢仆屢起從不畏懼的風範，
將在人民的記憶深處貯存，
像埋在地底取之不盡的礦藏。
您點燃永不熄滅的火苗，
在人民的心中焚燒，熊熊發光。

一九八五年，臺北

空杯

你，把喝光的空杯
鬆手
推入無限，滑向黃昏
它——
在黑漆的桌沿煞停

酒精純度五十八
透明一看即穿
殘餘的陳年高粱
清清醒醒
兀自，燃燒

君別後
音容宛在，風中
影子疾色匆匆
影子音容滔滔激辯
鬥爭交鋒與突圍重重

墓穴這居所如此沈重
雙腿竟跨不出墳拱
成群小朵小朵的小黃花
依著每一方毛細孔，盛開
蒺藜處處，小黃花似海

春日裡的鐮刀，懨懨
閑鈍癱於牆角
秋冬之際斜斜歪歪
斧頭以及把柄
搗著脖子並搓著大腦

荒煙漫漫將遮過睫毛
接住地獄浮起的，那——
空杯
斟些什麼
四下遍尋無著，陳高？

二〇〇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臺北

狗屎 十四行 ——博揚達一粲

春雨終於夾著冬的尾巴
催促我們——這些寥寥
上墳，剪一剪修一修你
溢出額頭的野花與蔓草

一隊臺灣雉雞正在踏青
驚起騰躍，竄進樹林
羊蹄甲抖抖枝幹
蕨類晃動莖葉猛撼

柏油路上難堪的狗屎
給踩得嘩啦哂哩
真巧是你擁護的現實主義

你愈走愈遠，狗愈來愈多
形形色色狗屎愈來愈多
偏偏狗屎現實主義愈來愈少

二〇〇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臺北

※※

有關一九四三年日據末期，「臺灣文學派」與「皇民文學派」的文論鬥爭文獻，請參閱刊發於臺灣出版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一九九九·秋季號，109頁至142頁。曾健民先生對該次論爭有精要的導讀〈評介「狗屎現實主義」論爭〉，並翻譯了五篇相關文章，其最後一篇即為楊遠寫的〈擁護「狗屎現實主義」〉。

上世紀末，特別自一九八七年起，早已暗潮洶湧的舊皇民文學派殘餘遺老，終於手牽著他們的新皇民逸少，全面復辟，正以驕人之姿君臨二十一世紀的臺灣上空。面對此一嚴峻形勢，吾人實有重溫、學習此一重要文獻之必要，加以凝視，隨時做出應有的回應。◎

因為…廣場上 ■鍾喬

因為，廣場上有風。
風在黎明，吹動旗幟：
徹夜難眠的老兵，從他
記憶的被褥裡，緩緩抽出
老婆離家前留下的髮；以及
時間磨厲下幾不成形的總統文告。
於是，我們統統回到戒嚴，或者
築起心理的冷戰防線。嘲弄著，
他們據說不民主的身體。
當然，旗幟已老，就像那場雨，
襲打在佝僂而蒼老的肩背。
於是，我們在海洋國家館前留影，
撐傘，前往琉璃櫥窗前註記身份。
並不忘，低聲、禮貌且把持分寸底
讚美 風雨中的民主員警。◎

夏潮基金會

大專青年民俗文化風情夏令營

江南 南京 燕魯文化營

日期：2004年7月6日至7月18日 共13天

行程：台北—香港—南京—青島—曲阜—泰山—濟南—北京—香港

團費：NT\$20,000元（證照費另計）*遇機票調漲，依新價收費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6月20日止（名額40名，額滿為止）

華北 天津 北京 承德 壩上草原文化營

日期：2004年7月12日至7月22日 共11天

行程：台北—香港—天津—北京—承德—壩上草原—天津—北京—香港

團費：NT\$17,000元（證照費另計）*遇機票調漲，依新價收費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6月25日止（名額40名，額滿為止）

www.chinatide.org.tw

~詳細內容請上網查詢~

106台北市金山南路2段218號6樓

Tel : 02-2322-2121

Fax : 02-2321-0101

意事項
以便日
情時，
妥之查
。字係機
印或經
訖章者

請寄款人注意

-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通訊處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 二、每筆存款至少需在新台幣十元以上，且限填至元為止。
-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退回。
- 六、本存款單以機器分揀，請勿摺疊。帳戶如需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符。如有不符，各局應婉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以利處理。

交易 0501現金存款 0502現金存款（無收據） 0503票據存款
代號 0505大宗存款 2212託收票據存款

本聯由儲匯局劃撥處存查248,000束（100張）290×110mm（80g/m²模）（源國）保管五年

《批判與再造》訂閱單

- 一般訂戶 NT1,000元/年（共
【欲訂閱200 / 月號至200
- 榮譽訂戶 NT5,000元

通訊資料

姓名/抬頭： _____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_____
電話：(H) _____ (O) _____
手機： _____
寄件地址：

E-mail： _____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撥事宜為限，否則應請更換存款單

《新二二八史像》 編著◎曾健民 / 定價NT350

80篇歷史證書

首次大量出土新史料；事件當時大陸、香港報刊雜誌上的二二八評論、報導，以及詩、小說、創作

有初次公開的第一手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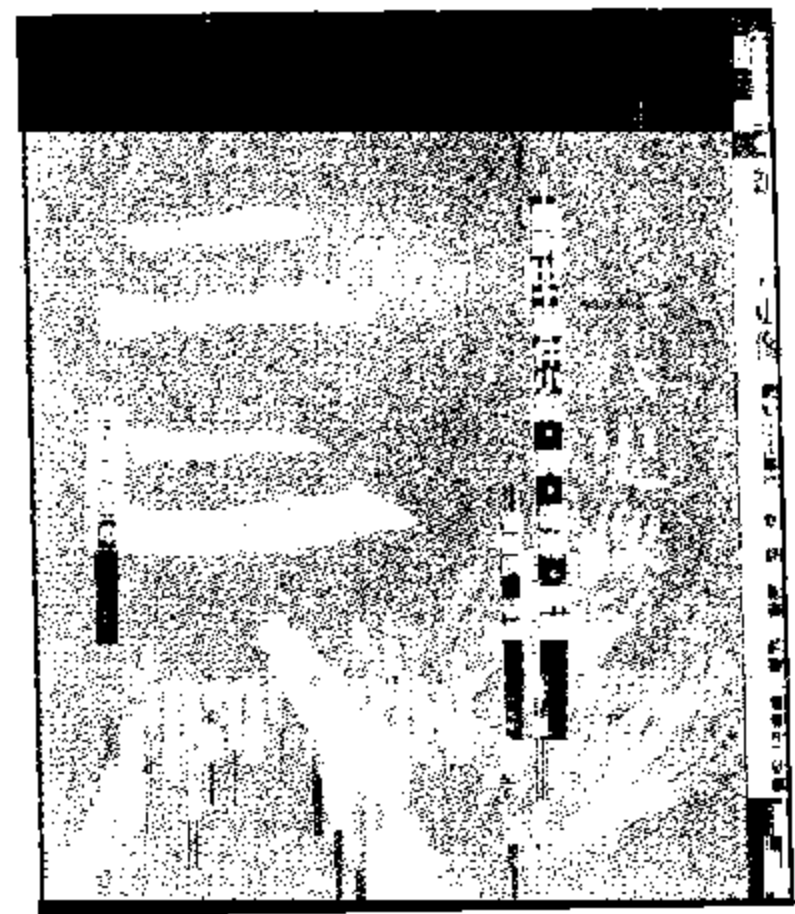
二二八女鬥士謝雪紅《告同胞書》

名記者范泉《記台灣的憤怒》

文匯報記者董明德《孤島一月記》

蘇新的《台灣的前途》

名作家郭沫若的《還要警惕著不流血的二二八！》



《天黑黑嘍落雨》◎詹朝立 / 定價NT350

—— 十二萬農漁民大遊行傳真

「1123·與農共生」大遊行總指揮詹朝立親筆力作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推薦：

「這本著作，所記述的不只是一次大遊行的因果經緯而已，更是當今台灣農漁民和農漁會艱苦情況的紀實報告，充滿了理解與悲憫的抗議情懷。」



《走進台灣》◎周良沛 / 定價NT300

—— 光和影的心靈紀實

作者周良沛是一位大陸資深的進步作家，且在台灣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本書超越了兩岸的歷史糾葛和現實迷障，以更廣闊的視野和深刻的感情，用獨特的紀實散文風格，描寫了台灣生活底層中許多不知名的或知名的人和事。藝術地概括了九〇年代前後台灣複雜的社會變動中的光和影，有鮮明的時代感。



直接訂購，... 優待

... 首個字出版社 郵政劃撥 / 19747069

■電話 / (02)87714051

■傳真 / (02)87713801

■電郵 / tssra@sinamail.com

■地址 /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8巷2號2F

X00704189
NT:77

人間 台灣政治經濟叢刊

台灣戰後資本主義論 / 台灣社會性質論名著

□涂照彥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四八〇元

從日帝獨佔資本與以地主、佃農制為主軸的本地資本間之矛盾，解明殖民地台灣經濟形成的過程與本質……

□劉進慶

《台灣戰後經濟分析》 三五〇元

從「公業」、「私業」雙重構造，官商資本的支配，對美日經濟的附從化剖析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六五）的性質與構造……

□段承璞

《台灣戰後經濟》 三五〇元

探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八五）中官僚資本、集團企業資本，僑資、外資、中小企業資本，分析台灣外貿與產業構造的變貌……

□谷浦孝雄

《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 二五〇元

以六〇年代後高度成長的構造為焦點，解明做為美、日中心國家加工基地而發展的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之結構……

□陳玉璽

《台灣的依附型發展》 二四〇元

分析深層結構轉化及帝國主義體系功能變遷，以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之機序，並批判地探討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相應性……

□隅谷三喜男 / 涂照彥 / 劉進慶

《台灣之經濟》 三六〇元

刻劃台灣「獨裁下的成長」和民間經濟向海外擴展的勢頭。從農業、工業、勞動、金融財政、貿易和經濟體質，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實相。

□Winekler等編

《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 三八〇元

以西方當代保守派的、自由派的和激進派的社會發展理論，分析台灣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結構，並交互進行各派分析之分析，檢視三派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研究上的貢獻和極限。著名社會學者，除編者外，R. E. Barret、T. Gold、D. F. Simon之台灣資本主義論的總匯，向台灣在地社會學界提出無從迴避的詰問……

■杜繼平

《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 三八〇元

——統獨左右的上下求索

台灣戰後世代第一個接受完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育的學者杜繼平，在科學對待當前大陸社會主義性質的基礎上，闡明當前台灣左翼應以克服民族在外力干涉下的分裂構造，追求祖國統一，並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揭發台獨運動的本質，批判郎中「左」派陳芳明知識上的荒疏，振臂呼喊「做一個理直氣壯的統一派」……

/ 本書要目 /

1. 從世界體系的觀點看台獨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2.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
3.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
——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
4. 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
5. 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

本刊定價 / 新台幣90元

凡購書以上者，均可享受郵寄優惠，郵費時時加收。請向上海訂戶編號。若須加收。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電話：二四六四七三。郵政代辦所：三五七。